

## 出版者說明

近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和平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反复进行斗争的结果，国际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地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大的挫败。1957年冬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美国统治集团更加惊慌起来。1958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根据美国第八十五届国会参议院第三三六号决议和第八十六届国会参议院第三一号决议，决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1958年10月该委员会拟定了十五个研究题目，由美国参议院拨款三十万美元，分别委托美国的一些重要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

“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Developments i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ir Impact on United States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这个报告是由

美国約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提出的，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员会于1959年12月6日作为研究报告第八号发表。本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美国的军事力量、战略原则和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以及今后十年的军事技术发展对改变当前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各种因素。它强调坚持美国全面战略的必要性，强调核战略的基本军事需要的“不可动摇的重要性”，企图实现其消灭共产主义和独霸世界的狂妄野心。现将报告全文译出出版，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 富布赖特(阿肯色州)

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sup>①</sup>(罗得岛州)

约翰·斯巴克曼(亚拉巴马州)

休伯特·H·汉弗莱(明尼苏达州)

迈克·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

魏恩·莫尔斯(俄勒冈州)

鲁塞尔·B·朗(路易斯安那州)

约翰·F·肯尼迪(马萨诸塞州)

艾伯特·戈尔(田纳西州)

弗兰克·J·劳希(俄亥俄州)

弗兰克·丘奇(爱达荷州)

亚历山大·维利(威斯康星州)

伯克·B·希肯鲁普(衣阿华州)

威廉·朗格(北达科他州)

乔治·D·埃肯(佛蒙特州)

霍默·E·凯普哈特(印第安纳州)

弗兰克·卡尔逊(堪萨斯州)

总干事 卡尔·马西

秘书 达雷尔·圣·克莱尔

<sup>①</sup> 退職名誉主席。

# 目 录

序言.....	1
提交研究报告的函件.....	9
第一部分 主要研究结果摘要 .....	11
第二部分 若干建议.....	27
第三部分 报告正文.....	32
第一篇 总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目的和 美国战略 .....	32
第二篇 美国国防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和 国外义务 .....	42
第一章 从冷战意义上看美国外交政策 .....	42
第二章 美国国外军事义务的范围 .....	48
第三篇 技术发展和战略平衡 .....	61
第一章 绪言：东西方实力的关系 .....	61
第二章 对技术变化的评价 .....	88
第三章 军事技术发展的几个时代 .....	95
第四章 新武器时代的前景 .....	129
第五章 战略力量平衡中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	173
第六章 军备监督和其他稳定性措施 .....	184
第四篇 威慑和反威慑战略的发展 .....	195
第五篇 战略核威慑的危机 .....	207
附录：委员会研究大纲 .....	233

## 序 言

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

1958年1月，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世界的情况和趋势以及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计划进行一次检查。这次检查至少部分是由于委员会关切苏联科学成就对我们和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1958年的整个春季，委员会常常举行意见听取会，就美国对远东、近东、南亚、非洲、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加拿大的政策听取证词。从性质上来说，这些证词是有限的，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美国同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的主要政策和问题上。大部分意见听取会都仅限于听取主管世界不同地理地区的国务院主要官员的证词。委员会也设法听取非政府人员的证词，他们是委员会遴选出来的，对于各受审查地区有专门的知識。

1958年春季所听取的证词，由于副总统尼克松訪問拉丁美洲而对我国同該洲关系所产生的重視，最后还有当时所存在的严重的中东局势，都促使委员会相信，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深入检查的时刻已經来到。

由于上述因素，外交委员会在1958年5月20日

举行的一次行政會議上，授权該委员会的美洲共和国事务小組委员会就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进行一次研究。同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別小組委员会，責成該小組委员会探討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广泛的研究是否切实可行和是否有益。該小組委员会由格林、富布賴特、維利以及希肯魯普四人組成。

后来，該小組委员会向外交委员会提出报告說，由委员会就外交政策进行这种研究，是切实可行的和有益的。該小組委员会认为，这种性质的研究可能启发人們对我国外交政策提供新穎的意見和方法，同时也可能促使全国更清楚地了解国际問題，从而更有效率和更有效果地来管理我們的国际活动。

1958年7月15日，外交委员会举行投票，通过了向参議院提出一項授权进行此項研究的決議。在1958年7月31日，参議院采納了這項決議（第八十五届国会第二次會議参議院第三三六号決議）。这一決議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参議院並沒有在范围上对授权进行的研究加以限制，但它指示委员会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列主题上：

1. 左右美国同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理区域的关系的种种看法以及为了貫徹这些看法而采取的政策；
2. 美国同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理区域的关系的目前状况；

3. 国务院在海外从事实际活动的其他行政部門的政策和計劃在执行和配合方面的情况；

4. 政府的其他政策和活动同私人在美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活动之間的关系。

参議院授权委员会在指导这项研究时“得利用私人組織、学校、研究所以及个人的經驗、知識和建議……”，同时“得为达到此項目的而簽訂合同”。参議院指示在1960年6月完成此項研究工作，并向委员会提供三十万美元以內的經費。参議院授权委员会根据参議院第三十一号決議(第八十六届国会第一次會議)繼續进行此項研究工作。

在参議院通过参議院第三三六号決議以后不久，当时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議員格林任命我出任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包括参議員斯巴克曼、希肯魯普和埃肯，該委员会負責指导和統籌此項研究工作。

1958年9月16和17两日，执行委员会同一批聞名的公民討論了此項研究所涉及的一般性問題以及解决这些問題的最有效的方法。参加这些討論会的，除了执行委员会各委員以外，还有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波維、前任大使威廉·G·蒲立德、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罗伯特·耳金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报”的約翰·考尔斯、外交学会的威廉·迪波尔德、“时代—生活”杂志社的亨利·魯斯、共和基金会的华尔德·米利

斯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

在这些会议以后，执行委员会拟定了计划，并在10月15日宣布，该委员会准备约请私人研究机构和研究所就委员会打算在检查外交政策时进行研究的十五个题目提出建议书。这项宣布的结果是，那些对一项或一项以上研究报告发生兴趣的组织 and 研究所一共送了五十余份建议书给委员会。

1959年1月5日，执行委员会再度举行会议，考虑所收到的建议书，并决定约请哪些机构和研究所为委员会进行这些研究工作。下面是指定进行的研究题目以及负责这些研究工作的机构和研究所的名称。

### 研究题目

外交政策的性质和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负责研究机构：纽约州纽约市东六十八号街五十八号外交学会。（该题已于1959年11月25日作为“研究报告第七号”发表。）

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方面；负责研究机构：纽约州西拉丘斯城西拉丘斯大学马克斯威尔公民及公共事务研究院。（该题已于1959年11月11日作为“研究报告第六号”发表。）

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冲突及其变化，冲突的表现及其目前与将来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发生的影响；负责



研究机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神学路六号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世界和国内的經濟問題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負責研究机构：弗吉尼亚州阿林頓城杰弗逊戴維斯大道一二〇〇号經濟及工业研究社。（該題已于 1959 年 8 月作为“研究报告第一号”发表。）

比較不发达和不承担义务国家的經濟和社会情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負責研究机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馬薩諸塞州理工学院国际問題研究中心。

軍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負責研究机构：华盛顿首府佛罗里达大街〔西北〕一九〇六号約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

非軍事性科学的可能发展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問題可能发生的影响；負責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州門洛公园史丹福研究所。（該題已于 1959 年 9 月作为“研究报告第二号”发表。）

多边組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起的作用；負責研究机构：华盛顿首府杰克逊广场〔西北〕七二二号布魯金斯研究所。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負責研究机构：华盛顿首府杰克逊广场〔西北〕七二二号布魯金斯研究所。

美国对西欧的外交政策；負責研究机构：宾夕法尼亚州費拉特尔費亚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

所。(該題已于 1959 年 10 月 15 日作为“研究报告第三号”发表。)

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外交政策;負責研究机构:紐約州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学俄罗斯研究所。

美国对近东的外交政策;負責研究机构:紐約州紐約市东第六十二号街二十七号地中海事务研究所。

美国对南亚的外交政策;負責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克萊街三一〇号康倫公司。(該題已于 1959 年 11 月 1 日作为“研究报告第五号”发表。)

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負責研究机构:伊利諾州伊凡斯頓城西北大学非洲研究計劃处。(該題已于 1959 年 10 月 23 日作为“研究报告第四号”发表。)

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的外交政策;負責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克萊街三一〇号康倫公司。(該題已于 1959 年 11 月 1 日作为“研究报告第五号”发表。)

上述机构和研究所将各向委员会提交一份研究报告。

总而言之,我希望,这些研究工作将向外交委员会提供主要的背景,从而使委员会能够完成下列基本任务:

1. 就反映美国人民动机和願望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向参議院和美国人民提供一份簡單明了而坦率的声明。

2. 鉴别那些现在或将来倾向于破坏或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的国内外势力。

3. 建议或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应付这种势力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基本目的的实现。

4. 检查这些国外和国内的势力和趋势对美国外交政策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的执行所发生的影响。

5. 检查外交政策的制订机构,以便决定该机构是否达到与我们的民主程序相适应的最高的效率。

在1月5日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为了“征求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士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个人意见”,还决定向五十来位已退休的外交官员发出信件。委员会要求这些已退休外交官员向委员会提出“广泛的评论,说明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以及根据你本人的意见,什么行动(或不行动)能最有效地为我们未来的利益服务。”

1959年6月15日,委员会以摘要的方式,也没有指出具体姓名,发表了答复委员会去信的前外交官员的意见的内容。凡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参议院中的同僚以及所有关心我国外交政策执行情况的公民,都应极其仔细地考虑那份委员会文件所表达的意见和态度。

在这卷里印出的研究报告“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委员会准备发表的。

十五个主要研究报告中的第九个。这份报告旨在帮助委员会寻找答案，来回答一份大纲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份大纲是委员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双方代表共同磋商的结果，它的副本已印在附录中。

我願借这个机会着重说明，委员会所收到的研究报告将向委员会提供背景材料，以供委员会在准备致参议院的最后报告时作参考。委员会当然有自由接受或不接受那些提交研究报告的机构和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和建議。委员会的职能就是評定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在准备最后报告以前，委员会将举行意見听取会，听取各有关方面的証詞。通过这种方式，委员会将有可能在作出自己的結論和向参议院提交最后报告以前，証明这些研究报告所作出的研究结果和建議是否正确。

此外，我願強調指出，委员会是以非党派的方式来对待这项任务的，它力图避免討論临时性問題，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在美国国内外发生作用的基本势力上，如果要我們的外交政策为国家服务，我們就必须了解这些势力。

## 提交研究报告的函件

約翰·霍普金斯大学

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所

1959年10月30日

華盛頓首府

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可尊敬的富布賴特

亲爱的参議員富布賴特：我很荣幸地将这份“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呈送给您。这份报告是按您所领导的委员会的请求并根据1959年2月20日贵会与霍普金斯大学所签订的合同，由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所承担编写的。

本报告旨在根据目前公认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分析可預見的今后十年的军事技术发展对执行美国军事战略以及实现更广泛的国家目标所产生的問題与可能性。

我們把研究重点放在战略武器方面，因为我們相信这方面的技术发展对美国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提出了最为严重的問題。我們也曾注意到預期的武器发展在經濟与心理方面的意义，但是我們并不打算广泛述及这些問題。

这份报告是由本所研究小組小詹姆斯·金先生、保罗·尼茲先生和我本人以及本所助理研究員爱倫·

基尔德女士和小威廉·貝尔登先生共同研究編写的。特別應該归功于小金先生，因为关于技术发展方面的几章初稿是由他起草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許多爭議方面，几位編写人通过本所内部的圓桌討論以及他們之間的意見交換与批評，取得了一致意見。然而，由于看法上在一些事实的解釋方面和在各种不同政策的估价方面仍然存有分歧，最后的裁決乃取决于作者——本報告的主編；因此只有他个人才对本報告所表示的观点和提出的見解負責。

報告編写人对下列諸君致以謝意：軍事專家們，特別是兰德公司的軍事專家們；本所研究員查爾斯·馬歇爾先生和漢斯·摩根索先生，他們研讀了報告的初稿，并提出批評意見。我們對許多核武器戰略著作的作者也表謝意，從他們的著作中所引証借用的材料远比書中注釋所載的要多得多。報告編写人同美國政府有聯系的某些人所進行的討論，在任何情況下均屬私人性質。任何從這些人得來的意見和情況并見諸于本報告者，并不一定就反映着政府的正式观点。

本報告所依據的全屬非機密性材料，其中大多數均可從公開出版物中找到。

您的誠懇的

阿爾諾德·沃爾佛斯  
(研究所主任)

# 軍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 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一部分 主要研究結果摘要

### 一、总論——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 目的和美国战略

美国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要促进和巩固一个适合于美国和自由世界利益的国际組織。这一目标超出了对狹隘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也不仅仅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的擴張而采取行动。对于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經濟、政治、軍事組織，与对当前苏联想要按照与此針鋒相对的原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願望进行斗争，美国負有主要責任。在由于这种意識形态的冲突而产生的冷战中，自由世界感到有必要动员它的包括軍事潜力在內的势力，以维护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秩序的原則和保卫自由世界的領土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美国核子壟断权的丧失以及苏联战略能力的日益增长，对維持一种适于美国实现其既定目标的軍事形勢增加了种种困难。可是，既然無論退縮到美国堡垒中去或者进行預防性的战争都不是符合美国

利益和傳統的办法，那么，不管有多大負担和風險，繼續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美国国家的基本目标，似乎就有必要了。

## 二、美国国防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和国外义务

只要冷战繼續进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以防止苏联威胁全世界自由国家的国防政策为基础。軍事防务需要有經濟、心理以及其他政策与之相輔相成，与此同时，准备适当的和足够的軍事实力是自由世界安全的先决条件。除对中苏集团作斗争外，美国对外政策还有其更广泛的目标，比如促进落后国家的經濟发展，这就要求我們不断給予注意，并作出牺牲，但是为了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影响了、而且有时还损害了对这一目标的追求。

軍事需要的范围是空前的。虽然美国在战后立即放棄了傳統的“单干”政策——表现为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这一事实并没有特別加重它目前的軍事負担，但后来为应付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建立的同盟或集体防务体系，却根本改变了它的战略面貌。由于同盟的防务范围几乎已延伸到苏联集团的边界，美国便面临着这样一个双重的軍事任务：一方面須保护它在欧亚边缘地带易遭侵略的海外盟国，免于中苏各种可



能形式的侵略，另一方面还得保护它那在来自苏联的进攻面前已不再是高枕无忧了的本国国土。但适合其中一个任务的战略和力量并不见得一定适合另一任务。

### 三、技术发展和战略平衡

#### (一) 緒言：东西方实力的关系

由于战略武器的效能支配着世界力量的分配，本节将专门讨论技术发展对于战略地位的影响。在这方面，当双方都不可能指望毁灭对方那种无比报复性反击能力时，即可说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力量的平衡或“核僵局”。假如首先发动战略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或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了的话，战略力量对比即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鉴于技术因素不能单独决定国际力量的对比，苏联和西方在非技术力量因素方面的资本就必须予以考虑。双方在版图、人口或战略思想方面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弱点，但是战略武器射程和速度的增加，削弱了美国过去所拥有的两种资本：它安居美洲大陆，免遭侵袭，它那工业潜力在战时的军事意义。苏联却具有几种从其政治制度派生而来的资本：如军事人力的动员、收集军事情报和采取军事主动等方面的优越条件。美国有非常优越的工业能力，但苏联人却已显示出他们

的技术才能，特别是在短短的发展周期内生产新式武器的技能。因此，鉴于苏联在某些实力因素方面日益增加的有利条件，便要求西方作特殊努力来弥补它们在实力分配方面的影响。

## (二)对技术变化的评价

发展新式武器对于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力量对比的重要意义，人们往往看不清或被曲解，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到武器的适用、使用时间、质量、数量等这些影响着一个新体系的军事和政治效能的因素。甚至军事技术方面最大的变化，如采用核武器，也没有在两大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导致明显的变化。美国核垄断时期，也就是共产主义相对地加紧对自由世界施加压力的时期。

可是，就是由于核武器所造成的军事技术上的革命，才使美苏之间军事力量的平衡或不平衡有着不可置疑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本报告的后一部分将着重谈谈最近的和预期的武器发展情况对于这种实力的对比和两个敌对国家所采取的战略的影响。

## (三)军事技术发展的几个时代

美国的军事地位在短短十五年内，已从绝对安全的地位降到一个大门洞开易于遭受直接和毁灭性攻击的国家的地位。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却日益上

升，但是假如苏联不是发展了使它能够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军事技术，它也就不可能这样迅速而成功地向美国进行挑战。

战后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大可当成一连串的武器时代——常规武器、核武器以及核弹头导弹等武器时代。每个时代对于两个敌对国家的战略力量对比和政策都产生了明显而重要的影响；而各个时代逐渐积聚的效力，使美国丧失了它那以地理位置和比较先进的技术为基础的绝对安全的军事地位。

以苏联1957年8月洲际导弹试验为先导的核弹头导弹武器时代的到来，大大地缩短了投掷洲际射程的核爆炸物所需要的时间，并相对地减少了战略性侵略的受难者所能得到的攻击警报时间。这些结果，再加上目前对飞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没有任何积极防御办法的事实，大大地增加了想在核战争中先发制人的诱惑力。这些结果也使敌对国一方的由人操纵的轰炸机非常容易遭到首先获得综合性的战略导弹武器的另一方的突然袭击。假如苏联人首先这样做的话（现在看来很有可能），现在还属于我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先发制人的显著优势将会转移给他们。就是这种可能性在苦恼着那些把六十年代初期的“导弹差距”看成是美国安全面临着空前危险的人们。

推迟或可能是阻止苏联获得这种军事优势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如更大程度的分散战略空军司令部的

轰炸机，使更多的飞机经常保持高度警戒状态以及其他保护性的权宜办法等。这些措施不可能保证将我们目前的战略实力保存到六十年代初期，但至少可阻止敌人赢得决定性的先发制人的优势。美国如果仅仅依靠加速生产我们目前的战略武器，是不可能消除这个已预料到的导弹差距，或大大缩短这一危险的过渡时期的。

预期中的六十年代的导弹体系，既将适于地下基地发射，又将适于以机动的陆海空为基地的运载工具上发射；后者经常在运动，就会大大地避免在第一次攻击中即被敌人探明方位，加以破坏。由于铁幕内外双方大量配有这类武器，因而双方可能及时出现的战略力量目标，其数目之大和种类之多，使之不能在突然袭击中被“消亡掉”。导弹体系的增多、加固或“动员”，至少会削弱双方对先下手攻击敌方战略力量的效验的信心。假如情况是这样的话，核弹头导弹武器时代即已进入以双方拥有相对安全的报复系统为特点的第二阶段。

#### (四)新武器时代的前景

在今后十年中，军事技术将继续加速度地发展，以改进特定武器系统的性能以及增加可能发展的武器系统的数目。武器竞赛将可能是这样一个规模与紧张程度，以致两大敌对国家的每一方享有一次又一次的机

会在它们所优先关注的领域中占上风。

战略导弹领域尤其是实用科学中一个相当新颖而未开发的方面，其技术必然会有相当巨大而迅速的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包括把洲际导弹制造得更准确可靠、射程更远、破坏力更大的各种方法，并且假如认为必要的话，还可使它在飞行中更难于被侦察与被破坏。射程的加长将使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达到全世界各地，但是准确性和弹头的改进，对减少摧毁地下的军事目标所需的导弹数目方面将有更重大的意义。美国固定导弹基地的威慑效用与苏联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说恰成反比例变化。

要发展能够充分保护广大地区不受核武器攻击的积极或消极防务系统，或甚至只是想要为某些其位置已被敌人知道的主要目标提供“不易受”具有数百万吨炸药的武器“攻击”的防御，现在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今后十年内，高度的国家安全可能依然是一个单靠军事手段不能达到的目标。报复力量的保护，主要将继续依靠大量的、分散的以及日后“可以移动的”各种战略武器系统。

预期的适于局部保护报复系统的技术发展，假如可以被美国充分利用的话，将使苏联以核武器进攻我国战略力量带有越来越大的冒险性因而使之不会把它当成一种理智的行动来行事。可是，这最多只是一种趋势，而且伴随这种趋势的是那些目前已使上述进攻

成为可能的武器也在不断改进。

那种认为现在全面核子战争所导致的彼此毁灭的程度或核子战争所带来的微粒的放射性伤害作用的广度和强度，足以使核战争成为“自杀性”（因而成为“不可能”）的看法，只不过是迴避我国面临着的最严重的军事问题而已。可能的侵略者要发动全面战争，对其自身的危险性可能会愈来愈大，但是至少在今后十年内敌人发动这样一种战争的趋势还是继续存在着的。作为这样一个战争的可能牺牲者的美国，应该有能力理智地打这一仗，并且应当极其慎重地考虑一下为本国人口的保护工作和善后工作所需要的民防措施。

可以预见的核武器制造的发展，将有可能减低这种武器的成本，从而增加分裂性物质的利用率。这种成就可望促进小规模战争核子化，以核武器武装盟国，并把核力量分布到更多的国家。可是，这种种效果看来在影响美苏力量对比方面不会是非常不对称的。

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毒物战争可以被认为在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程度。而这些武器却给民防和军事防务带来了一连串问题，并且也许会增加武器监督的困难，但是它们目前的军事效用却被人们夸大了。

战术武器发展的面越来越广，特别是那些便于地面和空中运送和便于使编制较小的军队发挥越来越大的火力的战术武器，将使迅速运用军事力量于世界各

个遥远的地区成为可能。这样，发动或结束一场有限度的或局部的战争，就会比过去更加迅速。

用于作战的人造卫星和低空卫星空间体系，在今后十年内可望被大量地和多方面地利用。它们可用于执行军事上的侦察与发出进攻警告的任务，以及便利交通、航海和天气预告，这对于美国有相当的好处，因为美国目前需要关于苏联的情报和管理配置在世界各地的军队。可是，它们被用来执行这些任务，将加剧美苏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并造成更多的新的紧张来源。这些问题看来很不可能通过区别“军事性质”或“和平性质”使用空间的办法而避免或解决。

使用这一时期可能发展成功的由人操纵的循天体轨道运行的运载工具和空间飞船，似乎是能够根本改变目前战略力量对比的，只是看来条件尚未成熟。

人们可以预料，今后十年的武器系统，由于它们的成本奇昂和复杂性，将妨碍美苏以外的国家达到军事大国的地位，或甚至使它们只能在最狭窄的范围内参加军备竞赛。新的战略体系所必然产生的影响之一，是美国与集体防御体系其他成员国家之间的力量悬殊的显著化，从而加深目前同盟国家内部意见分歧的紧张状况，并使维持和加强自由世界团结的问题复杂化。

#### (五) 战略力量平衡中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当有助于并有利于发动核子全面战争的情况和影

响为对立的因素所抗衡、所压倒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间的关系就处于“稳定”状态。

甚至侵略者也必然会在热核战争中遭受空前的毁灭，这是今天战略力量对比的主要稳定因素，而且在今后十年内也可能继续是这样。先发制人可能仍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但是，侵略者必须准确地使用大量武器进攻军事目标以赢得胜利，而对方运用少得多的武器攻击其工业和民用设施便可能夺去侵略者的胜利果实。

可是，与上述稳定因素相反的一些因素如下：由现代武器系统的特点和相互作用所派生的“机构上的不稳定”；由于发展或配置武器的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不稳定；由强敌所采用的战争威胁而导致的政策的不稳定；以及分布战略武器到更多的国家的事实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定。

倾向于不稳定的现代战略武器体系的特点是：易于遭受突然袭击，积极防务体系的效力比较低，以及由于警报和反击体系具有“一触即发”的特点，而可能因偶然事件或估计错误爆发战争。

敌对双方在武器体系发展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这就可能诱使某一侵略国在优势消失或转入敌方之手以前利用这种暂时强大的军事优势。现代战略武器体系的发展和适当数量的配置需时多年这一事实，使通过迅速补偿的行动来避免这种不稳定更加困难。可是，这



些由现代武器体系的自动化和迅速反应而派生的不稳定的技术原因，并不偏袒敌对国家任何一方；因而它们提出了监督技术的共同措施并使其实现成为可能，其中可能包括各种限制军备的协定。

### (六) 军备监督及其他稳定性措施

不管苏联同意不同意这样做，美国在今后十年内能够尽力达到很大程度的核稳定。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将包括使美国的报复性武器多样化、分散和得到保护以免引起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配备安全装置以减少发生“偶然性战争”的危险，改变我们的政策和军事能力以减轻自由世界目前为了安全而对于核威胁的依赖性。

但是假如核稳定将被作为我们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的话，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得采取战略核报复威胁以外的军事手段，来达到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并适应我国安全的需要。这些军事手段很可能将包括：大大增加我国非战略力量的机动性、兵力、火力、训练和协作，这样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大量的牺牲。一项选择核稳定的决定，将意味着甘愿忍受这种种的牺牲。

虽然单方面能够尽量通过范例、压力、以及外交和军事行动求得核稳定，但是仍然还有成问题的方面——例如分布战略核武器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以有效监督和视察措施为基础的正式协议可能

作出某种有益的貢獻。

关于“全面裁軍”的建議，如苏联最近所提出的，这方面应謹慎地加以研究。一直裁到国家警察部队这一层的最大限度裁軍并不等于最大程度的穩定，而且事实上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在一个全面裁减軍备的世界里，甚至秘密制造的少量核武器就可能破坏国际秩序，而使某一个国家有可能控制它的更守信用的敌对国家。令人怀疑的是，是否有任何能筹划出来的远非令人滿意接受的視察制度能肯定地发觉这种違反協議的事情。由于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引起的国际爭端，無論如何都可能導致恢复劇烈的軍备竞赛，而归根結蒂，还是凭着軍事力量和技术决定勝負。

比較有助于核穩定的制度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允許每一个大国保留大量的报复性的武器体系；这些武器比較能防备突然襲击，但是它們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毀灭力量更适合于报复性任务，而不适合于在突然襲击中毀灭敌对国家的战略力量。潜在的侵略者的兵工厂里秘密增加几百件核武器，也許不会破坏这一制度；而企图破坏这个制度将需要很大的力气，以至有被偵察出来的极大的危險。实施这一制度的严肃的制裁問題和保卫这个制度下非核国家的安全办法，仍将继续存在。

那种认为能够設計出一种“安全无比”的軍备监督和視察制度，或能朝着这个方向作巨大努力以达到絕

对稳定的想法是极不可靠的。但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今后十年内尽可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核稳定，是符合美国、苏联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的。

#### 四、威慑与反威慑战略的发展

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即广泛地依赖战略核力量来支持外交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对付苏联直接攻击美国这种特定威胁的对策而提出来的。为此目的，一旦苏联人以无法有效抵御的武器武装起来时，除核威慑外别无他途。

由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原因，这个战略后来被扩展到阻擋更早存在的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进行常规军备侵略的威胁。这样，它便被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并利用了由于强大战略力量的存在而产生的有利效果。但是核报复能力和核武器本身一样，不再是美国的专利了。苏联日益增长的战略力量具有限制我们进行自由报复的反威慑效果，因而除了对美国战略力量进行攻击外，缩小了我们威胁要以战略武器反对侵略的威慑价值。

核保证已默默地从某些外圍地区撤消，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防御那些对美国利益来说不属于外圍、但为维持我们的威信而承担义务很重的那些地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着。在这方面，特别就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國家而論，除核威懾外還沒有其它令人滿意的辦法。

## 五、战略核子威懾力量的危机

日益增長的蘇聯戰略能力，正在降低美國的戰略核力量的威懾價值。

只要美國主要由人駕駛的轟炸機所組成的報復力量仍駐扎在未設于地下的、非機動的、不隱蔽的基地上，它們就仍然極易遭到導彈的攻擊，這樣蘇聯突然襲擊美國的可能性就沒有排除。雖然蘇聯人也許決不會獲得有把握擊敗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能力，但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可能有一天寧願冒殘缺不全的戰略空軍司令部可能給他們造成的損傷的危險，而不願冒險不對美國的戰略部隊採取先發制人的襲擊。

由於蘇聯對先發制人的進攻 (first strike) 沒有把握而不敢輕舉妄動，美國報復力量甚至在它有易受攻擊的嚴重弱點的時期，也保有巨大的威懾價值。可是，除非戰略空軍司令部目前的弱點在短時期內得到彌補，美國的安全必定仍然是沒有保障的。

理智的先發制人的攻擊必須針對敵人的戰略力量，以便減低因敵人報復而造成的破壞程度，而反擊 (second strike) (或稱報復性的攻擊) 在選擇目標方面的戰略却較靈活一些。但是，為了增加威懾力量的可

靠性，以及在威懾失敗的情況下，為了發揮最大的軍事效力，反擊應在條件許可下儘可能先對軍事目標下手。

假如美國和蘇聯雙方都擁有能夠摧毀第二次報復性攻擊的、比較不易受到攻擊的戰略力量，戰略力量對比就會更穩定。當然這只有保持住上述能力時才是如此，這種戰略上的僵局，雙方都不能夠認為它們的戰略力量是合理的進攻或戰略干涉的工具。因此，假如美國和它的盟國承認這樣一種將會減少全面戰爭危險的戰略僵局有可能出現並合乎願望，它們就必須提供另外一種辦法來代替美國戰略干涉威脅的辦法來阻止國外共產主義的非核子侵略。

美國的盟國可能遭受蘇聯核攻擊的危險不會比美國大，因為蘇聯人在越過戰略空軍司令部時，將把他們自己暴露於美國事先已具有充分戒備的進行報復的戰略力量面前。對於各種中蘇侵略形式中的另一種侵略形式，如“外圍”侵略，美國戰略干涉的威脅就不復成為可靠的威懾力量。然而在這地區，當地的武裝部隊承擔了相當可靠的防禦。

最大的危險是介於外國侵略與核侵略之間的“中間狀態”的挑釁。盟國孤立的戰略力量所進行的報復威脅，不能很好地代替戰略空軍司令部對這類較小侵略的日益減低的威懾。因為這些力量所採取的無效的城市轟炸（假如實行的話）的威脅，所引起的自我毀滅，

将使威胁不起作用。另外一个办法，即大力依靠战术核武器，人们不能指望它能弥补当地部队在数量上的劣势以抵抗配备有同样武器的苏联军队。而且，“战地国家”如果为了应付非核子攻击而发动战术核战争，就等于自取灭亡。然而，当地部队应当配备这些战术核武器并加以训练，以便阻止苏联首先使用这种武器。同时，美国和盟国当地部队的常备能力，以及随时可用的后备军，应当强大到足以阻止或抵擋任何苏联人可能认为不至于挑起美国进行战略干涉的攻击。

即使极不易遭受袭击的可靠报复力量能够对苏联的战略攻击起一种威慑作用，当地部队能够阻止或擋住非战略侵略，也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应该放棄維持或取得打击苏联战略目标能力（“反击能力”）的一切努力。虽然有效的先发制人用以支持战略干涉威胁的对等力量的目标也许是不实际——鉴于战略不稳定——和不可取的，但是一定程度的用以进行反击的攻击力量将是必需的，假如美国想要能够：第一，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能有效地作战；第二，使报复性攻击在军事上有用；第三，在技术竞赛中不致落后；最后——也许是，迫使苏联把它的努力轉向于保卫它的战略力量，否則它的这种努力将会用于增加它的先发制人的反击力量的能力上。

## 第二部分 若干建議

本報告对美国軍事政策的方向和重点提出若干修改意見。它強調坚持美国全面战略方面一般既定目标的必要性(見報告正文第一篇)，除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和目标外強調該战略的基本軍事需要的不可動搖的重要性(于第二篇討論)。

鑒于过去的和預期的軍事方面的技术发展(見第三篇)和美国及其盟国所面臨的战略問題(在第三篇第五、六兩章及第四、五篇中均有討論)，謹提出下列措施以供参考。可是，应当說明的是：本報告限于特定的論題，因而不包括除了影响到或有助于达到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軍事技术以外的种种因素的全面分析；也不包括关于預算标准的分析——根据这个分析，所提出的行动方針一經通过，即須与之适应并加以制定。因此，下列建議只能說明方向和重点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必要性用軍事技术方面的发展来加以說明。对需要付诸实施的实际計劃作出确定的决定，必須考慮其他一切因素，而这些因素由于本報告篇幅有限，只好不作詳細的說明了。

1. 由于美国战略力量及其全部組成部分的高度安全对于阻遏苏联对自由世界(包括美国本土在內)进行

先发制人的攻击或战略突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故应给予并增加对它的优先重视，而且还要作出及时的努力，以减少美国及其盟国战略力量的易遭击破的弱点。其措施则应包括：通过加强机动、隐蔽、地下化和分散等办法来保护空军基地、轰炸机、操纵中心、导弹发射基地和人员。

同时还应该不断努力改进投掷体系和渗透手段，这样甚至在敌人攻击下大大削弱了的报复力量也能够命中它的目标。适于这一目标的措施将包括：改善电子反击装置体系和其它电子战争工具、改进渗透战术、发展从空中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用以攻击空防设备以及其他有防备的目标。

2. 由于权宜的防御办法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对维持一种可靠的威慑有必要，但却抵消不了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易遭弹道导弹突然攻击的日益增加的弱点，并且由于早期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阿特拉斯”和“大力神”的发射基地不够安全，反应不够迅速，或目前计划的数量不足以在六十年代中期和后期给美国提供充分的威慑声势，故应尽最大努力加速发展在大小、重量和机械简化方面均适合大规模生产和适用于机动基地的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还应作出相应的努力以完成设于地下的陆上导弹设施以及可以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发射的机动导弹体系。

3. 这样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战略武器计划目标，



不应当是为了“赶上”假定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的优势，而相反地应当是早日获得为数众多的各种比较安全可靠地报复系统，以便使强大的侵略者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发觉和摧毁大部分这些系统丧失信心，而不敢冒险发动突袭。

虽然美国要继续维持一支在第一次攻击中足以将苏联的战略报复削弱到一定程度的战略力量将日益困难，甚至于从维持战略稳定的角度考虑，也不想在这一方面着眼，但是美国应当保留一定程度的反击能力，足以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中，选择合理的打击目标，并足以对付有限度的战争和达到其他目的。

4. 鉴于在那些遭受小规模侵略（即对美国以外的自由国家进行颠覆和间接侵略以至纯属“常规武器”的攻击）的广大地区中，美国的战略力量的威慑价值已日益减低，美国及其盟国应加紧致力于增强代替美国战略威慑的措施。

5. 由于孤立的盟国战略力量很少能有助于美国战略力量所提供的威慑作用，并由于它们可能分散盟国更急需的建立当地防御的精力。因此美国就应当劝阻它们建立或发展独立的核子力量。假如我们的盟国不听劝阻的话，美国即应设法把它们努力引导到机动的或受保护的报复体系方面去。为此，美国与其盟国分享关于建立地下的导弹发射场和制造固体燃料导弹的技术情报将是有益的。

6. 虽然有必要以适合于战术核子战争的武器装备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以便阻止苏联发动战术核子战争，但却不应当因此就认为不必再建立充分的非核子力量，其原因有二：第一，假如战争发生，依赖核武器，即使是战术性的，也会使“战地国家”遭受莫大的破坏；第二，核武器弥补不了用来抵抗同样装备的敌军的军队在兵员数额上的劣势。

因之，美国应增强它的非核子武装力量，并保持适当水平的两用武装力量以保护其海外利益。同时，美国应促使其盟国优先重视建立非战略两用武装力量的计划；这样，在美国支持下，将能阻止或挡住苏联人。鉴于美国继续对大规模侵略进行战略干涉的威胁具有一定限度而敢于发动的进攻。

7. 由于空间技术已成为可能使一个新武器时代出现的少数领域之一，美国就不应让苏联在这方面超越自己的成就。美国应首先设法发展一种具有足够的推动力和可靠的动力装置，以便为能够发射到空间去的物体的重量和弹道提供多种可能性。除非有朝一日空间的军事意义已显然无足轻重，美国应继续把主要努力放在空间方面，这是美国国防政策的一个部分。

8. 假如美国要采取步骤制定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代替对付挑衅性较少的中苏侵略的战略威慑，它就应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单方面行动，通过促进双方行动和通过旨在谋求战略稳定的军备监

督政策,来增加战略对比中的稳定。

美国除增加其本身的报复力量的安全外,应避免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例如把极易遭受攻击的战略导弹体系配置到邻近共产主义集团的一些国家的领土上。美国还应继续避免采用那些可能因偶然差误而引起战争的“一触即发”的机械反应。同时还应当促使其他国家避免产生类似的不稳定的因素。

军备监督政策的目的是,不应当是全面核子裁军,那只会使协议破坏者由于秘密生产相对少量的核武器而占上风。而是应当把战略力量限制在报复系统以内。这种系统虽然不足以用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但却要能够经得住这样的一种打击。

## 第三部分 报告正文

### 第一篇 总論——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目的和美国战略

一般认为军事力量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政策，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存在为了支持军事力量。大家也都同意，军事技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系到军事力量在任何程度上和范围内可以支持国家政策，也关系到敌人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我们国家政策有多大威胁。本文的目的就是更加详尽地讨论对外政策和军事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概論，陈述某些关系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和目标的前提是有用处的。下面的讨论就是以此为基础。

在宪法中规定了美国的基本宗旨：

“……組織更完美的联邦，确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建立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謀求我們自己和后代子孙享受自由的幸福……”。

我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根据这个宗旨而产生的。这就是要促进和保证世界形势能使每一个抱着与我們同样宗旨的国家可以得到生存和繁荣。

我們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世界所給予的教訓是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它不能让世界体系的面目主要由其他国家的責任和意志来决定，而仅仅考虑自身狹隘的民族利益。換句話說，我們目前所处的地位是我們必須承担起建立和維護一个国际組織的主要責任，这种責任是和我們今天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相适应的，并且我們相信能够作到。

在这一点上多引伸几句或許是适宜的。

在考虑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时，一种可以想得到的观点是強調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安全，強調敌人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強調苏中共产主义集团的企图。从这种观点出发，盟国對我們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們對我們的利益和安全有帮助，而我們对外政策的目的基本上是防御性的。那就是說不使俄国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受他們控制的那些国家的人們扩展到足以威胁我国直接利益和安全的地区。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美国的利益和安全直接依靠于建立起某种形式的符合我国利益和傳統的世界秩序。建立和維護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美国作长期的和創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仅限于对共产主义侵略采取行动。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們政策的目的，就更多地側重于我們所要建設的方面，并在建設中予以保卫，而不是仅仅限于专事对付共产主义的侵略。

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简单地回顾一下前一个历史

时期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世界秩序和稳定情况曾經是相当好的。

1815年到1914年这一世紀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这一百年中，欧洲国家間的力量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对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起了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想統治世界都是不实际的。英国牢固地掌握了海洋，它是对大陆上列强的野心的一个約束。英国沒有强盛到妄想統治欧洲大陆的地步。它成了維持欧洲大陆帝国間力量均衡的工具。沒有一个欧洲以外的国家掌握了足以全面爭夺欧洲领导权的现代技术或工业基础。以金本位为基础、以倫敦資本市場为中心的經濟組織形成了一种經濟結構，在这个結構內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在內，能够迅速地发展它們的經濟。当时以公共义务为基础的习惯法和政治組織的原則开始傳播到世界各个遙远的角落。尤其是在1914年以前，历次战争在它們的地理范圍和参战国所追求的目的方面都有限度。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技术的发展 and 傳播粉碎了这一体系。欧洲的力量均衡以及賴此存在的那些帝国都被摧毁了。英国的实力被削弱了。由于射程极远和破坏力极大的现代武器系統的出現，海上霸权的重要性减少了。欧洲国家居首逞强的地位已大成問題。一个强盛的美国和一个极端敌对的俄国后来居上了。

从第二个观点出发，国际局势中的根本問題不仅

是美国的安全，而是由誰来建立起一个适应世界现状的新的国际秩序，用它来代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粉碎了的旧秩序。不管我們是否經常充分意識到我們自1946年以來就一直設法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是在與蘇聯及其盟國進行競爭，看看是它們，還是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可以成功地建立起這種新制度。

我們從1946年就打算建立的新國際秩序結構的主要因素以及在建立後保衛它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

這一新組織結構必須具備政治、經濟、軍事三個部分。它必須能起某種世界性的作用，必須在世界體系中密切區域組織之間的关系。美國必須始終在這個體系中擔任一個舉世無雙的角色，因為只有我們才有擔任這一工作的需要的能力和意志。這個體系還必須不懈地抵制蘇中共產主義集團那種敵對的和破壞性的努力。它們是致力於建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體系。

經濟方面是這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各個部分與聯合國機構結合起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這樣一個組織，它矚目於尋求世界貨幣更加穩定，以適應資助世界商業的需要。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聚集了大量資金，以便撥往那些需要資金而又能妥善利用資金的地區。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下的協定，是為了減少國際貿易中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礙。由於區域性和雙邊活動，諸如馬歇爾計劃、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支付同盟、技術援助計劃以及哥倫坡

計劃，更加强了这些国际組織。我們通过美国經濟政策以支持这些国际間的、区域性的和双边的接触。这些經濟政策通常是与我們作为世界上首要債权国以及作为資本和技术的主要宝庫的新角色相适应的。

在軍事方面，必須着手建立起一个类似的組織結構，由各种国际性的、区域性的、各別的协定組合起来。这些軍事协定必須以居于中心的力量为其核心，这就是美国本身的力量。为了补充居于中心的美国力量，我們曾作巨大的努力，通过美洲国家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东南亚条約組織、共同防务援助計劃，以及通过我們与大韓民国、中国国民党和日本簽訂双边协定，来建立外圍力量。大部分非共产主义世界国家都已通过一个联盟体系紧紧地連系在一起了。甚至部分联盟体系以外的自由世界国家，也由于世界进一步接受了制止使用侵略性軍事力量的原則以及我們对这一原則的积极支持，而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这些經濟和軍事措施已被包括在一个政治結構中，其最广泛的部分为联合国，但它的心臟和活力却是美国所担負的职責。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种政治关系的典范，其特点是美、英、加之間特別密切的合作；并通过与法、德、意及日本的密切关系（当然不如美、英、加三国密切），扩大这种合作，同时还逐步扩展到与印度、緬甸等这样一些中立的但不承担义务的自由国家，在某些基本問題上实行合作。



我們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安排異常灵活具有容納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不同利益和要求的强大生命力的机构。甚至对共产主义世界來說，我們也希望这个組織对它們能有所貢獻，并且依靠它的吸引力运用策略从共产主义世界行列中拉出一部分国家来，如对南斯拉夫那样，或是削弱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联盟，如对波兰那样，但对共产党中国却失败了。

目光远大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宗旨，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目标和綱領，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

第二次大战結束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覺察到美国在战争胜利后負有新的責任。当时他們並沒有追求民族利益和民族安全的狹隘想法。他們要求他們的領導人奠定一个符合所有自由人民基本利益的新秩序的基础，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美国发起建立联合国，謀求保証东欧人民获得自由选举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权利，設法迅速締結寬大的和平条約，使战败国回到这个世界大家庭里来，并对早已出現的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的行动給以支持。这些政策之被推行是因为它們本身具备許多优点，而不仅仅是一种对后来公认的苏联威胁以及共产主义的敌对行动和擴張主义的反应。事实上，很多人本来期待着，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强大的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将能使它們战时的合作在和平时期繼續維持下去，并能防止战时的敌人或任何新的侵略力量再来扰乱和平。

然而，苏联的領袖們却迅速地、頑固地表示他們沒有繼續这种合作的願望，实际上，他們正着手建立一种他們特有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和我們所理解的一切正义和公道的概念截然相反。这种情况虽然沒有使得美国的宗旨根本改变，却因而改变了美国目前不得不繼續执行全面战略的特点。冷战的产生是由于在如何改造世界的看法上产生了两种敌对的、至少到目前还很难一致的观点的冲突。它已发展成为一种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不但美国，而且整个自由世界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因此，那些烏托邦式的見解再也立不住脚了，抱着这种見解的人认为：美国所应作的只是提出一些能符合全世界自由人民基本利益的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安排，然后通过复原军队，解散那些美国当作一种歧視的政治工具以有效地施展其影响的政治經濟組織机构，以树立美国无私的光輝的榜样。不久就明显地看出，我們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我們和所有与我們对这个国际問題抱同样看法的国家的一切有影响与威力的手段、軍事力量以及經濟、思想和道义上的力量，都必須动員起来并投入这个斗争。本報告第二篇和下面各章将要討論的軍事政策与軍事实力必須占有重要地位这一見解曾引起国内許多人士的震动，并且在国外也被人利用来制造成一个軍国主义美国假象。

抵御苏联和共产主义擴張严重威胁的必要性，迫

使美国改变它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性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具有的判断宪章是否受到破坏并采取适当集体制裁行动的作用，由于苏联经常使用否决权而遭到了破坏。美国必须改变它原来的希望，即认为它能够在联合国组织范围内，求得它的安全和其他政治利益，而将其联合国范围以外的活动局限于同所有那些致力于建设和发展经济、文化的国家进行和平合作。而与此相反，它必须与盟国建立集体防务联盟，挑选盟国的准则往往不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文明与美国一致，而是因为它们对共同防务事业能够有所贡献。

而且这种发展正好出现在世界进入核时代的时候。最初，美国壟断核武器的事实使人忽略了上述情况的巨大影响。大家也常承认这种壟断将是暂时的。然而，我们还是这样想：美国在技术上占了优势，就可以指望在战略上永远比苏联集团占有优势。

甚至在我們壟断原子时期，就发生了军事力量和我們的政策与战略之间的严重关系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我們建立并维护一个彼此相容的世界秩序机构的基本目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鉴于苏联敌对的和顽固的态度的实际情况，我們的国家战略就必须随之予以修改。因此在军事政策和策略领域内，我們所面临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我們必须具有适当的军事力量，以使用武力与权威来维护世界秩序制度中所包含的国际行为的原则和准绳，这种世界秩序制度是支持

联合国宪章的我們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所要建立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须具备足以与苏联和它的伙伴的軍事力量相抗衡的軍事力量。軍事力量的第一个作用，在国际范圍中，有点像国内的警察力量。警察力量要能起作用就必须是无可非議的；必须是和一个高度一致的社会（通过同意的程度来决定事务）相結合的；以及必须是那种能防止罪犯而不致破坏社会的力量。我們軍事力量的第二个作用，即与苏联保持軍事能力的平衡，其中包含着要使我們的軍事能力可以影响苏联领导人不去选择訴諸武力的途徑，或者，一旦威懾不起作用，就能去摧毁苏联的軍事力量。

在我們壟断原子时期，似乎我們的常备軍就應該足以适应第一个作用，而加上我們原子能力的作用就使我們的軍事力量應該足以适应第二个作用。然而，不久就很明显，大部分我們认为是破坏联合国宪章原則，因而需要采取集体惩治行动的問題，都会遭到苏联集团的反对。因此，这两个軍事战略問題似乎就合而为一了。假定真是这样的話，那么用在第一个作用上的武器和力量，也就应当能够用在第二个作用上。每逢我們必須面对那些涉及到动用武力但苏联的軍事力量还没有真正全部牵涉进去的事件时，上面的說法就显得不完全正确了。在任何像过去在朝鮮、印度支那、苏伊士运河和金門发生过的形势下，使用原子武器一向都未被认为是恰当的，更不用說是使用大型热核子

武器了。

很显然，随着我們原子壟断的消逝和苏联軍事技术的飞跃发展，想选择一个适当的軍事姿态，用以支持我們对外政策的复杂目的，是愈加困难了。

許多人认为我們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軍事、財政和心理負担太重了。因此一些人认为我們国家所遵循的方针，会使美国疲于奔命，并会給国家带来灾难，因此他們对这一方针是否能实现，是否值得执行，表示失望，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一派人主張閉关自守，就是美国堡垒政策。这样，美国就能从欧亚大陆及其邻近地区里摆脱维护这些国家独立的責任。另一派則多少公开輕率地主張跃进一步，准备打一場防御性战争，这样只要能解除敌人手里軍事力量的工具，就能使战争及早地結束。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种意見。

撤退到西半球将把世界的其他部分置于苏联的控制下，并将把美国变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孤島。防御性战争将破坏美国正在謀求的建立世界秩序所依据的原则，并会使世界上的某些力量与我們疏远起来，而这些力量正是我們朝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方向前进时所絕不可少的。上述两种政策，都与我国所熟悉的責任领导权的概念背道而驰。

因此，假定我們不打算順从苏联对世界秩序的观念，那么在苏联至少承认某些公理、正义和互利的基本

原則之前，我們似乎不可避免地要繼續支持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所發展的國家政策，儘管它是錯綜複雜、負擔很重而且帶有冒險性。

本文的其餘部分將要更詳細地談到支持這一國家政策的發展中的軍事問題，和發展中的軍事技術對這一問題的影響。

## 第二篇 美國國防政策取決於美國的 利益和國外義務

### 第一章 從冷戰意義上看美國外交政策

#### (一) 防務的任務

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它與中蘇集團處於尖銳鬥爭之中，目前又沒有在任何可以接受的條件下解決問題的办法，因此保護和防衛它所珍惜的各種利益免受強大的敵人侵害，就在它的外交政策中居于主要地位。在許多方面，諸如貿易政策、經濟援助或支持聯合國等對外活動，已不得不從屬於防務的需要，因而，的確，也不得不把它們變為無所不包的冷戰政策的工具。這種政策超出了純軍事範圍，因而也超出了軍事實力和科學技術因素起直接作用的範圍。像宣傳和經濟援助這類活動，對於為提高軍事實力和威望而採取的措施，如建立和增強同盟和友誼以及削弱敵對陣營的團結和士

气等，具有补充作用。

有人担心我们对这些非军事政策的关心，可能因过多考虑军事防御而受到影响。美国正受到批评，特别在国外，好多人都认为我们过分强调军事。据说，当前苏联的威胁乃在于它通过颠覆或者“间接侵略”进行扩张。这在今天也许是如此；或者说，在将来也许会如此。但是，这些批评家忽视了苏联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转而采取军事行动——正如红色中国曾不止一次做的那样——此外，共产党人之所以避免使用武力，可能反映他们不过是考虑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反击力量而已。总之，尽管中国的胜利是由于它有一支能够完成共产主义化任务的土生军队，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是由于它实际上处于苏联军队包围之下，但苏联除了使用武力以外，还没有其它更好的代替办法，过去苏联曾使用军队把东欧国家变为莫斯科卫星国。

因此，只要美国和它的朋友们一如今天这样受到强大敌人的严重威胁，军事政策将会由于迫切需要而继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因而美国的国家总战略的成功亦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高度成就和战略思想的高度水平。

## (二)“与人协作”的政策及其对 美国外圍防御的影响

从日本袭击珍珠港到签订北大西洋公约这短短的

时期中，美国外交政策連續经历了两个显著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比第二个更大，但是其影响不及第二个深远。

在美国参加联合国的时候，傳統的美国“单干”政策——通常称作孤立主义——就让位給“与人协作”的政策了，即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这种第一次脫离固有傳統的行动，反映了为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的信念，要是美国在战事爆发之前就跟其他国家合作維持世界和平的話，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也許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在联合国組織範圍内进行合作，看来并未对美国的防务政策和軍事需要产生多大影响。根据联合国宪章規定的集体安全条款，在联合国組織未能产生威懾效果时，对某一个被譴責为侵略者的国家應該采取“警察行动”，这时，可能需要美国采取軍事行动，否則美国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但是，由于这种行动的根据是假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胜利的大国都被列入“警察”的行列，因而可能的侵略者只能是小国，或者是被解除武装的前軸心国家。因此，战争結束时，美国武装部队迅速而广泛的复員，和作为一个致力于“集体安全”的国际組織中成員国的身份并不矛盾。

第二次政策改变导致广泛的“集体防务体系”的建立，由于对美国本身的軍备及美国的軍事战略提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要求，因而就根本改变了防务面貌。当战后胜利者之間，特別已成为被公认的两个世界领导者，或者說两个超級强国之間の所謂团结和合作让位



給“冷战”或“东西方斗争”时，这种局面就出现了。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扩张主义的和有利的共产主义政权集团，其工业和军事威力正在迅速地增长，美国很快就认识到要应付这些对世界安全的新威胁，既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依赖联合国的支持来反抗敌人，因为敌人也是这个世界性组织的成员。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同盟政策<sup>①</sup>，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同意和一大批国家一起参加共同防务措施，专门用以对抗只能是来自中苏集团的威胁。虽然联合国宪章下的集体安全义务仍然有效，但集体防务的需要现已成为衡量及判断美国军备力量的准绳。

美国为回答冷战的危险而逐渐形成的军事政策，有许多显著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方面是合作，这和早期对“使人受连累的同盟”的各种非难性或强烈的对比：

1. 它是一种为回答进攻而非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中苏集团的进一步扩张。就军事政策的目标而言，使用“遏制”这一名词仍然是恰当的，因为这一政策从来也没有打算用武力把铁幕和竹幕卷起来。有些批评家非难这一政策，说它防御色彩太浓了，虽然我们可以指出，从军事需要来说，这样的“单纯防御”实际上是一种极为深谋远虑而又艰巨

<sup>①</sup> 此处所用同盟和集体防御二词的意义相同，系泛指所有形式的结盟。

的任务。

2. 它是寻求并欢迎任何准备与美国共同致力于集体防务的国家进行合作的政策。虽然大多数可能成为同盟的国家在冷战开始时几乎完全缺乏军事力量，然而，一般认为，在美国的帮助下，它们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地理位置，会发展成为阻遏侵略斗争中巨大的、并在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有价值的东西。

3.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保护下的区域——或者说，在美国防务范围内的区域——实际上扩大到尚未为中苏洪流所席卷以及尚未陷入铁幕与竹幕的所有地区。至少，当苏联集团对非共产主义世界任何(除了最遥远的)地区发动军事攻击时，希望美国不会坐视不理是有理由的。毫无疑问，美国提供这些援助的动机，在许多情况下是和那些为保卫自由而反抗苏联侵略的国家的愿望完全一致的。就西欧来说，这种一致性本身就足以打消任何采取一种美国堡垒战略的孤立主义想法，且不說它与美国自己的安全攸关。但是，关于防务线为什么要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扩展到那些对集体防务既不願意又不能作出任何重大贡献且易受攻击的国家的边疆，則可以从地理政治的情势中去找进一步的說明。

自从軸心国投降以来，用地理政治的术语来说，世界已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形势：(1) 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其后并扩展到中国

海；(2)在欧亚大陆的邊緣地区及其附近島屿，是一連串易受攻击和比較弱小的国家，它們与苏联集团的边界接壤綿延达两万英哩；(3)以美国为中心的另—权力集团，位于几个大洋的对岸，距欧亚大陆的危險地区达数千英哩。如果美国要作为一个自由国家而生存，和其他非苏維埃化国家要維持生存一样，需要依靠一个合理的世界实力均衡的話，那就要設法阻止苏联向那些易受攻击与防御較差的邊緣地区进行擴張，否則勢将造成一場无可弥补的会摧毁現存但不穩固的世界均势的巨大災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美国的遏制政策，即把美国的力量帶到欧亚大陆的海外地区去，要不然苏联就可能在那里进行擴張。

这种世界均势的維持或者恢复对美国的重大利害关系，說明了为什么这种防护外衣不是、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保护那些能对集体防御有所貢獻的国家或者甚至那些急于要取得保护的国家。这并不可推論下去說，沿着鉄幕与竹幕的整个領土現狀已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是每一个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其本身必然会損害势力均衡到如此程度，以致需要不惜进行战争的冒險与牺牲。然而，由于一种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和它的盟国未能有效地援助某一个想要抵抗苏联威胁的国家，就可能破坏整个集体防御体系，因而使均势发生有利于苏联的严重变化。这种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接骨牌的效果”(domino effect)①，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易受攻击的国家将会对美国的保证与集体防务丧失信心，因而放弃它们继续作为自由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需要有一种军事上的气魄，来适应大致沿着目前已被承认的中苏集团疆界而建立一条防御线的要求。这种信念的含义，已在像金门、黎巴嫩和西柏林这样遥远的地方得到说明，就后者而言，虽然是苏联集团内部一块被包围的领土，却同样享有集体保卫的权利，就好像它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个同盟国那样。

## 第二章 美国国外军事义务的范围

### (一) 集体安全与集体防御

作为一种集体势力的遏制政策已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逐渐发展起来，而在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和馬尼拉条约草案的情况下，还附加了根据某些规定的条件单方面承担军事支援的义务。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义务的网络，由于美国在各个地区承担义务的范围既有不同，而有关国家保证提供相互支援的程度亦有差异，就使得对美国在军事方面的要求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

并不是所有美国承担的义务，都限于防御苏联集

① 指一种外国骨牌游戏，一个接不上就会连续使对方占上风。

团国家的武装进攻或军事侵略。有些是针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还有些则专门为了防御共产主义国家的“间接侵略”。在后一范畴内美国承担的义务并非明确针对苏联集团国家的，有下列几种情况：

联合国会员国至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任何被联合国谴责进行侵略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只要是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建议采取这样的行动。此外，根据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些官方声明，美国在必要时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即使没有任何联合国机构的建议，它亦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考虑到自己在法律上有根据、在道义上不得不对某一侵略者采取“警察”行动的情况下采取这种行动。

第二，像里约热内卢公约这样一种美洲国家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也不仅限于只在冷战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而是要求美国和其他二十个成员国一样，有义务把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攻击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攻击。

第三，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或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在任何中东国家的请求下，使用武装部队抵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任何国家”的武装侵略。这里，侵略者可能并不属于中苏集团的国家，虽然它也许有着该集团的支持或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在行事。

最后，1947年3月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的

被称为杜魯門主义的演說宣称，“支援那些正在抵抗着图謀使自己屈服的、持有武装的少数人与外部压力的自由国家的人民”，是美国的政策。虽然这种支援主要是經濟与財政方面的，然而，当証明有必要抵抗現在通常所謂的間接侵略的时候，則可以理解杜魯門主义的内容包括承諾給予軍事援助，而且已經作过这样解釋。

虽然上述四項义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非不重要，但在对抗非中苏集团国家或并非为中苏集团支持的国家的侵略方面，似乎都不大需要美国的軍事力量并为援助进行准备。一般說来，美国通常可調用的軍事力量，足以胜任对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采取“警察行动”，不論是在西半球范围之内或之外，也不論这种行动是由美国单独采取，或者——看来更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共同采取。

相反，下述一系列虽然一般并不是显露地、然而准确无誤地对付中苏集团的集体防御协定与义务，却可以断定它們对美国提出了十分严重的軍事問題。

美国——还有加拿大——和海外国家締結的第一个这类集体防御协定就是北大西洋公約，根据該公約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該公約的軍事意义与政治重要性仍然超过其他一切条約。和里約热內卢公約一样，它要求十五个締約国把对它們在欧洲或北美的“某一个或数国的武装襲击”視为对全体締約国的襲击。根据公約第五款，締約国有义务“单独或协同其它

締約國採取必要行動(包括使用武力)協助被攻擊之一國或數國,借以恢復並維持北大西洋區域之安全'。雖然美國和所有其他締約國一樣,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判斷去決定需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以達到上述目標,然而美國既然要恪守信義,只有維持大量足以擊退進攻的武裝部隊,並在一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何地區受到攻擊時,投入戰鬥;才能盡到公約所規定的法律義務。此外沒有其他可望“恢復和維持”該地區“安全”的辦法。其後的集體防禦協定,沒有一個具有與它同等嚴格的軍事義務,雖然它們在防務上也還有依靠美國軍事設施的意義。

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有與蘇聯交界、因而也會直接受到蘇聯侵犯的歐洲非共產主義國家——芬蘭、瑞典和奧地利除外——均根據條約保證能得到美國軍事支援抵抗來自鐵幕後面的進攻。瑞典和瑞士、愛爾蘭這兩個並非直接易受攻擊的國家一樣,決定依仗中立政策以保安全;芬蘭和奧地利則除此而外別無其他可以選擇的道路。

朝鮮戰爭後,美國即開始着手填補亞洲軍事力量的真空,首先在遠東,其後則在東南亞和中東。

1951年,美國很快就連續與某些國家簽訂了一系列的防禦協定,先和日本,再和菲律賓,最後和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美澳新安全條約),接着在1953年和大韓民國簽訂了一個“共同防禦條約”;並在1954年和中華

民國簽訂了相似的條約。所有這些條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里約熱內盧公約的不同點在於諸締約國並不把對某一締約國的攻擊視為“對全體的攻擊”，而只視為“危及它們自己的和平與安全”。這些條約要求締約國成員彼此進行協商，並採取行動（未明確規定其性質）以應付共同的危險。與日本簽訂的條約允許美國在日本國內周圍駐紮美國陸、空、海軍，用以“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

隨法國在印度支那失敗之後，集體防禦網再進一步擴展到包括東南亞地區。美國、英國、法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泰國簽訂了馬尼拉條約（建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他們同意把該地區三個非締約國南越、老撾與柬埔寨包括在內。美國和其他締約國家所承擔的義務與上述遠東地區的一些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是一致的。

因此，至 1954 年底，在東亞和南亞地區，除了三個國家以外，其它所有非共產主義國家均通過正式條約得到保證，即美國將把對它們領土的武裝攻擊視為危及其本身的安全，並將採取行動幫助它們應付共同的危險。雖然這種援助的性質與範圍並未予以明確規定，然而，條約本身以及隨之具有的軍事協商與軍事措施，使取得美國諾言的國家有理由可以期望在需要時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

該地區未參加任何條約的三個非共產主義國家是



印度、緬甸和印度尼西亞，它們認為除了按聯合國憲章規定美國承擔的反對侵略的一般義務外，拒絕以任何特殊形式把它們包括在美國防務範圍內。但是，由於這三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和蘇聯有共同的邊境，又由於它們和紅色中國被險峻但並非不可逾越的自然屏障所分隔，因此存在於美國防務條約和隨之而來的軍事部署的包圍圈中最嚴重的隙縫，就是那極端易受攻擊的中東。

伊朗，位於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間（前者是其西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後者是其東部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國），和其南部的阿拉伯國家一樣，在1955年前，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外國提供的安全保證。就在1955年那一年，聯合王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簽訂了一個多邊的安全條約，這個條約在伊拉克退出前叫做巴格達條約（建立了現在稱為的中央條約組織）。而美國，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沒有親身參加該組織，但是美國參加軍事委員會的討論，表明美國在軍事方面的關心。加之，在1959年伊拉克退出以後，美國和伊朗訂立了一個雙邊條約，規定在伊朗遭受侵略時，美國有義務應伊朗當局的請求採取適當的行動，只要可以取得雙方同意或依據艾森豪威爾主義的規定，還可以包括使用武力，來進行援助。

就法律和道義兩方面的義務來說，阻遏政策的包圍圈現在已經形成。但就能否有效地防止中蘇集團進

一步的擴張來說，那就取決於美國和它的盟國能夠和願意拿多少軍事力量來支持它們所承擔的義務（雖然並不是完全取決於這一點）。非軍事性防禦手段的效果，蘇聯集團的力量和意圖，以及由於美國集體防禦網的建立，那些由美國允諾給予支援的國家在防禦上的貢獻，都是決定美國軍事力量負擔份量的因素。但是不管這些因素能減輕多少負擔，美國的負擔必然是沉重的，而且特別值得注意。

## （二）美國國防政策的軍事意義

如果把美國對其他國家在軍事力量方面所承擔的義務——雖然負擔可能很重——看作僅僅是美國自衛需要的一項額外的沉重負擔，那就嚴重地錯看了問題。如前所述，美國的“與人協作”政策並不是單純地為了慷慨地幫助別人，或致力於自由事業，雖然這兩者都是完全不能忽視的決定性因素。集體防禦之所以必要，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如果莫斯科和北平控制了整個歐亞大陸，那麼就要嚴重地危及美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生存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保存。第二，從長遠來說，歐亞大陸的自由國家和美國都不能單獨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但是，由此而產生的集體防禦政策和傳統形式的結盟政策並不完全一樣。目前的情況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所有美國參與的同盟，包括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內，都是美国承担对其他国家进行保护的条約，而不是像傳統的同盟那样，是一种互助条約。理由很简单，并且不但适合于制訂政策当初的情况，也适合于今天的情况。当美国针对苏联采取集体防御政策时，美国本土实际上不可能遭受到任何来自苏联的直接攻击。美国的安全只会由于苏联征服其他国家而間接受到威胁。因此，在所有美国集体防御条約中，虽然只有里約热內卢公約和北大西洋公約，要求其中非北美洲的締約国除防卫它們自己的領土外，也有防卫北美洲的义务，但是在簽訂那两个公約的当时，美国或加拿大遭受攻击的危險是很小的。

今天，由于美国和苏联的轰炸机和導彈的射程、威力、准确性的提高而使情况大为改观。美国和加拿大已有可能受到苏联的轰炸机和導彈的侵襲，而美国的战略力量要攻击苏联，也更少依靠在苏联外圍附近的基地了。因此产生了一个問題，就是我們海外盟国对西方联盟体系的集体防御能作出什么貢獻。随着時間的推移，盟国的战略核武器（英国拥有少部分），最后或可用以补充美国的战略力量。然而，盟国这种支援的形式所起的作用，和美国今天以及将来在保卫其盟国方面所作的战略貢獻的重要性，是很难相提并論的。

虽然如此，無論从軍事或政治角度来看，采取集体防御政策，比采取单独防御政策仍然可以使美国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从軍事观点来看，如果进攻者在攻

击时必须加以摧毁的对方报复体系在数量或类型方面有任何增加，都会减弱他们在抉择是否发动进攻时所怀的信心。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我们可以相信，在某种情况下，苏联会单对一个敌国，例如美国，发动一次对等力量攻击，如果它确信这样作能达到它的目的的话。但我们很难相信，苏联会愿意承担全世界在政治上对它的谴责。而这是对很多国家发动全面攻击所将遭到的必然结果。因此，甚至根据当前的和可以预见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看来，联合就能存在，分裂就会灭亡，这仍然是真理。

然而，美国和它的盟国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适应两种显著的要求：第一，它必须能确保同盟体系不受战略核子的攻击，第二，保护易受攻击的海外自由世界各国不遭受可能的大范围非核子的侵略。

过去有时曾有这种说法，认为能抵挡核攻击的力量也就自然能够完成上述第二项任务。他们认为美国的核报复攻击力量不但能制止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攻击，而且也能制止任何种类军事力量的攻击。如果这个说法即使过去成立过，现在已证明不再能成立了。那么第二项任务所要求的威慑和防御军备就和第二项任务有所不同。承担更大范围的安全义务（安全这个字眼已不再限于狭义的一国自卫，现在的目的已是在遥远的大陆，以及在沿着欧亚大陆易遭攻击的边界上阻遏共产主义势力），而又不会大大加重美国军事力量额

外的和特殊的負擔，那真可以說是奇蹟了。

這些負擔在今天有多重，在將來又可能有多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海外那些國家，不論是為了它們本國的防務還是為集體防務網中的其他國家，能夠或是願意在起軍事作用方面作多少努力。他們之中很多國家，作為多邊防禦條約的參與國，像美國一樣，對其他可能遭受攻擊的國家負有支援的正式義務，即使這種攻擊不是直接針對它們的。

美國防務伙伴的本地軍事力量所能作出的貢獻的總和是不可忽視的。僅僅它們的地面部隊，就約有二百個師。雖然美國曾幫助這些軍隊進行裝備和訓練，但這些國家本身仍擔負着大部分建立和給養方面的財政開支。除了這些包括有相當規模的空軍和海軍部隊在內的本地軍事力量外，在軍事的貢獻方面，他們還允許美國在盟國的領土上駐扎軍隊和建立軍事設備，並在必要時，使用它們的領土來進行軍事行動。鑒於在過去的戰爭中，中立國家拒絕讓交戰國進入或通過它們的國土而使交戰國遭遇到種種困難，因此對後一貢獻的重要性應有所估價。

### (三) 影響美國軍事政策的非軍事因素

只要冷戰繼續下去，美國只有通過大大依賴美國軍事力量集體防禦政策來阻遏中蘇集團，否則美國本身及其它自由國家就難以得到相當程度的安全。可

是，美国除了对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来制止苏联的攻击外，美国，作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也应该采取措施，包括军事措施，在和平时期将这些盟国团结在一起，并使这个联盟网成为一个可靠的执行政策的工具。

有时政治和心理的因素比单纯的军事因素更重要。在某些场合下，可能有必要对友好的政权提供超过集体防御需要的军事设施，以支持它们在国内的威信，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维持盟国间团结的最好办法可能是在某种形式上与这些国家分享核子。但这在美国看来，并不是为威慑或防御所必要。或者，美国可能有必要放弃某个已有的或建议中的空军基地，如果这种基地虽然在战略上是需要的，但这会给友好政府增加太大的困难，或者会因而威胁其靠向西方的态度。此外，某些战略计划虽有其军事价值，但也可能有必要加以修改，因为它们在某些国家中引起了中立主义的情绪，或在另一些国家中还引起了恐惧和敌对情绪。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同盟体系内部政治和心理因素的压力和紧张，使得美国为了享受有效的结盟政策的好处，就必须在军事上付出更大的代价。

同盟体系中一些最显著的紧张值得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它们和选择最适合于美国及其盟国需要的武器体系和战略有关。

某些地理因素不利于美国和自由世界中许多海外

国家的关系。美国为了使用它的力量以造成欧亚大陆危险地区内的力量均衡，就必须要在离美洲数千英里以外，在靠近苏联的海外基地上驻扎军队。因此美国就易被指责为“军国主义”和采取挑衅行为。而且，美国军队驻扎在其他主权国家（而这是必须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意的），必然会引起紧张和不满，而这正好给共产党的宣传和国内反对派的抗议火上加油。由此而产生的有碍于美国随时以适当方式进行军事部署的困难，可以由关于在欧洲设置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的辩论中和脱离接触问题上得到说明。

美国的防务还因为美国国防线从欧亚大陆的一头伸张到另一头而变得复杂起来。每当发生危急情况，需要美国军事力量集中在苏联集团周围的某一地点时——在台湾海峡、中东或西柏林——在这一“战线”其他地区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就唯恐美国的力量“转移”到遥远的战区，又唯恐把自己牵连到一个发生在离开他们利益范围很远的战争中去。鉴于同盟体系中这些紧张关系，美国可能会感到有必要既限制它对发生危机地区的军事干涉，又要在其他地区增加军事力量。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需要加强与参加集体防御各国之间的政治团结而引起的军事冒险或额外的军事需求。

核武器的采用是同盟国家间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早年，当美国还暂时垄断核武器时，情况就不是这样。相反，在那时新的原子武器有助于加强我们这个

能提供保护性核子屏障的国家和为美国保护的受惠国間的团结，后者在防务方面用不着自己費很大的力量就能取得一种安全感。但是自从苏联的第一个人造卫星戏剧性地結束美国壟断后，“有”和“沒有”核武器国家間的分裂成了严重摩擦的根源。英国成了“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其他盟国——不只是在法国——对发展独立战略核威懾力量有不断增长的要求。結果，大量精力的重复浪費就势难避免了。

另一个潜在的分裂因素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也具有重要的軍事意义。这可以称做不同历史傳統的因素。其实，美国的安全仅仅直接受到中苏集团的威胁，而美国的很多盟国和友好国家却全神貫注于对自己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威胁即使与冷战有关，也不过是間接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間、巴基斯坦和印度間或法国和叛乱的阿尔及利亚間的爭端。自由世界各成員国間的这种冲突和公开的敌对行为从两方面影响美国的軍事地位：可用以支持集体防御对抗苏联的有价值的兵力被牵制在这些冲突中，甚至互相作战，互相摧毁；其次，美国不便去支援它更表同情的这一方，以免触犯需要它对集体防御有所貢獻的另一方，或者以免将另一方推向苏联陣营。

最后，由于在苏联軌道之外出現了二十几个新的、政权不巩固的国家，就使美国的国防任务更加复杂化，这些国家大多数是从欧洲殖民者統治下解放出来的产



物，它們有些采取了中立主义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的军事援助对于反抗中苏威胁的集体防务也许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稳定这个国家，或作为对抗苏联援助的一个手段，则是很必要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黎巴嫩和约旦，可能就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来阻止以颠覆活动或从外部煽动的反西方革命形式出现的“间接侵略”。

由于上述各种理由，落在美国军事力量身上的任务比即使自由国家能全部联合其力量来对付外来共产主义军事进攻的危险还要重大。军队配置、武器的需要以及后勤给养问题，都受到自由世界广大地区动荡的、以及许多地方处于革命的状态所引起的问题的影响。美国及其盟国战略，如果忽视东西方争取不承担义务国家的竞争，或者忽视调整其军事政策以适应这一竞争的特殊需要，那么这个战略对阻遏政策来说是不完善的。

### 第三篇 技术发展和战略平衡

#### 第一章 绪言：东西方实力的关系

##### (一)“战略平衡”

在讨论军事技术发展对军事战略力量对比的影响时，有几点在开始时应加以澄清。

本节将集中討論有关軍事力量的战略水平，所謂战略水平就是拥有或运用“战略武器”所造成的力量或威胁。“战略武器”是那些可以用来或者摧毁一个国家的資源（它的人民、工业能力、交通体系等），或者攻击敌人自己的“战略力量”<sup>①</sup>的武器。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武器是装有核彈头的飞机和導彈力量，其航程和射程足以达到敌人国土之内。由于战略武器的射程、毁灭力和反应時間短促（指使它們投入战斗所需時間），它們控制了力量的形势并为决定全面軍事力量和优势創造条件。战略力量对比的演变将在本节中加以探討，而关于非战略性的軍事力量的运用和全面軍事力量对比的影响将留待后面考虑。虽然我們知道战略力量并非战略的全部，但它确是战略的先决条件。除非对最近战略形势变化的重要意义有所了解，要領会有关軍事战略和国家政策这些更为复杂的問題是有困难的，虽然解决这些問題显然不仅仅在于“战略”力量。

其次，“战略平衡”将专指有关战略水平方面軍事

① 按照富勒的說法，在任何特定时期內，拥有“最大射程”的武器就能控制战争，“控制性武器不一定是威力更大、准确性更高、打击力更强或更便于携带的武器；由于它具有优越的射程，它可以首先被用来投入战斗，并且在它的掩护下，所有其他的武器，按照它們各自的威力和限度，都能发挥作用。进而言之，这种武器的打击力愈强、准确性愈高、火力愈强和重量愈輕，它的控制力也就愈大。——見“兵器与历史”（紐約斯克里的布納公司1945年出版）第7—8頁。

力量对比而言。“平衡”这一名詞在这里并不含有敌对双方軍事能力均等的意义，而是用来说明在某一时期敌对国家或集团的战略部队力量的关系，不論这种关系是有利于一方或另一方或确实处于均衡状态。

## (二) 战略力量的平衡

把战略力量对比和在后面几章中将要討論的非战略力量对比中的平衡和不平衡加以区别将是有益的。

按通常的用法以及像本研究报告中所应用的，“力量平衡”是指軍事平衡的状态——即使是一种近似的、变动的和有时候是不稳定的平衡——在这样平衡状态下，沒有一方拥有或相信它拥有足够力量以威胁或使用武力<sup>①</sup>来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敌方。

过去，力量平衡通常是指敌对双方在发生敌对行动前軍事能力大体相等或均等。一般說来，这种情况就可望造成双方之間互相威懾的状态或軍事上的抗衡。在目前情况下，两国均拥有为数可观的战略核子力量，在发生敌对行动前双方力量这种大体相等，并不能明显地保証在它們之間保持核子僵持局面。相反，互相威懾——或力量平衡的稳定性——有賴于在全面攻击中可能成为牺牲者的战略报复力量不易受攻击以

<sup>①</sup> 关于名詞許多不同用法的分类，見“世界政治”第5卷第4期（1953年7月）第442—447頁，厄恩斯特·哈斯的“力量的平衡，法則、概念或宣傳？”

及进攻者战略力量的质量和数量。关于这些问题将留待以后说明。当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它的战略攻击力量能够摧毁另一方在还击时将造成极大伤害的报复能力时，就出现了战略力量的平衡和核子僵持状态。<sup>①</sup>为了建立这种僵局，保持在发生敌对行动前的战略力量的对等是既无必要也是不得要领的，同时根据这些力量的数量对比来预示互相威慑也是不可靠的和使人误解的。

而且，就是在战略均衡有保证地稳定的情况下，双方首先发动攻击的能力的对比也不一定完全相等。即使一方的战略力量占绝对优势——大大的不平衡——也会把核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要它在各种情况下克制自己不利用它的优势能力发动这样的战争。

因此，互相威慑或核子僵局的前提是：一方面必须要有首先发动攻击的动机和能力，而另一方面必须有报复能力和报复意图。关于这一点将在以后几章中作充分讨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温斯顿·丘吉尔的“恐怖平衡”已经出现，因为两大敌对国都拥有很强的战略核子力量。就下面这种意义来说，恐怖平衡

---

<sup>①</sup> 席林说：“构成互相威慑的不是平衡——形势的绝对相等或对称，而是平衡的稳定性。”见克劳斯、诺尔所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安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78页“突然袭击与裁军”一文。

現已确立，即对双方來說，目前以居民中心区为目标濫施轰炸或进行恐怖攻击已不再是一种合理的軍事战略。因为这种攻击将使敌方的战略力量保持完整无缺，这如果不是自杀的話，也将是一种自我毀灭的行动。虽則在苏美核战争开始时假定在攻击者的行动比較理智的情况下，离战略目标較远的城市因此被視为相对的安全，然而一旦战略目标已受最大限度的攻击或一旦沒有力量能把人口从城市中疏散出去，恐怖平衡仍然不能保証居民中心区在第二次攻击中是否能逃脫或在第三次攻击中避免遭受毀灭。

在当前以实力两极化为特征的世界形势下，軍事实力对比的状况則主要取决于美国和苏联的相对实力地位，因此这里将集中討論它們之間的实力配置情况。这并不是說，它們通过和第三个国家的軍事联盟或不太正式的結盟关系而得到的額外力量就不会在实质上影响它們各自的地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家体系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小国，不管是单独还是联合起来，愈来愈沒有能力来打破两个超級强国之間实力的平衡，或者消除、也許是完全改变它們之間的不平衡状况。因此，冷战和軍备竞赛可以視为是一种“維持平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大敌对国家都設法互相威懾或保持、取得以及重新取得实力上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力量的配置，也就是美苏战略力量的对比的不平衡状态一直占主导地位。虽

則，冷战初期美国享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以及有利于它的不平衡状况的好处，但后来它的地位遭到了苏联的挑战，苏联 1957 年技术上的成就，有可能在将来完全改变这种不平衡状况。虽然后面将研究全面军事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战略力量平衡，但第三篇内将探讨战略力量对比趋向平衡或不平衡以及稳定或不稳定的变化。由于本报告将集中研究引起这些变化的技术力量以及军事实力的技术基础，而实力的非技术因素则将在本章内简略论及。

### (三) 实力的非技术因素

目前进行战略竞赛的舞台不仅仅是技术力量形成的。确切估价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就不能只考虑那些影响战略力量的技术因素，同时对那些在傳統上一般认为是构成国家力量的非技术因素也必须加以探讨，这些因素对主要敌对国家发展战略力量的能力和倾向是有影响的。虽然某些非技术因素与战略力量对比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确能影响军事实力的配置从而确定有关战略竞赛的规模和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本节对它们的简单论述将和后面我们对战略形势的讨论有关联。

非技术因素可以看作是国家在实力对比上的资产或负债。在两大阵营中同时被作为构成实力的那些因素可以视为双方共有的资产，但是另一些因素，如果由

于另一方根本就沒有或因环境所限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明显地只对一方有利，則可以称为“独有的”资产。如果某种实力因素一方所掌握的数量更多或质量更高，这可以说是在实力部署上形成了对该方有利的“不对称”情况。这样的不对称是可能相互抵消的，因此总起来看它們将不会影响实力的对比。然而，某些不对称如由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独有资产——例如苏联在軍事情报方面的有利条件——对实力对比的影响，就可能很难或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来对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消除不平衡的状态，不利的一方只有模仿对方的制度或者在設法調集其他实力因素中可以起补救作用的有利条件。据此看来，从所花费的代价力气来說，宁可利用一种独有的有利条件而不在共同有利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地理因素**——对国家实力因素的傳統考察中，地理因素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实力对比上起平衡或不平衡作用的某些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已因最近技术上的发展而有所削減。單純的地理面积虽然是两大敌对国家在冷战中共有的资产，但它仍是一个軍事实力的因素。美国和苏联双方都有广闊的空間供軍事設施、工业以及人口的調动和疏散之用。<sup>9</sup>至于地理位置，从前曾是美国最突出的有利条件，但在武器发展的影响下它的价值已在减少乃至消失。远程核子力量所引起的变化，沒有比它对時間和空間的压縮更严重地影

响美国的地位。美国过去因远离现实的或潜在的敌对力量中心而享有的军事安全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时间和空间的缩小也增加了美国在海外的利害关系和责任，而美国与它在苏联周围的友好国家和盟国的距离很远，这对美国以非战略部队来迅速和充分地履行防御义务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

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对苏联而言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地理位置上的有利条件。美国在目前对海洋的控制仍然是无须争辩的。美国仍然保持并能利用包围着苏联欧亚“心脏地区”的西方盟国的地理位置，就和它对世界上的海洋和水道的控制一样。在洲际弹道导弹仍然比短程攻击手段代价更高而准确性又较差的时候，距离问题依旧是军事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美国在欧洲有盟国并能从它们的领土上向苏联进行攻击，这一点仍然是美国的一个有利条件，而苏联对美国的反击只能是远程的<sup>①</sup>。此外，美国能在大部分苏联边境附近地区活动的独有的能力，对向苏联集团进行广播渗透以及收集电讯、电子和其他形式的

---

<sup>①</sup> 某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把费用和准确性看作是导弹射程的函数，即射程增加时，费用就要提高，准确性就要降低，因此对美国能在欧洲设置中程弹道导弹这一有利条件特别加以强调。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不敢苟同的，这不仅是因为苏联人在中程弹道导弹方面的领先更甚于他们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领先，而且还因为只有很少数的导弹专家才认为洲际弹道导弹不可能对攻击指定的目标会具有完全的准确性。



情报方面是方便的。最后，将来一旦发生有限战争时，我們在欧亚边缘地区基地的位置对我们的军事能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自然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军事实力中另一个传统要素，在这一方面美国和苏联是同等有利的。双方都既能在它们本国也很容易从外部得到大量的基本原料的供应。在这一点上是对称的。

**人口**——通常都假定人口因素是对苏联有利的。苏联的人口大约有二亿零八百万，美国只有一亿八千万。欧洲和北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人口总计约有四亿五千万，然而苏联和它的欧洲卫星国却只有三亿人口，而且其中许多国家的忠实程度，诸如匈牙利和波兰，肯定是有疑问的。因此，欧洲地区的人口因素似乎是处于有利于西方的不对称状态，而不是与此相反。

只有红色中国的广大人口加到苏联人口中去，人口因素才会转向相反的方向。但是必须记住，红色中国的贡献对欧洲的军事平衡来说是沒有直接重要意义的。虽然中国广大的人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亚洲全面冲突的结果，但是很难设想欧洲会发生这样长期的冲突以致苏联需要依靠从中国运入部队。此外，如果缺少把单纯的人力转变成军事力量的其他必要因素，仅在人数上占优势是不能保证军事优势的。中华帝国的人口比它的邻国要多得多，但它的历史典型地说明

了只有人口资产是无能为力的。

**軍事人員**——为动员有效的軍事人員和生产軍需物資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經濟条件倒更为重要。首先，在調集軍事人員上苏联集团明显处于优势，其次在熟练劳动力上，苏联也正在克服它早期的劣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軍事力量对比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苏联——以及紅色中国——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軍事編制。某些苏联部队很明显是为了内部安全和控制卫星国的需要，但这些部队的巨大数量也反映了苏联根据經驗、思想意識和政治傳統而得来的某些信念。根据过去大陆国家的傳統，苏联在和平时期一直保持着大量的地面部队，由于现实的和假想的“革命的敌人”的存在，这一政策在苏联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此外，至少在对核子战争短暂性的預見能打动苏联之前，他們深信在大战中他們制度的存亡是系于和平时期所保持的現役部队，这些部队是对抗那可怕的“民主兵工厂”（在战时需求的刺激下，美国建設軍事力量几乎有无限的能力）的唯一可能的手段。苏联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的軍事思想助长了保持大規模地面部队的信念，虽然他們并非不了解人造卫星和导彈的优越性，但却主張为一切意外事件做好准备。而且在苏联的經驗中，多次的威胁都是西方地面部队的侵入。当然由于政治制度的性质，苏联和中国能够很容易地把武装部队保持在远远超过它們西方敌人的水平之上。

由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公众对高度的军事动员很少施加压力以及由于传统的纪律、集体行动和对政权的效忠，共产主义国家所能建立的军队，在实力平衡上形成了非战略部队方面的严重不对称。苏联军事人力这一资产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因素，使得苏联的力量堪与美国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匹敌这一可能性，将在以下几章里讨论。

**工业能力**——工业能力连同科学和技术是与促进、利用军事技术发展最明显有关的实力因素。苏联在这方面的进步是最突出的，无论在他们发展的速度上和他們取得的成就的程度上都是如此。即使沒有可与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相比的思想意識的刺激，可以预料具有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潜力的国家，一旦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它們将竭力爭取縮短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俄国的工业化在1917年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着手进行了。然而，某些方面的差距目前正在迅速地消失，使得美国过去的重要资产——即美国工业、技术和管理方面无可置疑的优势——正在丧失。

造成美国这种资产减少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是苏联在某些重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方面极高的增长率。虽然根据苏联的估计和卢布的官价最近对苏联和美国的全面工业增长率<sup>①</sup>所作的比較可能証明是錯誤的，但无可爭辯，苏联特別強調生产資料而不是生活資料工业的发展，并已取得重大的成果。如果目前的趋

勢繼續下去的話，這種情況可能成為未來軍事實力對比中一個非常重大的因素。儘管據估計蘇聯國民生產總值低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但據說蘇聯每年的工業投資以及軍費支出現在已和我們自己的不相上下<sup>②</sup>。在日益擴大的工業基礎上，蘇聯能夠使它的軍事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額中兩倍於美國這一事實，可能在未來實力對比中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美國工業系統在規模、適應性和動員潛力方面的優勢仍繼續有價值，對此不應低估。美國廣闊和強大的經濟基礎，再加上西歐在內，有可能承擔在數額、多樣性和強度上比蘇聯更大的軍事和技術發展計劃，但必須更有效地使用可資利用的資源<sup>③</sup>。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以處於一種能在和平時期的軍備競賽中與蘇聯有效對抗的地位。

---

① 參閱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估計，他認為蘇聯從1958年起的七年期間里工業的增長率是9.5%，在大約同期內美國是3.6%。他在新奧爾良愛迪生電工學院的演講全文於1959年4月9日發表於“紐約時報”第8版。

② 見艾倫·杜勒斯所著“蘇聯威脅的某些含義”，1959年8月24日國務院公報第41卷、第1052期第274—278頁。某些經濟學家對於認為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快於美國這一流行的觀點表示懷疑，斷言對蘇聯經濟增長的估計所以較大是根據蘇聯當局歪曲了的統計。見1959年9月24日“紐約時報”第24版“關於蘇聯經濟增長率的爭論”。

③ 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1958年8月出版的“陸軍生產基地”草案，ORO—T—380。

然而美国工业潜力的资产在战时的军事意义，近年来随着战略核子空军的发展已在迅速消失，已不再能保证这种巨大的潜力在战争开始后可以转变为兵工厂。因此如果战争一开始就使用战略空军，工业在实力对比中的作用必须按照在战争开始时已拥有的军事产品来衡量。

**技术才能和武器研究、发展生产所需用的时间**——美国的生产能力不仅要看工厂、财力和物质资源等物质，而且也要看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材情况。如果使用恰当，这些技术就能够在改善美国现代化武器系统发展中的质量、数量以及发展时间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苏联在发展有深刻军事意义的科学、技术能力方面已不再落后于美国，正如不久前的人造地球卫星所突出表明的那样<sup>①</sup>。目前的形势是，敌对双方可望在它们给予最高优先权的某些方面达到大致相等的军事技术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对技术计划、研究和发展的经营管理，生产的方法，确定各种不同计划是否妥善和它们的优先权，以及一项武器从开始研究到试制成功

① 在核子武器发展方面，苏联早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科学家在核子研究中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已明确地说明了苏联科学和技术能力发展的程度。兰德公司对这一问题的一项调查认为战前苏联核子物理的研究“决不能被判断为不及西方”。参看洛各斯和克莱米士合著“苏联和原子：最初几年的情况”一书，1956年4月2日出版，第86页，RM1711。

所需要的时间（即武器发展时间），所有这些对于未来美国与苏联相对抗的军事地位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一个军事力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赶上、拉平或超过敌方技术成就的时代，武器研究、发展和生产所需时间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sup>①</sup>。如果苏联先于西方建立起某种类型能迅速采用和生产的重要武器系统，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就会增加，同时，苏联在选择冲突的方式和地点，军事谍报和民防准备方面已有的优势，会诱使它们进一步抓住军事和外交主动权。

某些负责方面已在指责，苏联在生产新武器方面，其研究、发展和生产各个环节都比美国所需时间短，因此它已经建立起危及我们安全的一种武器系统。这一指责并非针对我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才能或创造力，而是针对由于累赘而集权的官僚机构，追求完美无缺，不愿冒险，以及有时候过分照顾到预算的限制，所造成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不必要的拖延<sup>②</sup>。

在美国军事实力日益依赖新武器技术的情况下，武器发展时间这一因素若继续落后于苏联，就肯定会危及美国的安全。由于一种武器系统从开始研究到试制成功所需时间，目前平均需要五至十年，美国未来的

<sup>①</sup> “由于战争的日益复杂，技术就越来越重要了。事实上，在沒有战术性战争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和西方的战略想取得决定性的成功，那将决定于技术方面，因为技术包括了战争本身之外的所有因素”。参看詹姆斯·盖文中将著“宇宙空间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1958年纽约哈泼兄弟书店出版）第236页。

战略地位将大大地取决于现在所作的决定和努力<sup>②</sup>。

目前美国在武器发展时间方面落后于苏联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作为估计根据的情报往往是不真实的。苏联生产野牛式轰炸机所用的时间似乎远比美国生产类似的B—52型飞机所需时间为短，这确是实情。他们的各种不同型号的米格式喷气战斗机体系发展为可供使用，比美国一系列型号的性能相当的战斗机发展得更快。当然，还有原子弹和氢弹，各种远程导弹，他们生产这些武器需用的时间远较美国专家们所估计的为短。

然而，关于某一具体项目，苏联在何时开始研究和发 展，往往不得而知。克里姆林不像我们的国防部（和

---

② 一篇消息来源丰富的评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战略地位的主要弱点之一是武器发展时间过长”。参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第二篇“特别报告”中的“国际安全：军事方面”部分，（1959年纽约出版）第34页。

认为美国的宇宙空间计划落后于苏联一至三年的沃纳·布朗博士说：“我们有智慧、资源和能力，但是，我们受到不断的估价、鉴定、再鉴定的阻碍，而不能在我们的宇宙空间计划的发展中取得进展。”摘自“布朗为美国宇宙空间科学的落后而苦恼”一文，载1959年9月16日“纽约时报”第14页。

③ 在美国，一种新的武器系统，从发现一个新的设计原理发展为“实际可用的力量”，往往要拖十年时间，而俄国一般在七年内即可完成。见詹姆斯·艾德逊（当时任陆军部研究和发 展处处长助理）著：“核子时代国家安全中的‘武器系统与外交政策’”一书（明尼阿波利斯城明尼苏达大学1958年出版）第8—9页。

主要承包人)那样,当一项计划正式开始时要发表公报,他们只在适当的时候才把成品公之于世,例如,在一个全国性的节日,1957年五一节公开了野牛式飞机。

而且,如果是通过牺牲质量、费用或牺牲将来进行大量生产的可能性,或者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压倒了以较短的时间发展一种特殊武器的重要性的话,较短的武器发展时间在军事力量对比中就不一定是一种资产。苏联看来是仓促地将其某些武器系统交付使用,而没有我国三军在发展新武器周期内那样精益求精。美国喷气战斗机在朝鲜与苏联米格飞机交战中,被击落的数字美国以一比十六居优势,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我国驾驶员优良的技术和训练。更近的例子是以美国飞机和红外线引导的响尾蛇导弹武装的中国国民党空军的成功,也有助于证实我们的空军武器技术的完善。

武器质量和较短的发展时间到底何者更重要,这必须根据各种具体武器系统的用途来判断。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比敌方大为提前地拥有一种武器系统,会造成战略对比中的极不对称情况(如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而这种武器系统的完善就可能是比较次要的了。

也有某些迹象说明,苏联是用牺牲最有效地利用物资和人力资源,和少数情况下牺牲能进行大量生产的能力的办法,缩短了武器发展时间。而这些牺牲可能证明是值得的,如果较短的发展时间能够带来军事



好处的話。

美国一貫的做法是先从事产品設計，随后再拟定生产計劃——为完成一种武器的研究和发展約需三年，設計和建造生产武器需要的机器又需二至三年——据信苏联則同时拟定設計和生产計劃。虽然他們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发展周期縮短几年，但他們的財政和人力的投資总額可能比美国更大。

与美国的紀錄比較，看来苏联的武器发展時間最短的是許多更复杂的武器系統，不幸这些最先完成的系統对战略力量的分配上可能造成最危險的不对称。最近的一項調查<sup>①</sup>认为美国武器发展時間落后是由于美国制度所特有的某些生产方面的因素。根据这一調查，美国产品的設計必須要考慮生产效率，这是由美国社会的竞争性质决定的。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得到一項軍事設計合同，設計工程師們将考慮这一事实：产品将在一家現成的生产工厂中制造，最好在得到設計合同的公司的工厂中制造。他們在設計产品中將考慮到在符合既定要求的条件下，使制造的費用尽可能低。因而，产品的制造往往尽量照顾到已有和可用的設備，以避免建立新工厂或购置新生产设备引起的資本負擔。

該項調查指出，苏联設計工程師的工作不受这种限制。他們最关心的是制造一种最有效率的产品，而

<sup>①</sup> 前引“陆軍生产基地”1958年8月草案，ORO—T—380。

不考慮費用。有些極端的情況，特別是那些最關緊要的武器，如有必要的話，他們大概會準備在試驗室里製造產品。蘇聯不需要使他們不設計適合于現有的工業生產設備。因此，儘管旨在尽可能高效率生產的美國各種試制中的武器，它的產量最后可能比蘇聯大得多，但這種對美國設計工程師的限制也可能導致許多失敗和延長發展時間，从而使蘇聯能夠“先達到目標”。

該調查得出結論說，如果這就是實際情況，看來就有必要協調設計中的研究、發展和生產中的研究、發展的關係，以保證設計工程師能充分了解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并使他們的設計能以最先進和最有效的機器（而不是現有的、已陳旧的機器）為基礎。在這種形式下，許多延長武器發展時間的生產“包袱”就可以擺脫了。

蘇聯許多武器的發展時間遠比美國短，并不一定說明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固有的**缺點。美國過去，甚至在和平時期，但特別是在戰爭的壓力下，已表明它能夠縮短被認為是急迫的計劃的研究和發展時間。第二次大戰中，我們的紀錄顯示了我們在這方面的潛力；那時我們更願意分散權力，在訂出廣泛計劃時不過于小心謹慎，不因考慮最后的可靠性而過于慎重，對於資源也更不吝惜<sup>①</sup>。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最光輝成就的政府研究機構是“曼哈頓區計劃處”和“科學研究發展局”，它們提供了研究和發展中競爭和分權的價值的范例。見查爾斯·赫奇著“在競爭性經濟中

我們武器發展時間（即從開始研究到試制成功所需要的時間）較長，雖然，我們文化和制度中固有的障礙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也可能和當前對需要作出的努力程度作出判斷有關，因為一方面要根據國家的急需，另一方面也要根據各項不同計劃的相對重要性來進行判斷。最近給予很大優先權的，例如丘辟特中程彈道導彈，已證明美國有能力在相當短的時期內（三年）發展一種全新的武器系統，而在一些未給予很大優先權的方面，如陸軍輕武器的发展，新型M—14式步槍研究和發展時間用了十一年，而要完全代替目前的M—1式步槍還要七年。

即使是遭到很多批評的國際地球物理年人造地球衛星計劃中的“先鋒號計劃”，也顯示了我們的武器發展時間主要問題之一可能在於對研究和發展的優先權的判別，而不在於我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能力。“先鋒號計劃”是一項具有相當多優點的技术成就；它生產了一種可供使用的導彈，而只用了發展一般導彈所需要的一半時間，並在它第六次試射時將一顆人造衛星射入軌道。先鋒號在試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時遭到的失敗是由於最高政府當局對該計劃的重要性所作的決定，結果是先鋒號從導彈發展的主流中被排斥出來，在

---

的研究和發展的特點”，載於1959年5月13日出版的兰德公司報告第1297頁。

初期只給予了相当低的优先权和撥款<sup>①</sup>。

我們在一項武器从开始研究到試制成功所需要的时间方面的落后情况还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如果（像前面已指出的情况那样）这种落后情况会使苏联在科学的飞跃发展上占居首位，甚至生产出专门对付我們最新武器的那种武器，从而使之失去效用的話<sup>②</sup>。我們必須承认，苏联作为一种独裁政体，在作出关于武器的研究与发展的各种决定上，比它的民主国家的对方，具有較大的自由和以較快的速度加以执行的能力，而在动员力量以支持它所选定的計劃方面，困难則又較民主国家为少。但是，对于苏联來說，这种决策能力未必是有利而无弊的。因为在独裁政权之下，批評官方的决定就有困难和風險，这就可能导致产品质量較差、花錢較多、以及造成武器成品不能用来支持国家战略的情况<sup>③</sup>。

---

① 关于“先鋒号計劃”的簡要历史見“先鋒計劃，一項为國際地球物理年作出的科学的地球人造卫星計劃”，一份1958年12月22日美国众議院撥款委员会調查研究人員提交該委员会的报告，轉載于第八十六届国会第一次會議众議院撥款小組委员会听取的“1960年国防部撥款”报告第六部分，第54—72頁，1959年4月14日出版（后称为“众議院对1960财政年度国防預算意見听取会的报告”）。

② 見1959年4月21日国会証詞紀錄第6部分第338頁陸軍研究发展处处长特魯定中将关于1960年度国防預算問題的証詞。

③ 苏联在战后扩大建造巡洋艦和短程潜水艇，就是这方面的例証，因为这两种武器体系在現代战争中的用途显然是有限的。

这些关于美国武器发展所需时间的评论，并不是想暗示我们在武器的研究发展方面的指导思想和程序不必进行某些根本性的修改。我们通常总是缺乏接受新想法的勇气和迅速实践这些新想法的速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美国制度特色的分散主义，被感染上应该是苏联制度特征的严格控制。我们的工业体系的复杂性、灵活性和剩余生产能力，以及广泛的、在不断扩大的人和政府的研究范围，如果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的话，仍然构成了我们这方面苏联不能希望赶上的有利地位。然而，现在普遍要求通过设立“沙皇”<sup>④</sup>、消灭“浪费的重复现象”和“三军争吵”来改进研究与发展工作，但当把这些要求付诸实施的时候，就往往导致过多的行政管理，使新的有用的想法不能产生，并造成那种把长期的研究发展计划引向一种不切实际的特定产品的错误<sup>⑤</sup>。

相反地，最近的各项研究报告已经指出：在军事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减少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扩大

独裁政权在这一方面发生问题的一个更出名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尾阶段，希特勒作出了把德国喷气机生产从截击机改为轰炸机的错误的、但无人敢争辩的决定。

④ 指总的管理人。——译者

⑤ 勃尔顿·克雷因著：“关于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建议”，见“幸福”杂志第57卷第5期（1958年5月号）第112页及以后几页。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技术发展方面的不可预料的性质，要求“更多的着重于探究技术的许多方面，而不要坚持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明确的最終目标”。

重复的努力，将是很重要的事，特别是在初期阶段上，因为这时重复是不花很多钱的。进行多种途径的探索，不仅会产生更多的具有更大的军事重要性的成果，而且扩大竞争所引起的刺激力，也可能缩短武器发展所需要的时间<sup>①</sup>。在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科学领域内，鼓励三军采取“重复”和冒险的措施，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可以用“圆锥形帐篷”计划(Project Topoe)的发展过程来加以说明。“圆锥形帐篷”计划是最近宣布的海军用来探测全球范围内导弹和核爆炸的体系。在某些职能上，它是与正在花费数亿美元建立起来的空军雷达警报网重复的。它只有很少的成功机会和少量的创建费，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而且“圆锥形帐篷”计划的科学家显然有必要对他们的姊妹军种进行偵探、以获取绝密的导弹发射情况的材料）<sup>②</sup>，这个体系还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了，并且有希望具有很大的价值。

美国在武器发展所需时间上（即从开始研究到试制成功所需时间）落后于苏联，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把美国在和平时期的一般性成就和在战时爆发出来的创造力对比一下，是很有益处的。美国拥有优势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是美国对苏联在这方面的挑战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回答，而目前双方在导弹方面

① 見前引赫奇著文，第 11—12 頁。

② 約翰·奧斯曼遜：“海軍導彈監聽哨探測在世界任何地方發射的導彈”，見 1959 年 8 月 8 日“紐約時報”第 1 頁。

的差距也証明了美国未能对付这种挑战的严重性。

另外还有三种不大具体的因素——战略思想、軍事情报和“主动权”問題——也值得我們注意，因为它们們对于在核子和远程战略能力条件下的軍事力量对比具有特殊关系。

**战略思想**——在战略思想方面，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苏联在过去或未来的优势。苏联在处理战略思想問題上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这在上面已經指出了。他們在战后抱着成見地保持龐大的地面部队，不願利用战略空軍力量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倾向于只准备他們所熟悉的那一类战争的例子。虽則苏联很早就发展远程導彈是惊人的例外，但总的說来，苏联的軍事思想是跟着西方走的，而且在時間上要落后西方二年到三年(甚至多达十年)。

另一方面，苏联軍事上的保守主义可能使他們重新获得优势——他們不顾西方关于下次大战的預言(即下次大战如果爆发的話，将是一场短期的、全面的核子交互攻击)，坚持准备一場长期的、基本上进行地面战斗的战争。如果在今后的年代里，决定战略平衡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稳定的核子僵局的話，苏联的地面部队能力就可以成为一笔巨大的财产。

**軍事情报**——今后几年中，当美国的战略报复力量还很容易受到一次突然进攻的打击的时候，苏联在軍事情报——特别是关于战略目标的情报——方面的

明显优势，对于战略力量对比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苏联的这笔财产可能要归功于同我们完全不同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公开的”社会里，通过公开的观察，或者通过各种报纸或技术性杂志就能够取得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在“对外封锁的”苏联社会里，这些情况只能通过有组织的间谍活动、投敌者，或者通过我们设在苏联周围的各个情报基地来取得。即使我们的军事秘密要比苏联警察国家的不保险些，但是在公开谈论中，把间谍活动当作苏联获得技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夸大了。况且，美国情报机关有时能够渗入苏联的秘密帷幕的能力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尽管在他们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障碍。

**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或许最难于估计的因素是“主动权”这一因素。显然，在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各次严重危机中，主动权一直是在共产党阵营方面的——在朝鲜和金門公开使用军事力量的地方也是这样。同样明白的是：在需要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的地方，掌握主动权就是一种重大的战略优势，特别是在首先发动战略攻击可以获得极其重大的好处的情况下。苏联是否会冒险发动一次估计会卷入美国战略核子部队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现在还不能预料。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苏联的掌握主动权一部分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关于把战争任务作为一种国家的政策工具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是只有防御性的战争才是正义的（虽



然我們保留有決定怎樣才是我們所認為的“防禦性”軍事行動的權利)，而俄國的看法則認為：為共產主義目的——因此也是為蘇聯的目的——服務的戰爭，就是正義的戰爭，他們除了宣傳的目的之外，“侵略性”或“防禦性”之間是沒有區別的。雖然這並不意味着戰爭要比其他的破壞性和危險性較小的政策工具好些，但是，這種看法卻使我們的對方得到了軍事主動權的特惠，在現在的條件下，這就等於承認他們有進行首先攻擊的優勢。這也可能意味着他們在追求某一特殊目標時，能夠比美國進行更大的戰爭冒險。這種進行冒險的能力由於受到蘇聯集權主義政權的另一種能力的支持而加強了，這另一種能力是：集權主義政權遠較代表民意的政權更加容易擺脫危險的和負擔過重的處境。

儘管蘇聯的政策具有帝國主義的和革命的性質，但應認識到蘇聯的首腦人物也抱着謹慎的和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們採用非軍事征服手段的意圖多於去進行軍事征服。因此我們就應當把軍事主動權的意義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雖然蘇聯的信條預言“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這兩大勢力之間最終必發生衝突，但這一衝突被認為不是由於共產黨決心一舉完成世界革命而引起的，而是由於“帝國主義”決心消滅共產主義而產生的後果。蘇聯把衝突看作為一種長期的持續不斷的鬥爭過程，其中所採用的武器是各式各樣的，因此應優先採用那些有最大成功可能而冒最少危險的武

器<sup>①</sup>。尽管他們把战争作为达到“正当”目的一种合法的政策工具，但是战争毕竟是一种日益危险的玩意，同时他們也許并不願意为了将来有可能大大扩张而使目前已經肯定得到的成就受到危害。即使如此，美国的决策人还不可低估苏联会突然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

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未掌握主动权而受到批評，极少批評者敢于公开贊成在灵活的政策中应包括首先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在内。因为这样的政策会違反美国根深蒂固的反对使用暴力和詛咒侵略之害那些信念。另有人主張美国应采取能在非军事领域内，即所謂心理—政治方面掌握主动权的政策，这样来限制苏联因掌握军事主动权而享有的优势。但这种政策对战略力量对比产生的影响，与军事主动权的影響相比，可能是有限的。这种政策的影响的有限性突出地表现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那时我們对匈牙利革命分子的道义支持和鼓励，証明并不能代替军事援助。然而美国已較过去那些仅图維持现状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显示出更加願意冒险去保护广大的自由世界的利益。美国在金門事件和干涉黎巴嫩事件中所采取的“战争边缘政策”已証明了这一点。虽然美国缺乏像克里姆林宮那种把革命与帝国主义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

① 这是罗伯特·斯特劳斯—休佩、威廉·金特納、詹姆斯·道厄提、阿耳文·科特雷耳諸人最近在“持久战”（1959年紐約哈潑兄弟书店出版）一书中所闡述的战略思想。

的灵活性（这是許多战争的起因），但美国已毫不迟疑地将其防御范围扩大到世界上包括容易遭受到攻击的弱小国家的遥远地区。美国担当起这些责任，以及它在道义上负起这样一种义务，即以战争以外一切手段去促进那些被奴役与分割的国家的事业，这些都表明美国并不缺乏主动权，而这种缺乏主动权是那些主張維持现状的国家的傳統态度的特点。

**心理因素**——对于实力来说，还有一些因素应当加以讨论，如果要能正确地估计这些因素对于双方实力对比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的话。举例言之，一个国家的民气可以成为其军事实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的集体行动精神及其愿意忍受艰难困苦的精神，可以使它轉敗为胜。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苏联不致重蹈納粹党人的复轍，低估“軟弱的”民主国家在危險关头时重整旗鼓的能力。

和战时民气一样，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中的决心可能会影响到一場互相威胁的战斗的结果，这对于主要依靠威懾力量的那种战略尤其重要。虽然，令人信服地决心在受到挑战时把自己的威胁付诸实施，是成功的威懾力量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也是实力的一个因素，但是单是这种决心并不能够使那种自取毁灭的威胁具有可能性。美国在明显的决心方面是否能同苏联相比，尚待結合具体情况才能下断語。但可以有把握的假定：美苏双方决心的可靠程度大部分是以它們

相对的軍事力量为依据。

**結論**——在檢查了一个国家的实力的非技术方面的因素后，如能作出一張关于美苏实力对比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影响程度的对照表将是有用处的。虽然在每一个因素方面已粗略地比較了美苏双方的力量，但不幸的是，由于其內容很不一样，估計也太不精确，因此不能正确地計算出它們对于双方实力对比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但我們可以作出这样的結論：虽然美国在某些非技术领域仍然保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現有的或正在发展中的有利于苏联的不平衡情况，如果美国不作出努力来抵制其影响的話，可能将危及美国及其盟国的未来安全。現在，我們可以按照上述研究的精神，轉而探討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于美苏軍事实力对比的影响。

## 第二章 对技术变化的评价

技术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軍事实力、以至对于国际舞台所产生的明显的影响，常常是不可靠的。那些在最初看来是一目了然的事，經过了比較仔細的研究后，就会变成表面現象，并且往往因发现更多的內在因素而修改甚至根本推翻最初的估价。这些因素之一是武器从开始起变化到它最后成为一个完备的軍事武器体系之間所需的时间。另一个因素是由于这一武器

上的变化而使整个国家军事力量所依赖的全部武器体系跟着起变化所遭遇到的困难。通常，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在适应这项变化以前，需要更多的时间。伴随着武器的新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整个国家战略的调整而来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因素，即这一变化对于首先取得这种技术进步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战略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技术能力大体相似的国与国之间，这一国家首先取得的一项武器发展上的成就，几乎肯定接着会在另一国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往往会模糊或歪曲武器变化对战略力量对比的重要意义。

仅仅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进行估价时所遇到的困难。1945年美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1949年苏联也爆炸了一颗。到1954年美苏两国都已发展了热核武器。必须假定：它们在最初试验这些武器取得成功后就立即开始大量储存这两种武器。这样一来提得这么多的美国“原子垄断”究竟是什么？其意义又何在呢？

常常有人谈到由于美国“垄断”了核武器，苏联将不敢采取某些政治与军事行动。但是，正是在1946年到1953年期间，从伊朗危机开始到朝鲜停战为止，所谓“冷战”已成为美苏关系的确定不移的特点。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年代中，由于共产党国家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使国际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正确地說，美国的核武器垄断只是从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哥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起，到1949年

8月苏联在西伯利亚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为止。但这一段时期，正是共产党加紧向西方施加压力的时期，苏联在这时正从事于巩固其对中欧与东欧卫星地区的控制，并采用了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向西欧扩充其势力范围。

另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壟断，形势会更糟，英倫海峽可能会成为共产党集团的西部边界。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没有看到苏联在战后头几年中由于战争中遭到巨大的人力物力損失而造成的真正削弱，正如它没有看到美国真正的（虽然是大量复員了的）常规部队实力一样，这支常规部队实力曾在不到三十年內赢得两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力量，并且并未遭到像苏联那样惨重的損耗。西欧战后的低落情緒以及美国人民战后初期力图摆脱战争后果的倾向，这些因素都貶低了美国的威信，同时也就助长了斯大林去利用苏联由于胜利（尽管它在战争年代遭到了可怕的損失）而产生的新的信心。

在牵涉到威信和信心問題时，核武器的作用就难以确定了。斯大林显然相信核武器不会在实质上改变战争的性质，我們如何针对这种信念来估量美国儲备的数量較少、威力不大的原子彈的价值（如在1948年6月开始封鎖西柏林的时候）？对于美国願意冒险承担土、希援助计划、馬歇尔计划以及北大西洋公約，核子壟断起了多大作用？在俄国人接踵掌握了原子彈之

后，美国政府是否就不那么敢于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对付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而这次干涉，是否就是反映了那些断定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享有决定性“领先地位”的人们的信念？

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技术变革影响世界军事均势的最好的例子。然而，即使军事技术上这种最为重大的进展，也并没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敌对的世界强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核武器的出现对世界形势产生的影响并不重要，事实上，它根本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并使国家军事实力的面貌大为改观。核子武器与战时航空事业迅速发展中的远程飞机相结合，使得战后两大强国间的敌对关系，从类似第一次大战前英、德间的敌对状态，改变成为一种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关系。而且，世界军事实力的分布，已经从一种虽不明显然而可以察觉的“实力均势”变成为两极性的分布情况；在“实力均势”情况下，决心保持现状的国家联合起来就可以和具有侵略性的先进军事国家进行有效的抗衡；在目前两极性分布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大胜利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远为强大。

正是由于武器方面这种根本性变化，美苏之间军事实力的平衡或不平衡问题就具有1945年以前所没有而在1945年以后也不一定产生的重要性和严重性。然而，当我们以美国的核子领先地位作为最显著

的标志来研究这种武器根本性的变化与实力平衡关系的时候，有意义的是，我們却找不到明确的迹象，可以让我们看出，在历史上，两个大国之中哪一个国家曾經从核子革命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又在什么时候（如果有这种时候的话）这种好处給其中一个国家带来过决定性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又持續了多久。

当然，我們可以設計两个国家的模型，标明它們的重要目标，运用分析的办法，来决定需要消灭多少个目标才能剝夺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加以“击败”。然后我們就可能計算出，为充分消灭苏联目标并把它击败，需要多少个美国目前儲备的那种原子彈。假定我們知道美国核子儲备的增长情况，我們就可以客观地計算出美国的核子力量究竟在什么时刻能够“击败”苏联。由于美国建立核子儲备的时间至少比苏联早四年，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美国要早于苏联获得击败对方的能力。

然而，由于需要包括其它一些因素，特别是需要具备核武器的投擲工具，我們的計算就要复杂一些。在1945至1954年間某一时刻，美国可能事实上已經在武器和投擲工具两方面都具备足以取胜的条件。但是更为可能的是，美国在它实际壟断原子武器时期，从未达到肯定可以取胜的水平。或者，由于美国在它的原子壟断被打破以后才向上述水平发展，因此，美国的能力也可能实际上已被苏联在获得足以击败美国的能力方面



的发展所超过——这一可能性是以下述情况为条件的，即为击败美国所需武器数量大大少于为击败苏联所需要的武器数量。而且，我們應該看到，由于报复力量的存在，发动攻击就日益需要更大的力量，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更为可能的是，美国从未在什么时候在它的核子武器和投掷工具方面居于决定性优势的地位。

假如存在过几乎可以“取胜”的时刻，那大概是在1949年算起的几年之后，而决定性的因素也主要不是在于美国的核武器领先，而是在于远程轰炸机的领先。而且，这种时刻（如果确实存在过），是在美国发展了氢弹之后到来的，但却并不是由于发展了氢弹才到来的。而美国比苏联可能确实具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时期也是比较短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发生了后来这些发展，就如同尽管存在过原子垄断时期那样，当时的国际局势对于军事平衡方面“客观上”的变化并不是及时而准确地有所反应的。

要获得事实不大容易。甚至最有经验的、最冷静的观察家，对于军事技术变化的意义以及这些变化究竟在什么时候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也不諱言他们的分歧。人们不应该期望使用这些新武器的军人以及负责掌握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国家力量的政治家，对于这些新发展的理解和运用将能保持客观态度，更不要说一般公众了。我们可以预料，在将来，如同在过去一

样,技术人员、政治家和公众在估量这些发展对国家军事实力的意义的时候,将是混乱不定、矛盾百出的。有些人会把某种新发展的一点苗头,看作是力量方面的决定性增长。另外一些人,则甚至会在新的力量已经可以使用的时候,还认识不清所产生的变化。有些人可能同时持有两种矛盾的看法,如同不少美国人在美国核子垄断时期那样,认为新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一切,而同时又认为什么也没有改变。负责国家事务的人们可能发现,他们在口头上声称最近在军事技术方面争取领先地位的竞赛已经使美国(或苏联)获得压倒的和无可争辩的优势,然而在行动上,又好像优势还没有肯定——甚至好像和他们口头所说的正相反。决策人士在夜晚也许会睡得很安稳,深信他们国家的巨大力量足以保证他们的国家不会受到军事攻击,甚至不会受到外交上的挫折;然而在白天,他们又可能在一个一个危机中挣扎,痛苦地意识到国家的力量还不足以有利地解决国际争端。

不仅是武器发展的“客观上的”意义难于估计(即使是技术专家也是如此),而且,要把这些发展变成为有用的武器体系,再把这些武器用之于支持外交政策,则还要经过一条曲折的漫长道路。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可能有希望对于发展着的军事技术中具有“意义”的因素,获得某种程度的理解,并可能从而对于下面的问题形成某种概念,即如何证实某种有意义的变化对一方

而不是对另一方有好处，或至少是对某一方的好处更大一些。我們可能对由于将会为一方或另一方提供决定性优势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某种重大意义，得出某些結論。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們可能会判明某种具有客观现实意义的因素以及某种物质变化的中心内容，这种因素与内容，由于人类理解和相互沟通上的困难而变得模糊不清，人类的这种困难，是在他們把想法变成实际的武器，把武器变成武器体系和国家战略，再把武器体系和国家战略变成国家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

### 第三章 军事技术发展的几个时代

在短短的十五年中，美国的军事地位已从很安全的状况下降到很不安全的状况。这一转变当然与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有关，但苏联的挑战不可能做得如此迅速和成功，如果不是因为军事技术的发展，使苏联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的话。

这些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原子弹、氢弹、远程喷气式飞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生产上。这些成就中的每一项，都对战略平衡及美国所采取的战略有着可以辨别出来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一章中讨论。这些发展加在一起的总的影晌，则是使美国失去了凭借地理位置的隔绝状况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建立起来的无

可置疑的軍事安全地位。

这样說并不是要忽視那些影响着武器在政治与軍事上的作用的时间性、适应性、质量和数量等因素；美国是首先发展核武器及其投擲工具的国家，这一事实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但这里打算研究一下最近以来的一些技术发展在战略上的含义，在这一点上，敌对双方的现实态度都要求假定对方能发展出类似的武器。

在评价新武器在战略上的影响时，可以把过去十五年来軍事技术的发展看作一系列的武器体系“时代”，即常规武器时代、核武器时代和核导弹时代。这几个“时代”互相交叉的程度，較生物上世代互相交叉的程度要大得多；例如人的拳头至今仍是一种有效的“武器体系”<sup>①</sup>。但每一时期都有区别于其它时期的特点。

### (一) 常规武器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大国在战略武器上都已进入到常规武器（核子以前的）时代的后期阶段，当时被人们称为空軍时代。如果冷战在这个时期内成熟起来，美国以它的巨大工业基础和由于地理隔絕状态所得到的保护，很可能在战后世界中保持住它的軍事优

<sup>①</sup> 一个“武器体系”包括一个或若干个武器以及为了使用这武器来对敌作战所必需的輔助性装备、物资、人員等。这一名詞通常限于复杂的和大的武器，如飞机和导弹等。

勢地位。敌人要想对美国发动并且成功地进行一次在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其所需要的时间与努力，将会使美国有足够的警报时间来动员工业与军事力量。

苏联有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积累起足够多的常规远程空军力量，从而对美国提出严重的直接的挑战，就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对英国的海军优势提出挑战一样。但我们在地理上的有利地位使我们可以用或许比苏联所需花费还要少的开支来对付这种威胁。

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是：使我们的地面部队与我们欧洲盟国的部队相配合，并加速发展我们已占优势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要同这样规模的军事努力作竞赛，在大战刚告结束的年代中，看来非俄国力所能及；十分可能，单只苏联的资源是不足以改变我们空军力量占领先地位这种状况的。不过，如果苏联能取得对西欧工业设备的控制，它就能希望比较容易地建立起为了对美国施加军事压力所必需的海军与洲际空军。

这种估计就可能形成一种“常规”的战略：加强我们盟国的地方防务，同时保证在它们受到进攻时用我们的战略空军进行支援，以补救西欧与俄国之间在人力上的不平衡。在这样一个战争中我们的潜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致有理由相信苏联不敢发动进攻。

## (二)核武器时代

美国和苏联的軍械庫中相继新添了核武器，这标志着进入了核武器时代，再加上噴气机形式的远程投擲工具的发展，几乎就立即发生了这样的后果：时间和空間在作战中的重要性突然有了改变，同时使敌人遭受巨大毁灭所必需的武器与投擲工具的数量也大大地减少了。由于防御能力并未改进得足以抵消破坏力的这种飞跃进展，故在軍事上的实际結果是：发动进攻者将得到胜利。

我国不再需要成万的轰炸机来进行战略性的空軍作战或保証对受到威胁的盟国給予有效的援助。但由于同一原因，苏联为了威胁美国也不再需要建立一支数量龐大的空軍。在这一意义上，保卫西欧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力，也就不再是等于保卫美国了。

武器方面的这种革命，在它发生的当时，由于人們相信美国壟断着核武器，其意义未被清楚地認識到。在壟断者的眼中，核武器可以被看作，而且事实上确曾被看作一种廉价的手段，通过要使用它来进行威胁，以达到軍事与政治上各种各样的目标。大西洋两岸的战略家对核武器的初期反应就是如此。

对新武器的热忱，由于朝鮮战争的經驗而暂时地冷了下来，朝鮮战争經驗表明，共产党人不顾核武器的威胁，甚至正因为这种威胁，仍能有效地使用常规武器

作战。于是产生了这一种想法：为了保卫西欧和圍繞着共产党集团的其它盟国，需要比当时已有的要更多一些的地面部队与战术空軍。但1953年7月朝鮮战争停止，有关这一类問題的紧急感不复存在，而美国战略空軍力量的繼續建立与扩充，使恢复原子壟断战略显得既屬可行，又具有吸引力，因为当时实际的原子壟断，或者更确切地說，核武器优势，正在迅速地消失中。

因为，必須相信苏联在1954年初或其后不久就已开始儲存氢彈，而苏联远程渦輪推进式(熊式)和噴气式(野牛式)轰炸机的同时出現也对美国的空軍优势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事情变得很清楚，美国地理位置的隔絕状态不再能保障它不受到直接的和毁灭性的进攻，这种进攻的速度和規模还会使它失去另一个有利条件——即在大規模战争爆发之后能动员起决定性作用的軍事力量。

如果美国的工业力量不再能在战争爆发之后起决定性的作用，仍可相信工业力量在和平时期的利用能决定性地促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我。战略空軍司令部本身的規模和力量似乎就充分地証明美国有这种保持領先地位的能力，美国是居于如此遙遙領先的地位，以致苏联对美国或其盟国发动进攻簡直会是失去理智的、或許甚至是不可思議的行动。

其后美国为了維持这种領先地位所作的努力，采取了人們所熟悉的途徑。即繼續主要依靠战略空軍的

报复力量以保卫我们的盟国，并作为防止直接进攻美国本土的威慑力量。到1956年，战略空军司令部已有中型轰炸机一千五百架，并且已开始用B—52型的远程喷气轰炸机来代替B—36型螺旋桨推进的轰炸机。由于核武器的技术进展，已能生产小型和轻型的氢弹，使B—52型轰炸机能同时携带几种不同的核子武器。可以这样地估量一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潜力：它一次就能投下相当于几亿吨普通炸弹的核弹，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一切由轰炸机投下的全部炸弹”约为二百万吨。

曾经有人提出警告，认为不应过分地依靠战略空军，特别是不应依靠它作为威慑力量，因为它很容易遭到突然袭击，而且我们的对手是既有能力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并且越来越了解突然袭击的巨大好处。但美国业已大力修建可以尽早发出警报的雷达网，据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可以在自己的各个基地会受到袭击的几小时之前就收到警报，这就使战略空军有足够的时间安全起飞，给予敌人以沉重的回击，因此仍可信赖美国有足够的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空军力量，甚至空军优势。

### (三)核导弹时代

对于上述各种概念和论证的可靠性来说，对于美国人相信自己在工业与技术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优越地



位这一信念来说，苏联宣布在 1957 年 8 月 26 日成功地试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和不愉快的震惊。

这一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发射出两个重量大得惊人的地球卫星的事件，标志着核导弹时期的到来，而苏联首先制成了如此重要的武器，是令人深刻不安的。由于并没有别的国家有过这种导弹，很难把苏联的这一成就归之于间谍活动；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这个领域中，苏联已赶上或甚至超过我们的技术成就。

苏联的这一成就，除了它对美国的威望和自满情绪发生影响外，还有军事方面的含义，使我国有必要对自己的防御地位重新加以估价。主要依靠战略空军作为威慑力量来阻止苏联发动进攻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其基地受到袭击之前能预先得到警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起飞一支相当大的空军，予敌人以回击。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粉碎了美国的这一信念：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突然袭击到来之前，将预先收到警报，有足够时间安全起飞。因为很少有可能在导弹进攻到来之前会预先收到警报，而防御导弹的办法更是确定无疑地没有。

人们的注意力最初是集中在洲际弹道导弹作为毁灭城市的武器这一点上，初期导弹破坏力大但准确性不高的性能似乎极适合于用来毁灭城市。但更要大得

多和更为可能的危險則是苏联導彈对美国战略空軍基地的突然进攻。苏联不一定要在有希望全部摧毀美国战略空軍时才会发动这样一次进攻，因为苏联的民防与空防已有改进，即使在導彈襲击美国后，一部分战略空軍能殘存下来飞往苏联轰炸，苏联的民防与空防設備可以把破坏减低到为害不大的程度。

正是苏联可以先用導彈攻击我們地面上战略空軍的可能性，构成了核導彈武器时代到来后我們所面临的主要問題。

初期的洲际導彈，同現在的噴气轰炸机比較起来，在准确性或破坏力上并不处于有利地位，而現有的洲际導彈数量也还不足以使它在战略力量对比中居优势地位。但到六十年代初期，当洲际導彈無論在数量上或破坏力与准确性上都足以使之成为优势的战略武器时，美国很可能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着苏联：苏联在軍事主动权和获知敌方目标的情报等方面的有利地位，可能具有非常巨大的重要性。

在只有轰炸机是战略武器的情况下，苏联在获取情报方面的有利地位，当然会具有重要意义。苏联的对外封鎖的社会，使我們难于預先获得它在准备发动进攻的消息，而我們自己的社会則极易被敌人及早偵察出这一类的活动；例如，大批飞机起飞的消息，几乎一定会被报往莫斯科。故苏联比美国更能对敌方进行出其不意的奇襲。

情报这一因素，还能补救苏联空军轰炸力量较弱的缺点。我们自己的战略空军基地和次要性机场地址都很容易被敌人知道，但我们的空军部却从来不曾肯定地、令人信服地声言它也知道苏联的战略空军基地和次要性机场的地址<sup>①</sup>。

导弹武器出现后，由于美国战略空军现在仍然是以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为中心，苏联在情报方面的有利地位就具有了异常巨大的重要性。一方面，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在一次导弹进攻到来之前，无法获得警报，很可能永远得不到比复杂的雷达设备所能提供的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要多一些的预先发出警报的时间；同时，要想在战争发生之前知道苏联大部分导弹基地地址所在的可能性，则甚至更要少<sup>②</sup>。因此，美国能否用先发动进攻或在苏联侵略了我们盟国之一时进行还击

① 空军参谋长怀特将军曾就有关敌人基地地址的情报问题作出这样一个概括的叙述：“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主要空军基地在什么地点；他们主要的政府控制中心在什么地点；他们的空防中心在何处；他们容易遭受攻击的工业目标在何处；他们的汽油提炼厂和汽油贮存库在何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敌方的目标地址有精确的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确知敌方导弹基地地址所在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以上引自1959年2月17日国会证辞记录第840页关于196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证辞。

② 关于人造卫星和其它空间侦察体系在进行间谍性活动方面的功用，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目前看来，它们所可能提供的情报，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足以影响美苏情报力量的对比。

的办法，有效地进攻苏联的导弹部队，已大成问题了。

虽然美国在今后十年中一定会用弱点較少的导弹武器来代替絕大部分現有的轰炸机，但苏联仍可保持它知道我們业已确定的战略基地地址的这一有利条件。仿佛是要增加苏联在这方面的有利条件似的，美国的导弹发射場、雷达警报站、空防設施和海軍通訊中心的地址，現在甚至距动工修建还很远，就已經在广为宣揚了。

#### (四)核导弹时代的两个阶段

当铁幕两边都已拥有少量的洲际彈道导弹的时候，核导弹时代初期阶段的特点是：在洲际范围内投掷核武器所需要的时间大大地减少了，因之防御者所能預先获得警报的时间也减少了，而获取有关敌方目标所在地的情报便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上这些特点，加上目前尚无任何对付空中洲际彈道导弹的防御办法，就大大地增加了有人駕駛的轰炸机的这一弱点：即容易遭受那首先取得用导弹大举进攻的能力者所进行的突然襲击。首先取得导弹进攻能力者，至少暂时地会拥有首先发动进攻的优势。

美国战略空軍司令部目前仍能消灭停留在地面上的苏联轰炸机力量的大部分，故它比起它的对手即苏联的远程航空队来，目前仍显然具有能够首先发动进攻的有利条件。在敌人有效地使用其战略进攻力量以

前就把它消灭或严重削弱的能力，叫作“反击能力”，它是战略力量对比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如果苏联首先取得用导弹大举进攻的能力，而我们自己的战略力量仍然主要靠轰炸机，则首先发动进攻的有利条件将立即转移到苏联手中。由于苏联在获取敌方目标的情报方面有着人所共知的有利条件，而它具有先进的民防与空防设备也是人们通常都相信的，所以如果苏联发动一次突然的导弹进攻，就会如此削弱美国战略空军的能力，以致俄国本土经受得起残存的美国空军的还击。

正因为苏联有可能取得这种首先发动进攻的能力，那些把日益逼近的“导弹差距”<sup>①</sup>看作对美国安全最大威胁的人感到烦恼不安。为了延迟或甚至阻止军

① “导弹差距”通常指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走在美国前头的状况。苏联在这方面的领先可抵消美国战略空军的威慑力量。约瑟夫·阿尔索普在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美苏导弹力量对比提出了如下的“最好的官方估计”，1960年美国有三十枚导弹，苏联有一百枚，即三十枚对一百枚，1961年是七十枚对五百枚，1962年是一百三十枚对一千枚，1963年是一百三十枚对一千五百枚。阿尔索普认为，导弹差距将是美国的危险时期，一直要等到1965—66年美国能大量生产使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时，这种危险时期才结束。可参考刊载在1959年10月7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上一篇有版权的标题为“在艾克之后，听天由命吧”的文章，及刊载在1959年1月8日“报道者”杂志上、美国已退休的陆军准将汤姆斯·菲力普写的一篇题为“日益扩大的导弹差距”的文章。

事有利条件突然轉入对方手中,已提出了若干办法,其中包括把战略轰炸机作更大的疏散,加强对战略空軍基地的掩护或至少使之受到部分的保护,使更多的飞机处于戒备或能迅速行动的状态,把通訊与警报設備加以分散并設在地下,等等。目前已在这些方面实施一些有限度的計划,其目的在于:苏联要想首先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必須有更多的導彈;同时也在于减低苏联的信心,使它不敢相信发动这样一次进攻就能够把美国的战略空軍力量削弱到为它所能忍受的程度。

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其目的在于使战略空軍繼續拥有突破苏联空防設備的能力,以便即使是一支数目大为减少了的轰炸机队,仍能具有巨大的还击力。这些办法包括:使用电子反击装置、电磁波干扰和誘騙装置等来扰乱或阻止防空雷达的活动,以及使用空中发射的能在数百英里外命中目标的彈道導彈来进攻或越过苏联的防空体系。

为了在我国建立一支比起战略空軍司令部現有的、轰炸机来在对付突然襲击方面弱点較少的战略導彈力量以前,即能阻止苏联在战略力量对比中取得优势,所有上述各項办法,都是必須采取的輔助性的措施。虽然采取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証美国保持目前被假定具有的能首先发动进攻的有利条件,但至少可阻止敌人取得这一有利条件。

必須預先看到,如美国現在計划要作的那樣,苏联

将会把它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放在地下的发射场，并且以后还会放在机动的发射场<sup>①</sup>，以保护导弹，使之不受到来自敌方的进攻。因此，在未来的时间中，敌对双方战略力量的基地目标可能如此的多，并且如此的受到保护，以致不能希望用一次突然袭击就消灭或甚至只是大大削弱对方的战略进攻力量；导弹基地数目和种类的增多以及地下化或机动化，至少会减少每一方对于以突然袭击消灭或削弱对方战略力量所抱的信心<sup>②</sup>。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核导弹时期就会进入到第

- ① 美国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已知的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都需要在即将发射之前进行复杂的检查工作和装入液体燃料，因此它们必须安放在具有必要的辅助性设备的固定的发射场。由于它们几乎高达八十五英尺，重达一百吨，故机动程度不可能很大。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固定发射场现在都正在被移到地面以下，并用水泥将地面硬型化，以便尽可能保护导弹，使之不为敌方的导弹弹头所摧毁。

可以预期的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将使用固体燃料，它的体积和重量也较小，因而可以大量生产并且较多地安放在机动发射场上，这是现在还不可能实现的。不过，由于固体燃料（不管是现在已有的或预期将会有的固体燃料有缺点，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弹头的破坏能力，预料将只有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弹头破坏能力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属于第二代导弹类型的美国民兵式导弹，预料可在1963年制成。

- ② 空军部发言人常常强调维持一种对付苏联战略力量的反击能力的好处，但对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被隐藏和地下化的情况下，如何能维持反击能力，则表示很没有把握。伊尔文中将今年春天在国会中说，反击能力问题“是使我们感到相当担心和忧虑的一个问题，它也是我们为甚么要力求导弹能准确地击中

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将是：双方都拥有相对安全的战略武器体系，同时，与此相关联，双方都失去了对对方的导弹力量发动一次有效进攻的先发制人的能力。

在这方面，可以预期的战略武器的特点，可能导致战略力量对比的更为稳定的平衡，在这种平衡状态中，由于双方都没有能力，哪怕是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消灭对方的导弹力量，使之丧失还击能力，因而苏联不敢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美国也不敢用可能发动进攻来有效地威胁苏联。这样一种有条件的互相威慑或核子僵局的状态，是以下列两点为条件的：敌对双方所拥有的导弹武器的数量和相对的易遭攻击性，以及，如本书后面还要讨论的，双方在导弹技术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经常有变动。如果认为达到了这种僵局状态就可高枕无忧，或认为在军事技术发展飞跃进展的时代中僵局会持久下去，那将会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将来会出现的这种稳定状态所可能具有的性质和含义，对美国有着很复杂和重要的后果，本书后面专有一节来讨论它。本章余下部分将更加详细地研究一下

目标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能比我们的对手做出更好的成就，并且希望我们在战术运用上比它强”（见1959年4月10日美国国会辩论1960年度国防预算的证词记录第636页）。要想有效地“摧毁”隐藏在地下敌方导弹力量，至少有以下两个障碍：获知敌方目标所在地的情报力量有限；目前洲际弹道导弹的准确性和破坏力也有限。



核導彈時期的初期或過渡階段以及它的戰略含義。

### (五) 導彈差距的危險性和前景

正是核導彈時期的這個過渡階段，即介於目前由遠程轟炸機占優勢和將來由洲際彈道導彈占優勢這二者之間的階段，構成了美國當前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險。蘇聯在甚麼時候將會積累起足夠數量的洲際彈道導彈，並且具有足夠的準確命中的能力，以至於它可以考慮對美國戰略空軍基地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呢？關於這一問題，曾有各種不同的估計，但許多有資格的觀察家都認為這一時刻將在六十年代初期到來<sup>①</sup>。

由於我國已正式承認，在六十年代初期，蘇聯將在導彈數量上居領先地位<sup>②</sup>，故目前的注意力集中在這樣一個競賽上：是蘇聯先取得為進攻美國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導彈力量呢？還是美國先完成一個或幾個導彈警報體系，使戰略空軍司令部能在敵人導彈到達以

---

① 例如，空軍參謀長說過，蘇聯可能在1960年就擁有足夠的導彈力量，以至於戰略空軍司令部必須使一部分轟炸機保持空中戒備狀態作為預防性措施（見1959年2月18日國會証辭記錄的第一部分第864—865頁懷特將軍關於1960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的証辭）。空軍彈道導彈師師長施里佛少將說，蘇聯在1962年或1963年將能在同一時刻內發射出比較大量的導彈，他認為這個時期將是美國最危險的時期（見1959年4月9日國會証辭記錄第5部分第709—724頁關於1960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的証辭）。

前的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就得到警报？两个这样的雷达体系目前正在修建中，一个是空军的弹道导弹早期警报体系，另一个是海军正在修建的“圆锥形帐篷”计划。根据某些业已公布的估计，预料空军的弹道导弹早期警报体系将于1960—61年完成。一种更先进的预防导弹的警报体系，代号称为迈达斯，将利用安装在人造卫星上的红外线感光器，侦察到正在起飞的导弹上的炽热气体以发出警报，但这种警报体系现尚在研究与实验阶段。

这些警报体系的功用是预先发出警报，使战略空军司令部处于戒备状态的轰炸机，在敌人导弹到达之前能有足够的时间从基地起飞。对于这样一种预先发出警报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考虑到目前尚无任何积极防御洲际弹道导弹进攻的有效办法，那就无论怎样说

- ② 如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今年（1959年）1月向国会所说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要在今后两年内使用以导弹对导弹的办法来同俄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竞赛。我们的地位是……我们能发射多种多样的大型武器，这将是我们所赖以遏阻发生大战的能力”。他还说：“……我们预料，俄国今后有能力做出比我们打算根据我们的计划在纯粹属于洲际弹道导弹范围内所做的更多的成就”，后来他被人引证过，说他估计苏联在导弹方面可能以三比一的比例领先。见1959年3月9日“生活”杂志詹姆斯·希普利题为“在导弹计划上的激烈辩论”的文章。希普利说，苏联到1962年大概可有五百个洲际弹道导弹，按照美国的导弹生产计划，到1963年中，约有二百个洲际弹道导弹。可与前面引证过的阿尔索普的估计相比较。

也不会夸大了。正如战略空军司令最近在一次証詞中所說的：

“如果我得不到这种进攻的警报，我在此时此刻的力量就等于零，只要敌人有能力消灭我停留在地上的空军的话。你们必须首先告诉我，我能在这种进攻到来之前的多长时间内得到警报。这一点是关系着一切的关键所在①。”

在完成这种警报体系以前，作为暂时性的办法，空军现正在计划使少数装载着弹头的远程轰炸机继续不断地在空中飞行，以防御苏联导弹突然进攻美国空军基地。初步的试验表明，这种继续不断地在空中飞行的轰炸机，有90%能保持在其轰炸目标的航程之内，但即使只保持全部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三分之一在空中继续不断飞行，处于经常戒备状态，也有很大的困难，这大概是由于缺乏有训练的飞行人员。这种办法也很费钱，仅燃料和保养费的增加，据空军估计，每年就要多花十二亿美元②。

由于上述的暂时性防御办法有着明显的缺点，且时间难于确定，故在导弹差距期间苏联发动突然进攻的主要障碍，看来倒不在于导弹武器的缺点，而是在于

---

① 1959年2月13日国会証辞记录第2部分第404页湯姆斯·鮑威尔将军关于196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証辞。

② 关于196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国会証辞记录第1部分第985页湯姆斯·怀特将军的証辞。

实际上很难在几乎同一时刻内摧毁一大批分散的目标，而这一点又是苏联为了不遭到大规模的报复性还击所必须做到的。这些目标包括：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海外基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术空军（其飞机能向苏联境内若干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目标投掷核弹），在西欧及英国境内的少数几个中程导弹基地，以及能发动战略进攻的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述这些武器，在苏联导弹和飞机的进攻中可能逃脱掉的数量，加上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国内残存下来的力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进行还击的威胁，使苏联不得不慎重考虑。没有一个具有理智的政府会对哪怕只是一打的热核炸弹落在它的主要城市采取轻率的态度。

进行一次有关武器协同作战的突然袭击，还另有一个不能确定的因素：如果许多准备工作的先后次序安排不当，就能使整个计划失败。例如，苏联第一批中程导弹击中我们海外空军基地之一的時間，哪怕只比洲际弹道导弹击中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国内基地的时间早二十分钟，就会有几百架美国的轰炸机（它们现在处于十五分钟内即可起飞的“地面戒备状态”）在自己的基地被毁以前起飞，并且向着苏联境内的目标前进。苏联发动突然进攻的阴谋计划，也可以由于它的异乎寻常的民防活动或导弹潜水艇集中在美国境内目标的航程以内而暴露。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将会减少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苏

联在核导弹时期的“过渡阶段”中对美国战略空军基地发动突然进攻的倾向。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同一时期中，美国进行报复性的还击也有着一些严重的障碍，因而美国想以报复相威胁，阻止苏联发动进攻，也有着严重的障碍，并不可靠<sup>①</sup>。美国的战略空军在今后若干年中将继续是一支很易受到导弹进攻的力量；据空军部估计，战略空军司令部如果让苏联取得先发动进攻的有利条件，它进行还击的力量可能减少到发生敌对行动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残存下来的还击力量，由于苏联防空体系效能的日益增加，更形减少。为了携带为突破苏联防空体系所必需的装备<sup>②</sup>，美国战略空军所能装载的用来轰炸的弹头，已被迫有所减少。

残存的美国战略空军以进行还击来对苏联施加的

① 比较一下登在“外交季刊”第37卷第2期(1959年1月出版)第211—234页由艾伯特·沃耳斯提特写的题为“微妙的恐怖平衡”的文章。

② 这包括雷达干扰装置、反雷达的空对地导弹以及模仿轰炸机的雷达回音的诱骗装置。值得注意的是，在1959财政年度中空军购置反雷达电子装置的经费增加了一倍多，从九千五百万美元增至一亿九千六百五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来购买防御用的反雷达电子装置。空军物资计划处处长在这方面的证辞是：“这个关于反雷达电子装置的购置计划，反映了我们对敌人雷达威胁的反应……到了那时候(1960年以后)，我们一定能反击敌人日益增多的先进的防御装置、更多的频率、更强的电力和反雷达装置体系”(见1959年4月13日国会证辞记录第5部分第590页C·W·安德鲁斯上校关于1959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证辞)。

破坏，还会由于苏联的民防工作而更为减少。同我国的民防工作相反，据说苏联现在正在以越来越大的现实态度加强民防工作<sup>①</sup>。不能轻率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苏联可以在表面上举行各大城市例行的疏散演习的同时发动突然进攻，这样就可把由于我们还击而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军力量以及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作为威慑力量的价值是很小的，因为它们很容易受到苏联现有导弹的进攻。而且，早期的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由于数量有限，且基地地址已为人所知，也很难增加我国的威慑力量。

因此，看来很难希望大大缩短这个危险的过渡期，或在六十年代初期结束这个预期的导弹差距。严重的障碍在于：部署主要的武器体系并且使之完备无缺是需要时间的。最近发射阿特拉斯式洲际弹道导弹的时间推迟了两个月，发射雷神式中程导弹的时间推迟了半年，便都是例证。训练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人员，目前所需时间约为一年，修建一个洲际弹道导弹中队的地下基地从设计到完工需时一年半，建造一艘导弹潜水艇需时两年半到三年<sup>②</sup>。

① 见1959年4月27日第八十六届国会众议院第一次会议的“政府活动委员会”的第5个报告：“西欧和苏联的民防”。

② 训练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人员所需时间，以及修建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从设计到完工所需时间，都是根据研究导弹的专业性刊物所作的估计。修建一艘弹道导弹潜水艇所需时间是根据海军的

按照美国目前的導彈生产計劃，到1962年底可以有一百枚多一点的洲際彈道導彈，到那时苏联所擁有的洲際導彈，据信可数倍于美国。即使实行一項突击修建導彈基地的計劃，也难以設想美国能在1963年时拥有三百枚以上的導彈（苏联到那时可能<sup>③</sup>有一千枚或甚至更多的導彈）。美国導彈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由于机械裝置的可靠性有問題，其軍事效能更受到限制。根据較乐观的估計，我国初期生产的使用液体燃料的導彈可望有80%的可靠性，較悲观的估計則认为，能抵达目标附近地区的導彈，难望超过50%。当然，随着經驗和工程技术的改进，導彈的可靠性也可望增加，但由于苏联的導彈发展計劃時間既长久，且有連續性，可以預料它在这方面将处于有利地位。

一种由机动基地組成的導彈体系，即由許多装备北极星式中程導彈的核子潛水艇組成的導彈体系，曾經被預先加以广泛的宣揚，它被說成是今后若干年中

---

估計（見1959年4月6日国会証辭記錄第5部分第283頁W·F·雷朋海軍少將关于1960財政年度国防預算的証辭）。建造彈道導彈潛水艇以及其它由核子發動的潛水艇的時間包括了建造潛水艇的动力房、發射控制和航行裝置的時間在內。

③ 必須着重指出，对这一估計应持保留态度，因为关于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導彈数量，根据业已發表的估計数字，有很大差異，从估計为美国計劃生产数的三倍到十倍。这种差異，正如对苏联現有洲際彈道導彈力量的估計也是其說不一一样，表明美苏双方情報力量的悬殊。

具有巨大潜力的威懾与报复力量体系<sup>①</sup>。一般认为这种舰队彈道導彈体系有以下两个优点：它的所在地比較地不易被敌人知道，而且它能把敌人的原子火力从美国本土引开，而不是引向美国本土。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缺点（虽然这些缺点远不能超过上述的两个优点）：同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彈道導彈相比較，北极星式導彈的准确性和破坏力，預料都不高；而且除了全面核子大战以外，它在任何別种战争中都沒有用处。

虽然第一艘北极星式導彈潜水艇至今还远沒有到达作战状态，但可以举出很多贊同这种導彈体系的理由。机动性的战略武器可能成为唯一具有现实意义遏止核子攻击的威懾力量，如果洲际彈道導彈的准确性得到如此大的改进，以至于導彈对目标的命中率可能达到很高程度的話。不过，到1962--63年时美国将会有或甚至可能有的北极星式導彈潜水艇的数量还太少，还不能把它作为導彈差距时期一个重要的起輔助作用的威懾力量<sup>②</sup>。

的确，導彈差距最令人沮丧的一个方面是：我們似

---

① 可代表美国海軍方面意見的有，1959年3月第85卷第2期“美国海軍学会月刊”美国海軍中校P·H·巴克斯著“有限的威懾，有节制的报复性还击”一文，关于以海洋为基地的报复性武器体系的威懾功用，奥斯卡·摩根斯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可参考他在1959年9月号“幸福”杂志发表的题为“美国战略中的决胜理論”一文。这两篇文章都包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各种偵察潜水艇裝置的能力將繼續处在目前比較低的水平。



乎无法避开它，如果苏联生产出它被认为能够生产出的那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关于苏联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意图的一些估计，当然有可能像仅仅三年以前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关于俄国轰炸机生产的那些估计一样，被证明是大大地夸大了的估计。现在，同那个时候一样，把我们的威慑力量建立得过大一些，而不是建立得不够，将会是比较更安全的方针。由于这一方针影响到导弹差距时期的初期阶段，美国现在在这方面已无选择的余地了。

#### (六)核导弹时期的后一阶段

在目前的和可以预期的军事技术成就的水平上，唯一“不易摧毁的”武器体系是那种为敌人所不知道的武器体系，而这样一种体系，从它的定义就可看出，将不起威慑的作用。不过，某一些武器体系，比起其它的武器体系来，用现在已有的或可以预期的办法加以摧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现在看来，发展这种相对安全的攻击力量，将成为六十年代中期或甚至更往后一些的核导弹时期后一阶段的特点。

取得军事上这种相对安全的传统办法是把武器加

- ② 建造九艘北极星式潜水艇的经费业已拨付。第一艘可望于1960年建成，1961年7月可再建成四艘，其余四艘可于1963年底完成。海军发言人曾提到一个计划，要在1970年达到有四十艘这种潜水艇的目标，这个数目似乎是适合于这种潜水艇体系的功用的。

上装甲或加以掩护、隐藏、分散、使之机动和增多武器的数量。早期的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将有掩护、即基地将被设在地下，但发射场将没有机动性，而且除了它们所在的地区将成为军事禁地以外，也没有被隐藏起来。一种更先进的导弹体系，即前面已加以说明的北极星式导弹潜水艇，可能除了无掩护外，将可利用上述各项保护办法。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例如预料将在1963—64年制成的使用固体燃料的美国民兵式导弹<sup>①</sup>将具有机动性，并且所有各种导弹都可用疏散的办法得到部分的保护。<sup>②</sup>同样的一些办法也可应用于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其它一些战略武器体系，例如，保持空中戒备状态的远程轰炸机能以具有最大限度的机

---

① 空军现正计划把一支庞大的“民兵式”导弹力量的半数左右，安装在卡车、河上船只和特别用来安装导弹的火车上。不过，据认为，这种保护办法比把基地地下化和疏散更花钱，并且预料导弹只能从预先测量过的地址发射。见1959年4月9日国会记录第五部分第685—686页伯纳德·A·施里佛少将关于196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证辞。还可参考W·E·霍华德在1959年6月号“火箭与导弹”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把民兵式导弹安装在火车上的想法被提出来了”的文章。

② 初期建立的几个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中队基地将既不是设在地下的，也不能加以适当地疏散，其所以这样作，是为了使这些导弹中队尽可能早地具有作战能力。据称至少最后成立的五个阿特拉斯导弹中队和所有十一个计划要成立的大力神式洲际弹道导弹中队的基地都将加以疏散并且设在地下到可以承受每平方英寸一百磅的压力。

动性这一优点作为保护，而且在某些活动条件下也可部分地避免敌人的发见。

所有上述各项办法所提供的“不易摧毁性”都不是绝对安全，不怕进攻的。隐藏和机动性可以被间谍活动或使用如雷达和水底测音器之类的电子装置来识破。人为的隐藏办法（伪装）可以用许多种感光装置（包括红外线空中摄影）来识破。掩护的办法，即使是远超过目前美国洲际导弹基地地下化的标准，即每一平方英寸可承受一百磅的高压，也可以由于爆破力以数百万吨计的武器对地面的巨大震动力而失去作用，或者被使用同一类武器将目标的地面“炸裂”的办法加以摧毁。甚至在海洋深处航行的核子潜水艇，由于它本身的声音和核子爆炸在水面以下所产生的震动波会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被发见。因此，这些办法的目的都不在于使个别报复性武器得到完全的保护，不遭受进攻，而是由于敌人更难发见、辨别和摧毁这些武器体系，侵略者为了取胜就有必要大大地增加自己武器的数量、威力和复杂性。例如，一个未加掩护、未隐藏起来而且显然不具有机动性的机场，只要四个到六个具有苏联初期导弹那样威力与准确性的洲际弹道导弹就能完全摧毁，而毁灭一个地下的导弹发射场却需要三十个到四十个具有同样威力与准确性的导弹<sup>①</sup>。因

<sup>①</sup> 这些估计数字是根据与导弹方面的权威人士的谈话作出的，可以把这些数字同查理斯·A·墨菲在“摆好了阵势的麦克耳罗

此，假若一个装备有十顆導彈的導彈中隊，能把它們的導彈適當地加以疏散，使敵人对它的每一顆導彈都必須個別地進攻，那麼，進攻這十顆導彈所需要的總的能力，就比摧毀戰略空軍司令部一個空軍基地所需的能力要大五十倍左右。

把一些可以預期的戰略武器體系加以疏散、掩護、隱藏並且機動化，還可迫使潛在的侵略者致力於他一直忽視了的一些方面，甚至須發展一些完全新的進攻與防禦體系。例如，如果能建造足夠數量的發射導彈的潛水艇，就會引起蘇聯在反潛艇武器方面的興趣與

---

伊先生”一文中所提出的估計數字相比較，該文刊載在1959年4月號“幸福”雜誌上。假定蘇聯到1962年的洲際彈道導彈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它的彈頭威力等於二百萬噸普通炸彈，擊中目標的準確率可在目標周圍的二英里以內，墨菲根據空軍的情報資料所作出的估計是：要摧毀一個地下的美國洲際彈道導彈基地，至少要發射十四個上述那樣的蘇聯導彈，才可望有90%的或然率。因此，美國計劃要生產的一百一十枚設在地下的和疏散的大力神式導彈，就需要蘇聯同時發射一千五百枚導彈才能消滅它們。

不過，指出以下一點是重要的：消滅對方反擊力量所需要的導彈數量，與進攻的導彈擊中目標的能力成反比例。據墨菲稱，如果蘇聯到1962年時導彈擊中目標的準確率是在目標周圍的三英里以內而不是二英里以內，其它各項因素不變，那麼，消滅一個大力神式導彈基地所需要的導彈數就會從十四枚增加到將近六十枚，而消滅全部大力神式導彈力量所需的導彈數就會從一千五百枚增加到六千枚。

活动,从而分散它在其它方面的努力<sup>①</sup>。如果美国发展出一种在空中发射的射程在一千英里以上的彈道導彈<sup>②</sup>,苏联就必须发展截击机和比現有的射程要大得多的地对空導彈。当然,洲际彈道導彈的出現业已迫使敌对双方把相当多的經濟与科学資源用来发展導彈防御体系。

所有这些使侵略者的工作复杂化和增加它的資源負担的努力,都是为了不断地推迟这样一天的到来,即侵略者在那一天可能相信他的力量足以在一次突然襲击中消灭对手的战略力量。这种突然袭击的效果是衡

① 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德国使用磁性水雷,便是使用或威胁要使用牵制性武器体系而取得效果的一个例子。德国当时使用磁性水雷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沉沒盟国的船只,“而且是要迫使敌人花费大量的錢并且把宝贵的船只和銅矿用在扫雷和消磁上。用封锁港口和迫使敌人消耗資源的办法所附带地給敌人造成的麻烦,也許与实际沉沒敌人船只有同样大的价值。”(以上引自弗兰西斯·比脫所著“磁石,一个物理学家的教育”一书的第122頁。該书由紐約花园城达布耳德公司于1959年出版。)

② 这是通常被提到的美国現在正在发展中的空中发射彈道導彈的航程目标。1959年7月20日出版的“導彈与火箭”杂志第147頁标题为“未来的空軍導彈”的文章便是一个例子。某方面还作了这样的預言:美国把装载有空中发射彈道導彈的噴气轰炸机部署在苏联的周圍,这可能迫使苏联把它的防空体系扩大到地球的两极地区和公海区域,这就会使苏联(人們会假定还有美国)牽連到“一些政治問題”中去。参考克羅德·威次所著“装载有空中发射彈道導彈的噴气轰炸机能够使美国的战略空軍难于对付嗎?”一文,該文刊載在1959年2月号的“空軍杂志”上。

量被襲击者报复性武器体系的尺度。可以預料，美国把它六十年代的报复力量加以疏散、隱藏、地下化和机动化的結果，将使苏联为了进行一次有效的首先发动的进攻，就必须把它的洲际彈道導彈数量从几百枚增加到成千上万枚。这样，我們的报复力量在安全程度和威力大小方面的每一次增强，就能迫使苏联必須数以倍計地增加它的进攻武器，如果它希望进攻我們而不遭受显然是不可忍受的报复性破坏的話。

在侵略者所必須具备的軍事力量与他的可能受害者所必須具备的軍事力量之間，还另有一个对比，也有利于美国在核導彈时期后一阶段中取得足够的报复力量。理智地首先发动进攻当然要把对方的报复力量作为首要的进攻目标，但防御者报复的目标却可以限于侵略者的居民与工业，虽然这种战略目标的威胁在侵略者看来，可能显得不可信賴，因而它的威懾效果会减少。<sup>①</sup>換言之，在侵略者能于理智地发动一次突然襲击之前，他至少必須有能力把对方的战略力量減縮到极低的水平，而可能的受害者，却只須有能力使侵略者境內的居民密集地区遭受不可忍受的損失，就可以威懾侵略者不敢发动进攻，侵略者境內的居民密集地区，远远比防御者自己的战略报复力量要更容易受到核武器的进攻，也就是說，威懾者要想有效地疏散、地下化和

---

① 參看本书第五篇第二节。

甚至隱藏他的进行报复的武器体系，比起侵略者要疏散、掩护、隱藏他的城市和工业来，是容易得多的事<sup>①</sup>。

在对比中还有一个有利于威懾者的因素：侵略者必須对自己的能力有非常高度的信心，相信能消灭对方大部分的战略力量；而他的可能的受害者，为了使敌人不敢发动进攻，却只須使事情显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可：发动进攻将得不到必要程度的成功。即使发动进攻者估計对对方战略力量进行攻击的效果可高达90%，他仍然面对这样一些不能确定的因素：如进攻的配合工作有差錯，敌人方面有未被預先知道的防御战术和武器，以及过时的或錯誤的有关敌方目标的情

---

① 一种“有限的”或“最低限度的”威懾战略，即把威胁和破坏能力限于一百到二百个苏联居民点，这种战略主張曾由海軍的几个发言人所提出，其中巴克斯海軍中校（見前）也許是最一貫作此主張的人。批評这种主張的人，強調难于确定在苏联方面看来怎样才可以构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威懾力量”；他們也強調在一次报复性攻击中，把还击目标限于苏联城市，将起不了軍事作用。这一爭論着重地表明了阻遏战争发生的战略与进行一次战争的战略这二者之間的差異。对有限威懾战略的带批評性的意見，可參考湯姆斯·鮑威尔將軍在国会中的証辞（見1959年2月13日国会証辞記錄第2部分第374—382頁关于1960財政年度国防預算的証辞）以及約瑟夫·阿尔索普写的題为“一种大不相同的廢話”的文章（該文刊載在1959年3月1日的“華盛頓郵报与时代先驅报”上）。关于这一爭論的背景及其与海、空軍武器体系的关系，汉森·鮑德溫在他写的“五角大樓的問題——（一）”一文中曾加以研究（該文刊載在1959年5月4日的“紐約时报”上）。

报等等。因此，对首先发动进攻能否取得高度成功这一点所产生的任何有根据的怀疑，加上侵略者境内的目标远比报复者境内的目标更容易受到攻击，这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使得以发动全面核子大战作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这一种想法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期的六十年代中期的战略武器能使战略平衡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由于双方的战略力量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对对方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将越来越成为冒险的事，如果不是愚蠢的话，而目前引诱着人去首先发动进攻的一些因素也将大部分消失。在这样一种武器条件下，苏联在军事情报和战略主动方面的有利条件目前所具有的重要性，大部分将不复存在，而目前存在着的发生全面核子大战的危险性也将大大地减少。必须在这里再着重地指出，出现这种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将是由于各种因素发生作用，减少了使用核武器发动进攻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减少了它的可能性，而将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发明，使得投掷核武器成为不可能。不能把这种有条件的稳定状态同实际的免受原子进攻等同起来；两个互相敌对的大国，各自拥有数以百计的相对安全但具有高度破坏力的武器（它们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发射出去），这样一种前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窘境中看来，可能显得吸引人，但很难说是一个令人得到安慰的前景。



而且，甚至这种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也将不是輕易可以取得的。不仅因为发展战略武器的机动性和使其得到相对的保护必須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障碍，而且，每一种輔助性的和牵制敌方力量的战略武器都需要很高的造价，因而很难采购足够多的这一类武器来影响敌人的战略力量。甚至这种現在看来可在核导彈时期后一阶段取得的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如果考虑到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事实，也可能証明是极为短促的暂时現象，因为一些目前无法預知的武器可能再一次地改变战略能力和軍事力量的对比。

現在看来，不一定会再出現像原子彈和氢彈那样产生巨大影响的新武器，但并非不可能出現。如果苏联或美国竟发展出一种导彈，其准确与可靠性几乎达到百发百中的程度，那么，制成这种导彈的国家，就能具有这样的能力：即使对方的报复力量受到高度保护，仍能用首先发动进攻的办法，摧毁它的还击力量。因此，我們不应当把軍备竞赛的任何一个阶段看作終点，而宁可把它看作一个中間站。下面一章将对某些可能出現的更先进的技术发展，根据上述看法并且通过这些技术发展在軍事与政治上可能引起的問題，加以評价。

#### 第四章 新武器时代的前景

关于将来可能出現比初期洲际导彈更为优越的武

器的可能性，战略家們必須經過推測，才能作出判断。甚至人們对現在的空間武器体系<sup>①</sup>的評價都有激烈的爭論，要估計它的将来当然是会有困难的。

本章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关于武器时代这一概念，并将用它來說明权威方面預言将在今后十年內出現的武器。重点是談核導彈的发展和毒气武器的战略意义，以及使用卫星和人所操纵的空間工具这两种体系的可能性。对于所有重要武器方面的发展趋势，或空間利用的各项問題与可能性問題，由于其它方面已作詳尽論述<sup>②</sup>，这里不打算进行綜合研究。

### （一）武器时代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武器性能方面的戏剧性的进展，說明了我們的武器时代这一概念，因为技术进步的加速率已使武器几乎以同等速度很快地变为陈

---

① 这种专业刊物最近就空軍設計的“迪納滑翔”火箭滑翔机发表評論說：“也許，自从有萊特式双翼飞机以来，在軍事設計图上沒有任何空中武器像‘迪納滑翔’这样，人們对其最适宜的使用方式、其攻击和偵察潜力以及其各种限制等了解得那样少和意見不一致。”見 J.S. 小布魯茲所写的“超音速器械将而临技术費用問題”，載“航空周刊”，1959年6月22日，第19頁。

② 要对重要武器方面的发展趋向作簡要的全而了解，可參看全国設計协会題为“沒有軍备監督的1970年”的報告（載設計論文集，1958年5月，第104期）。兰德公司的報告：“空間指南：星际航行学及其应用”，这个報告也許是說明空間利用的主要問題与可能性的唯一最好的報告。

旧，使两大国的每一方不断有机会在武器竞赛中取得重要的即使是暂时的领先地位。

必然的结果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把地球缩小了，使两个对手——实际上也使任何能求取、购买、制造或借用新的战略武器的国家——拥有几乎相等的有效的带威胁性的军事力量。

现在就 1945 年对日本本岛使用的 B-29 型战略轰炸机同美国在今年 9 月 1 日宣布试用的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来作相应的比较。这种轰炸机能载重十吨，其中实际爆炸物不超过三分之一，时速三百英里，作战半径不超过二千英里。与此相比，据说第一次使用的阿特拉斯导弹至少能发射爆炸力为一百万吨级的爆炸物（TNT 炸药当量），时速达一万五千英里，射程为五千至六千英里。导弹在发展的现阶段，在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还有缺点，在和轰炸机比较来说，这点是导弹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事实仍然存在。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导弹比轰炸机的破坏力几乎提高一百万倍，发射速度提高五十倍，射程扩大三倍。此外，如前章所述，洲际弹道导弹已使这种轰炸机在其本土基地上成为极易遭受攻击的目标。

由于崭新的武器体系的发展所取得的这种进步，就有可能使后来者居上，否则他是不会有这种机会的。例如，军备竞赛如仍停留在原有的阶段，在战略飞机的制造和使用经验方面，苏联能否赶上和超过美国而领

先是极可怀疑的。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下面情况下，一个新的武器时代就算已经到来：（甲）新的技术发展使现有战略攻击体系成为过时，因此就给每个大国提供了在新的起点上从事军备竞赛的机会；或是（乙）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作为军事力量基础的一些有利条件的重要性，因而由较早武器时代所造成的战略均势也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由“常规武器”时代通过核时代向核导弹时代的过渡可以用这些武器的以下特性的进展情况来衡量：（1）破坏力；（2）射程；（3）发射速度；（4）起重要的但系配合作用的准确性。“机动性”也是常提到的一种特性，但是还有影响着今天复杂的战略武器体系的军事功用的其他特性，其中包括费用（发展试制、使用、支持）一项，它决定着可以采购和部署的武器的数量，以及牺牲其他武器体系到什么程度。同样重要的是关于人员的要求，所需人员的数目、条件以及为使用这种武器体系所需要全部训练时间。

除去导弹装置的控制和通讯方面的需要，以及为了有效地使用所必需的关于目标情报以外，维修和供应方面的需求（后勤方面）也可能是重要的。

这里所说的新的武器时代的到来，可能是在这些方面取得极大进展的结果，以及在破坏力、射程和速度等三个关键方面取得进展的结果。十六世纪英国军队为时已迟地采用火器提供了一个先例，因为当时的

火器使用起来并不比长弓优越（长弓有和火器同样的射程，而且要准确得多并且可以迅速发射）。火器很大的好处是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学会使用它，而不像掌握一个弓箭手的技术需要多年训练。

还可以联想一下，早期飞机在密切支援部队方面胜过大炮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它的速度、航程或火力，而在于它的机动性以及它能把武器和使武器发挥最大效用所需要的情报作用结合起来。（现在的飞机速度的大大提高使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逐渐缩小，即使它们是在受地面指挥。）

显然，正如有效使用战略攻击体系需要通讯设备一样，由于弹道导弹的出现，战略攻击体系对情报的需要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现在可以根据影响战略攻击体系这些特性的技术进步情况来探讨新的武器时代的前途。

## （二）作为现有武器体系产物的 新武器时代的前景

人们必须首先估计由于现有的战略攻击体系的速度、射程和破坏力的扩大而产生的新的武器时代的前景。

正如具有同样威力而体积和重量要小得多的核武器<sup>①</sup>有可能被制造出来一样，较现有的破坏力大得多的核武器也是肯定会出现的。载核炸弹的爆炸力比方

說增加兩三倍，即達到四千萬噸或六千萬噸的可能性已被提到過，由於動力設備的重大改進，運輸具有一億噸爆炸力的炸彈據宣布也是可能做到的<sup>②</sup>。雖然有人會對在軍事上使用這種超級炸彈提出過質詢，理由是只要現有的一顆炸彈就能夠“毀滅”整個城市，但它們的价值無疑在於能有效地對付設在地下的軍事目標，少數炸彈就可以使敵國遭受巨大破壞<sup>③</sup>，後一個優點對於想要阻止攻擊的一方具有明顯的重要性。

對於核武器技術其他方面的進展，也作了預測。其中包括：產生較少放射殘余的“更干净的”彈頭、將現有的武器“裝填”以放射性密度更大的物質以及為了軍事效果換用依靠放射性而不是依靠爆炸和熱力的“小”彈頭<sup>④</sup>。後面一項主要是與戰術有關而不是在戰略上的應用。

---

① 國防部研究與工程處副處長說，現在似乎有可能來發展一個人可以攜帶的、象手提皮箱那樣大的原子彈。見霍華德·威爾考克斯所寫的“武器、科學與文明”一文，載1959年8月“星際航行”雜誌，第81頁。

② 見羅福·拉普所寫的“放射性微塵與國防”一文，載1959年5月“原子科學家公報”，第188頁。

③ 參考全國設計協會題為“沒有軍備監督的1970年”報告中關於這種潛在力量的討論。載設計論文集，104期（1958年5月）第15—16頁。

④ 參考愛德華·加馬里坎所寫的“新原子彈，非常準確的、致命的武器”一文，載1959年7月19日“華盛頓郵報和時代先驅報”，第1版。

总的說来，还难以看出这些预测的发展的任何一种对战略力量对比已发生充分的影响，从而說明已进入一个新的武器时代。

具有更大可能性与重要性的核发展（通过降低造价增产核武器）同样不足以說明新的武器时代已經到来。这种发展是由于增加反应堆来发电而可能产生的結果；用这种方法来生产鈾是比較緩慢的，但是如果增殖反应堆証明可用的話，鈾的生产将会加速<sup>①</sup>。

其他预测中的发展可能大大减少核武器在經濟和物质方面的消耗。其中之一将是达到对热核反应的控制，这是三个核子国現在都正在集中力量研究的。这种方法将会提供大量的“廉价的中子”，并减少核物质的生产費用。用于武器方面，也可能找到一种方法，不需要經過为提供必要热量的分裂阶段而发生熔解反应。这种发展可能使氢彈造价便宜，即使原子彈不是这样。

这些成就将会促进小規模战争的核子化、以核武器武装盟国以及扩大核力量的范围，但是它們的影响似乎不可能使美苏力量的对比在今后十年內发生重大的不平衡。如果敌对的一方不是全国“轉入地下”，比現在毁灭性更大的武器的出現可能具有較大价值，虽然它們在和費用不大但准确性較差的導彈体系配合用

<sup>①</sup> 見維拉德·利比所写的“核子能——一些新的方面”一文，載1959年6月“原子科学家公报”，第241頁。

来对付特别坚固的地下导弹发射或潜水艇的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有用的。有了更多的核武器可能会促使广泛地使用反导弹体系，但是现在这种防空形式所以受到限制并不是由于费用大或分裂物质的稀少。

至于武器的射程，现在似乎有可能将飞机的航程和导弹的射程扩大到全球范围。姑且不管这些话的真实性如何，有人引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苏联的火箭可以射中八千七百英里以外的目标。我国空军参谋长也谈到除了改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外的第三种弹道导弹体系的前景，他把这种导弹叫做全球射程弹道导弹，“它有一万海里以上的射程——从地球上任何基地发射都可以达到任何目标”<sup>①</sup>。

这种极远射程的武器的优点在于它能使预报对方进攻的雷达体系（如美国正在北方建造的导弹预报站雷达线）失去效用，并可以使导弹发射地点分散于全球。靠导弹基地的分散来进行防御似乎对美国更为有利，虽然更便宜地使用以海上和空中为基地的导弹“发射场”<sup>②</sup>，也可达到同样目的。

现在正在继续大力提高有人驾驶的飞机的速度，

- 
- ① 见汤姆斯·鲍威尔将军所写“战略空军司令部与弹道导弹”一文，载“航空大学评论季刊”，1957—58冬季，9卷4期第10页。
- ② 国防部长负责导弹的特别助理威廉·霍拉迪1959年6月在国会说，现正考虑在美国控制的岛屿设置导弹发射场。霍拉迪说，使美国本土成为目标“不是我们最想做的事”。随后空军部透露了在冲绳岛建立导弹基地的计划（基地类型未宣布）。



近来使用的截击机的时速超过一千英里，目前正在设计的飞机，预计巡航时速可达二千英里以上。<sup>①</sup>这可以拿有争论的美国 F—108 战斗机和 B—70 轰炸机的设计为例。据认为，有必要努力使有人驾驶的飞机继续担负导弹直到现在——也可能在长时期内——还不能很好地担负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情报的获得和侦察、远距离空中目标的识别以及要求投弹具有高度准确性的空袭任务。

除了前面谈到的扩大射程以外，洲际弹道导弹本身可以预见的改进具有更大的意义。正如赫伯特·约克<sup>②</sup>博士和其他人士所强调的，远程导弹仍然是实用技术的一个新的比较起来尚未开发的领域，这或许可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技术的情况相比拟，所以在这方面可望有较大的进展。其中包括采取各种办法使洲际弹道导弹造价更便宜、更准确可靠、缩短反应时间、适宜于在机动的发射地点使用，以及在必要时，使它们在飞行中更不容易受到侦察和截击。

在必要时保持洲际弹道导弹突破力的方法，可以设想到的有：用辅助发动机或可分离的弹翼(drag

---

① 军事技术进步的迅速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直到 1947 年，有人驾驶的飞机才在平飞时超过音速，但是到 1953 年已达到两倍于音速的速度，三年以后又达到三倍于音速的速度。

② 见国防研究与工程处处长约克博士访问记，载 1959 年 9 月 7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 76—79 页。

skirts)在飞行时改变彈道，在彈头上加上放射装置和反雷达防护屏，采用多彈头，以及使用導彈上的产生迷惑、誘騙和干扰作用的装置来扰乱防御雷达<sup>①</sup>。

逐渐提高战略導彈彈头的威力是可以预期的。这种改进以及導彈准确性必然提高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們对于为摧毁敌人地下的導彈发射場所需導彈的数量的影响，因为对防御者的报复火箭能否实行導彈突襲，要取决于導彈的命中率。前面引用的估計数字<sup>②</sup>表明，由于一个二百万吨級爆炸力的導彈的准确性有所提高，誤差由三英里减少到二英里以下，可能摧毁这样的目标所需導彈数目可以由六十个减少到十四个。美国地下的導彈发射場的威懾作用可以說是同苏联在導彈性能的这些方面的进展成反比。在这一方面，苏联導彈发动机的体积和力量都比美国的具有明显的优越条件，因而可以发射更重的导向器械或摧毁力更大的彈头，这一事实是使人感到不安的<sup>③</sup>。

如前所提到的，六十年代初期固体燃料洲际彈道導彈的发展，如預計在1963—64年制成的美国民兵式

① 关于这些改进以及設計制造反導彈導彈防御体系的困难，曾在高級研究計劃局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作了非常詳細的討論。見众議院1960財政年度國防預算意見听取会記錄第6部分(1959年4月15日)第93—99頁。

② 見前引墨菲著作，第248頁。

③ 約克博士承认苏联在導彈推力方面明显地領先，但他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洲际彈道導彈的控制、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領先。

導彈，將會大大減少這類武器的反應時間，並且由於體積的縮小，就便於設在地下和更加機動。據說這種導彈將經常處於準備發射的狀態，其操縱羅盤在不斷地轉動，因而能夠在一兩分鐘以內發射出去<sup>①</sup>。目前液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的準備時間為十五分鐘。

據一專門性刊物的評論說，我國空軍關於第三代洲際彈道導彈的概念是，需要極端準確的導向能力來擔負反擊任務、用於防禦的導彈的能力、減少重量和體積以利於設在地下或機動<sup>②</sup>。另一種辦法，如果有效的反導彈裝置可行的話，就是發展以核噴氣推動機而不是以火箭作動力的低空、超音速的巡航導彈。這種導彈可以從雷達防禦網下面鑽進去，這是現在飛機所採用的一種戰術。

如果認為在一個武器時代內的這些進展對於戰略均勢不會發生決定性的影響，那將是錯誤的。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國家在改進某種武器方面取得並保持領先地位，從而在適當情況下它將握有影響均勢的重大有利條件。美國戰後在戰略轟炸機方面的發展或可作為例證。

---

① 見眾議院 1960 財政年度國防預算意見听取會記錄第 5 部分 (1959 年 4 月 9 日) 第 380 頁，伯納德·施里佛少將的証詞。空軍彈道導彈師師長施里佛將軍曾說，發射此種導彈“實際上是瞬間的事”。

② 詹姆斯·巴爾所寫“空軍要求在空間方面追加數十億美元”一文，載 1959 年 8 月 17 日出版的“導彈與火箭”第 19 頁。

但是由于上述核導彈武器時代具有特殊的、也許是史無前例的性質，在今後十年內似乎不大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假定東西方兩邊在軍事技術方面的研究和生產能力大致相等的話。因為我們可以看出，前面預測的導彈技術的改進主要是加強那些現在已經感覺到的戰略效果，而不是作根本性的改變。這是由於導彈的反應時間快，能夠保持高度戒備狀態；以及為對付這樣小型的、具有無限射程和極高速度的武器，在提供警報能力方面都存在着嚴重的困難，更說不上加以防禦了。的確，導彈準確性的提高對潛在的侵略者有利，減少導彈體積和改進導彈的必要支持設備，則對防禦者有利（使其能夠更好地加強報復力量的隱蔽和機動性），而增加彈頭的威力可以說對雙方都有利，但是所預測的在這些方面的進展，其重要性或影響似乎不足以促使新的武器時代在本章所談的時期內出現。很可能是一方（突然襲擊中的受害者）不斷喪失積極防禦能力，而侵略的一方則因對發動進攻舉棋不定，使其日益陷於不利地位，因而雙方都趨向於維持一個有限度的戰略穩定局面。

現在我們來考察空軍正在研究發展的另外兩種武器體系，即坎馬爾(Camal)和迪納滑翔(Dynasoar)。前者是一種在空中不斷進行巡邏的機載導彈警戒體系，打算採用核動力的飛機在俄國早期警報網外圍進行不斷的巡邏；這種飛機將能先以彈道導彈進行攻擊，然後

載運核彈以低空高速穿過蘇聯的防禦網到達設在地下的目標<sup>①</sup>。迪納滑翔（意即強力滑翔）據說是一種無動力的滑翔機，用火箭發動機把它推到接近衛星的速度和高度後，再繞着地球大氣層的邊緣滑翔或低飛。關於這種器械的適當用途，意見頗不一致，因為除了用來研究如何使可操縱的空間武器趨於完善而外，用以進行偵察和攻擊兩種用途也被提到過。<sup>②</sup>

這兩種想法似乎都是為了使有人駕駛的飛機比現有戰略轟炸機更少受防空設備的損害，從而擴大其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效用。如果飛機使用核動力和在空中發射彈道導彈計劃能夠及時完成的話，坎馬爾就可以減少初期導彈差距的某些危險。這兩種體系在六十年代中期和以後都可以在軍事上使用——那時洲際彈道導彈將成為主導的戰略武器，坎馬爾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輔助報復體系（部分地受到遠程飛機的機動性掩護），而迪納滑翔則可能發展成為有價值的偵察體系。

人們可能對這兩種可能性表示懷疑；目前還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坎馬爾將比同等的導彈力量的造價低得多<sup>③</sup>，迪納滑翔似乎尚可与收集情報用的偵察衛星相競爭，但現在的問題是，即使這兩種體系都完滿地實

① 見道納德·凱恩少將所寫“原子能用於飛機上”，載“兵器學”雜誌，1959年1—2月號，第568—570頁。

② 見前引小布魯茲著作。

現，似乎也不會對實力均勢有決定性的影響。

最好記住，這些先進的戰略性體系決不能說是“最後的武器”。譬如說，現在和不久的將來的洲際彈道導彈要受到各種限制，如造價高，彈道是固定的，要求預先得到有關目標的資料，以及不能攻擊活動目標，不能對襲擊後的目标進行偵察或者不能有把握地把它從飛行中召回<sup>④</sup>。而且，要把象燈塔那樣大的武器拋到數百哩的高空再去攻擊地面的目標，這也顯然是浪費燃料

③ 赫伯特·約克博士作証說，要在航空上使用核子動力，“非百億或數百億美元不能實現。如果這樣作的話，花費將是很大的”。眾議院第八十六屆國會第一次會議，撥款委員會小組委員會關於1960年軍事建設撥款問題意見听取會，“空軍全面報告”，1959年6月6日，第769頁。

④ 目前不能把發射出去的導彈召回是一種具有極大重要性的限制。這就是說，導彈和飛機不同，它不能根據局部的或許是錯誤的預報敵人攻擊的雷達警報進行防禦性的發射，因此對導彈必須充分地地下化或機動以便“經得住”襲擊。戰略空軍司令部曾作証說，他的總部僅在去年就曾經收到幾次錯誤的雷達攻擊警報，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知道我們怎樣能夠單靠雷達偵察來發射它們（導彈）。這就是為什麼導彈發射場應該設在地下以及為什麼導彈必須補充以有人駕駛的轟炸機，因為飛機能夠從地上起飛而保證不被毀滅”。見眾議院1960財政年度國防預算意見听取會記錄第2部分，1959年2月13日，托馬斯·德威爾將軍的証詞，第377—379頁。（注：利用核融合的裝置使核彈頭“不爆炸”，或摧毀空中飛行的導彈，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敵人的雷達反射屏可能在它們被破壞以前反映出飛來的導彈，因而這種裝置本身就提出了明顯的可靠性問題。）

和力量。这些限制可以用现在讨论的改进洲际弹道导弹或其它办法来加以克服，但是它们的存在就说明了不能信赖单一武器的战略，也不能认为，有了热核武装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后，人类就已经攀登毁灭力的顶峰了。

下一节将研究由于防御体系的改进而能促使新的武器时代出现的前景。

### (三) 从防御的发展展望新武器时代

如果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新武器时代看来不可能是由于攻击武器在射程、速度和破坏力等方面的不断进步演变而来，那末这一时代的出现自然就可能是取得与此发展方向相反的技术成就的结果。例如，最先拥有对抗飞机和导弹攻击的高度有效防御的一方，就有能力威胁或发动战争而不怕遭到大规模报复。假如双方差不多在同时取得这样的防御，战争或战争的威胁就可能降为上面谈过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时代的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战略性战争中攻击胜于防御这一普遍的误解已使我们踌躇不前。不管空权论者多么热情，空防方面的缺陷并不是由于飞机性能的巨大进步所造成的。相反，防御上已在对付飞机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防御的一方很少能命中 10% 来犯的轰炸机群，而不列颠空战的

胜利对敌机的命中率比 10% 还少。与此相比，在战后初期当双方的轰炸机和截击机改为喷气式之后，据官方估计，对来袭敌机的可能的命中率是三分之一左右。更近一些，由于空防队伍中增添了地对空和空对空导弹，对敌机的命中率估计高达 50% 左右。同时空中载运工具的航程已有巨大进展，这就扩大了战略性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美苏双方成为战略空军中的直接交锋者。能载重的轰炸机现在能够载运具有巨大毁灭力的武器，这就使攻击处于重要地位，而使防御几乎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

热核武器已使意大利人格利·杜黑在将近半世纪前所提出的战略空军战争理论成为可以相信的了。陆军准将杜黑坚决地、即使是过早地主张：仅仅战略空军的进攻就可以决定大国之间战争的结果，空中轰炸的毁灭力将诱使人们首先攻击敌方的空军，同时不应把用于进攻能力的资源转用于空防。由于核弹头导弹的出现，而迄今尚无防御办法（将来是否会有真正有效的防御尚难逆料），进攻用的投掷工具在战略空军战争中的地位终于跑到了防御的前头。

至少在理论上，防御的根本改善将可抵消武器毁灭力的极大增长和战略战争地理范围的扩大。这样将会完全改变目前军事上使地球距离缩小和战争时间缩短的趋势，以及改变要作更大的努力来提高军事毁灭力和恢复美国远离欧亚大陆有利地位的趋势。举例来



說，达到这一防御目的的武器可能是重型的、复杂的，因而只能在地面使用的机器放射出来的一种光能，它将可能击退、抵消或炸毁来犯的飞机和导弹弹头。这种光能应该能够穿透战略投掷工具上的任何防护体，并在敌人的弹头爆炸以摧毁它既定的目标之前，能够加以截击。和这一概念相适应的是，这种光能不可能用于洲际范围，因为如果可能的话，那它就变成战略进攻的新武器了。

上述例子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是一种空想。因为目前似乎还不可能创造一种抗重力的屏幕或一种防御体系，它能百分之百有效地对抗任何种类能将核武器投至巨大目标的工具<sup>①</sup>。然而，断定说更高的技术水平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来，是危险的<sup>②</sup>。但是，防御上的改进要是不能达到这样规模，则防御将遇到两个严重的不利条件，使它未必能够改变武器发展的方向。

防御上第一个巨大的不利条件是进攻方面享有技术发展的主动性。而防御不存在的也不能预料的武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拥有无法防御的进攻武器却是理

① 见前引威尔科克思著作第81—82页。作者还说(对比地)现在人类已有的放射性工具“可杀死地球上比昆虫和植物更高一级的每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第25页)

② 一种由热能的强烈辐射发出来的反导弹光能，被称为是目前研究光子导弹发动机的一种可能的副产品。见尤金·桑格所著“光子火箭和光能武器”，载于1959年9月10日“新科学家”杂志第6卷第147期，第383—384页。

想的。因此，发明创造的努力指向尚无法防御的进攻武器，而那些从事防御装备的人通常要等到他们知道所必须防御的是什么以后才进行发明、创造。由于这个原因，在武器体系的任何迅速进展中，防御武器一般是落后于进攻武器的。

防御上第二个不利条件是，进攻往往处于战术上的主动地位。这是因为侵略者能够选择进攻的地点、方法和时间，选择要集中攻击的目标和发动攻击的路线。要克服这一战术上的不利条件，防御方面必须充分利用它更为固定地驻扎在地面上这一事实。这样，防御武器就可以集中在防御者最重要的设施的周围，就可以利用比具有灵活性和战术上有利条件的进攻体系更为猛烈、更为准确和更为精巧的防御体系。

一个防御体系要稍微降低一点进攻的效力并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要使进攻的效力降低得越多，防御费也就越大。而且很快就要达到这样一点：防御效力提高到一固定比例，其代价比进攻效力提高到足以战胜加强了防御的费用还大。用熟知的经济术语来说，依实际费用计算，追加进攻努力的边际效用超过加强防御的边际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军事人员现在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好的进攻<sup>①</sup>的一个理由，虽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

这些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不适用于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进攻武器是一个人加一支步枪，防

御武器是一个人加一挺机枪的情况。不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德国的几次空战，当时进攻的武器是一架螺旋桨轰炸机，而防御武器是一架喷气式或火箭动力截击机。这些观点还可能不适用于进攻是使用喷气式飞机而防御是使用极复杂的弹道导弹的情况。在上述情况下，随着一个武器时代而来的总是另一个与之对抗的并且是更先进的防御武器时代。前述光能的假设也许又是一个例子。

因此，由于防御武器先进入下一个武器时代或先取得显著技术进步而超过进攻武器，进攻方面战术上主动的有利条件通常都能够被用来使防御的领先地位保持在最低限度，军事技术家则利用他们的首创能力去解决问题或克服困难。可以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螺旋桨轰炸机在对抗喷气式截击机时是能够坚持抵抗的，如果螺旋桨轰炸机单方面拥有空对空火箭的话。（事实上，轰炸机在对抗新式的德国截击机比较弱的威胁时，能用密集的队形和新战术继续作战，虽然损失会更大。）

正因为这些原因，很难相信由于防御体系的发展

- ① 这句格言特别适用于防御核武器（假如攻击能够并且是对准敌人的武器及其投掷工具），因为单个的核炸弹和榴弹的巨大的毁灭潜力就需要现役的防御体系具有实际上做不到的高效力，关于这一问题战术方面的讨论，见陆军上校马塔克西斯和陆军中校戈德堡合著“核子战术”第6章，1958年宾夕法尼亚州哈利斯堡军事出版公司出版。

而出現的新武器时代，真有可能在实际上取消或改变战略武器在毁灭力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及投掷工具在速度和射程方面取得的进步。“奈克—宙斯”反导彈导彈体系——已知的美国正在发展的唯一积极的导彈防御体系，就肯定不能提供这样的可能。它的作用最多不过是能就地防御相当原始的导彈对极少数的重要目标的攻击而已<sup>①</sup>。

然而，我們能够并且必須作极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防御体系对抗实际的或是可能的进攻威胁。当一方首先建立了具有高度效能的飞机和导彈的防御时，对方就会遭受重大的損失。防御划时代的发展往往有可能給进攻带来暂时的挫折，但我們將有必要从别的方面来探求构成新武器时代的能力和潜力的結合。

#### (四)从化学、生物、放射性战争展望新武器时代<sup>②</sup>

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軍事效用問題，近来

<sup>①</sup> “奈克—宙斯”，这一陆軍正在发展的导彈防御体系属于地对空导彈“奈克”体系，其发展同样是依据积极的終极防御这一普遍的概念。許多这一行的人对这一种“常规的”体系对抗一大群来犯的彈头的效力表示怀疑，这群彈头是以每分钟二百五十英里的速度抵达它們的目标，同时这些彈头配有能預見的装置，可以扰乱和瓦解防御雷达。見1959年4月15日在国会意見听取会上討論1960財政年度国防預算报告(第6部分，第94—97頁)中高級研究計劃局对“奈克—宙斯”提出的评价。参考埃里克·伯吉斯所著“反导彈导彈——神話？”，載于1959年“国际航空評論”第14卷第2期，第170—172頁。

已有很多論述，但真正触及实质的还很少。許多官方的和官方授意的論述都对这些武器的潜在效力作了最一般性的叙述，但对于它們实际运用于战争的方法和可能的結果却輕輕帶过。

这种作法不能仅仅归因于軍事保密的需要，或者归因于各方面对化学、生物、放射性战争作道义上譴責的气氛，而是大部分要归因于这些武器在理論上或实验上是可使人致命的，而实际运用到战场上却有局限性这两者之間的矛盾。

在生物战争方面（有意地利用微生物或它們的有毒的产物来攻击人、动物和农作物），在利用和加剧天然病菌的毒性上已明显地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記載的各种各样军事用途的毒菌已达四十五种之多。但是，生物战争由于本身性质的原因，受到傳染病潜伏期的限制，因此必須把它看作主要是用以攻击非軍事目标的战略武器<sup>③</sup>。使用时，生物战細菌的散播和效能有賴于目标地区的气象条件。例如，明朗的日光会使微生物迅速死亡<sup>④</sup>。然而，据估計，对敌人城市进行一次

---

② 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战争，有时称之为 ABC 战争或毒气战争。关于近代化学、生物、放射性的概況，参看 1959 年 8 月 10 日美国第八十六届国会第一次會議众議院科学和星际航行委员会的报告“化学、生物、放射性的研究”。

③ 見 1958 年 9—12 月“武装部队化学杂志”第 4 頁柴多伊·法沙吉尔医学博士所著的“生物战争及其防御”。

④ 同上第 5 頁。

生物战的突击，“可以即时引起相当于一个小型原子彈造成的伤亡人数”<sup>①</sup>。

常有人提醒說，破坏者会在核攻击前使用生物战争武器。正如进行任何广泛的攻击前破坏一样，发动这样的一个生物战争的更为明显的障碍是：只要获得敌人施放的一种毒菌，敌人就可能因“露出馬脚”而遭到核报复。

各种各样化学毒物方面的发展已經取得巨大进展，而且大有前途；其效果各有不同，有的几乎可以致人于死地，有的則使人的精神或肉体暂时失去机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神經性毒气經過改进后，現在据說不需要一分钟就可毒死人，并且很难防御。

新近发明的使人丧失机能的药物，有时叫作心理化学药物或使人发生錯觉的药物，看来有希望可以当作对局部地区取得軍事控制的工具，而不会有使用常规的或核爆炸物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大規模毁灭。然而，它們的发展程度在报刊上已被大大地夸大了，即使是最乐观的軍事方面也說至少要在三年到五年以后，它們才能实际上加以使用，而且必須說明，由于化学武器的特性，包括对气候的敏感，往往使其限于战术上和战场上使用。

---

① 1959年8月30日科学家討論生物和化学战争的普格华希国际會議的声明第3頁。

生物和化学武器在军事上的应用还受到目前不完善的投掷技术的限制。在报刊上和化学兵团的刊物中谈论的投掷方法，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用但搁而未用的方法——如播毒器、飞机炸弹和喷射器、野战发射器、地雷、炮弹和火箭等。关于苏联技术的公开材料以及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所写的更富有想像力的著作，都同样是空洞的①。

武器发展及其投掷工具发展之间的一种类似上述的落后情况限制了常规的和核爆炸物在军事上的使用，这是事实。这一差距在这些领域内已被大大地克服，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在化学、生物、放射性战争方面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进展。一种能够将心理化学药物迅速泛滥于广大地区的工具的出现，对于战略、特别是对于美国人认为化学、生物、放射性武器是“不人道”的态度会有重大影响，同时还可能对我們不愿首先发动攻击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目前甚至连想像这样一种工具都是困难的；它在现有的有关化学、生物、放射性武器的文献基础上要完成这一设计，看来是十分不可能的。假如铁幕两边只是把这方面的发展，视为是防御对方可能制造的

---

① 例如可参看 1952 年 9—12 月第 9—12 期“中华医学杂志”关于“细菌战争”的特别增刊。这个特刊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对美国的指责，但有些附录论述细菌战争疾病传染的方法颇为详细。

毒物和投擲工具的話，那麼，在目前較低的水平上繼續發展是可能的。化學、生物、放射性武器不會出現像本報告中所說的“新武器時代”。而最好是把化學和生物武器看作是一種特殊的軍事工具，一種額外的民防的和軍事防禦的問題，和一種對尚未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在理論上是有用的武器。

### (五) 衛星武器時代的展望

在審查並否定了有重大改進的防禦體系以及化學和生物實驗室可以作為戰略上具有決定性的新武器時代的來源後，我們現在來談談（相當遲疑地）某種或許是可能性的東西。這種可能性是人造地球衛星在軍事上的應用。在今後十年內，人造地球衛星可望大量生產並且在質量上也可望達到非常複雜的程度。

有一個明顯的理由要求我們考慮，地球衛星是否可能改變軍事均勢。有人提出，目前的核導彈時代可能（在後一階段）形成一種有限度的戰略穩定局面，那時敵對雙方的戰略武器主要是由不太容易遭受攻擊的導彈體系所組成。但讓我們暫且假定美國大部分報復性導彈裝置已為蘇聯知道，而我們知道蘇聯的僅是少數。讓我們再假定預期的機動的導彈體系，如裝於潛水艇上的“北極星”導彈和裝於火車上的“民兵式”導彈，終將由於敵人有辦法從我們自由社會取得大量有價值的軍事情報<sup>①</sup>而變得比現在所設想的更容易遭受



敌人攻击。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将很难发展一支比较安全的战略部队。但是，一个真正有效的监视和通讯卫星网或可抵消苏联在这方面的情报优势，其影响之深远使人相信卫星会带来一个新武器时代。

看来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实现的希望并不大。苏联由第一手实地观察和阅读我们的刊物取得情报，与在苏联上空一百英里或一百英里以上用电、光和红外线侦察体系取得情报（加上在它周围的收听站取得的其他情报）之间，是有相当差别的。

战时空中侦察曾有过卓越的成就，但空间侦察技术上的障碍似乎很多，并且限制重重。其中包括这样的问题，如云层的穿透、伪装和阴暗，以及从影像之拍摄、制成片子、转移到一个贮藏装置中，通过电波转播到地面、复制检查等等一连串细致的工作而产生的技术上的困难和时间上的拖延。

一篇关于卫星侦察潜能的最乐观的文章相信卫星侦察体系能够从一百五十英里的高空对七十五到一百

---

① 在发动攻击前没有必要先精确测定这些武器的位置，因为装于火车上的武器不能像有效地设在地下那样可以抵挡爆炸压力，而水能把核子爆炸的震动波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假定和现在的飞机具有同样可被侦察出来的弱点，潜艇也可同样受到有效的破坏。参看1959年“国际航空评论”第14卷第3期陆军上将皮埃尔·盖洛瓦所著“全球战争中的机动性”。

英尺大小的物体进行光学的鉴定<sup>①</sup>。这就是说，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发现导弹的发射场所，找出所有主要机场的位置和显著的特征，有助于对通讯路线的追踪，和从海面的船迹发现大的行船。然而，同一篇文章指出，甚至具有鉴定五至十英尺物体的高空飞机摄影术，也很难证明一个伪装得很好的地下导弹基地。短程的和巡航导弹体系尤其难于证明，因为它们更易隐蔽。

甚至美国的一项粗制的侦察卫星体系的成就都可能诱使苏联作更大努力去隐蔽和伪装导弹体系和其他重要设施，否则它是没有必要这样作的。这对美国确实是一种额外的好处，但是，美国单在建立这一体系所用的款项大于苏联因此而付出的费用。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即美国是否能在1960年代初期及时地使用这种体系去侦察在这些基地上的更为明显的地面上

---

① 这种性能标准，据西方专家们提交给去冬在日内瓦举行的“突然袭击会议”的一个文件说，是在当前光学能力的范围之内。参看1959年6月5日联合国大会“为研究有助于预防突然袭击的可能措施及为准备向各国政府提出报告的专家会议的报告”，附件6，报告编号A/4078。

一个研究空中侦察的专家最近预言，1962年卫星可以拍摄小至七英尺大小的物体，而1965—70年，可以在三百英里的高空在晚间拍摄小至二英尺大小的物体。作这样预言的人是莱特航空发展站摄影侦察组主任科普佛，该站是在俄亥俄州的代顿。见约翰·芬尼在1959年10月2日“纽约时报”第8页“专家想像中的美国空间摄影机”一文的引文。

的建筑<sup>①</sup>。

有人提出以卫星担任其他获取情报的任务。主要一种是“迈达斯”体系，这一体系是借卫星装载紅外綫偵察器来偵察導彈的发射。这样一个設計，比之海軍計劃的“圓錐形帳篷”洲际雷达体系和其他偵察剛发射的導彈工具，其效用看来是有限的，但紅外綫体系比之雷达更不易受誘騙或通訊上的干扰，同时最起碼也应该可以提供一些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攻击警报的确实証据。但是，應該說，“迈达斯”体系或卫星所載的其他導彈偵察器似乎很少有希望能及时地使我們的战略轰炸机从即将受敌人的導彈攻击而遭損害的危險中挽救出来。

在今后十年內，卫星的任务可能包括增加远程通訊的便利(或对之加以有意的破坏)，地图測繪，空間摄影，航行和气象預报<sup>②</sup>。

由于美国需要取得关于苏联的情报，美国分散于全球的陆海空軍需要进行通訊联络，利用卫星担負上述任务对美国是比較有利的。然而，卫星运載工具的

---

① 美国为发展偵察卫星及其有关的装配的計劃現已获得每年一亿美元款項的支持，这說明了它的重要性。据估計，它的实际有效的运用是在1962—64年。

② 負有这些任务的卫星的潜在能力，在“空間手冊”一书及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最近預算說明中均有論述。參看1959年4月15日众議院意見听取会关于1960財政年度国防預算的討論第6部分第91—103頁。

維持和有效利用除了需要空間探察的特殊裝置、載人的空間飛行和對敵人衛星的偵察<sup>①</sup>以外，還需要維持廣泛而費錢的追蹤攝影和獲得情報資料的種種設備。

毫無疑問，這樣的衛星體系具有相當的軍事和科學價值；但是，在說明其潛在能力的公開材料中或從現時為發展這一體系所撥的款額來看，都無明顯跡象說明其戰略價值之大已足以被稱為“新武器時代”（如本報告中所用的這一名詞的意義）。人們常常提出，從衛星上進行轟炸，這事好象行得通，實則和現有的預期的從海陸空基地發射的導彈體系比較起來，困難更大，其價值也是有限的。無人駕駛的衛星轟炸機可能最後作為一個補充的威懾力量體系來使用，但是其中機械的質量必須具有幾乎是無比的可靠性。

這些意見必須立即予以以下列說法補充：在核導彈武器時代本身（更不用說空間運載工具的軍事潛能）的含義和可能性完全明確之前，最少還要十年，在十年之後將能更有把握地知道，預期的導彈體系能否足以

① 空間的初期探測已經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美國對海外設施的需要。美國現正利用空間追蹤攝影和設於各個地區（如阿拉斯加、阿根廷、澳大利亞、智利、厄瓜多爾、德國、夏威夷、伊朗、日本、尼日利亞、秘魯、南非和西班牙）的獲取情報資料的設施。在美國國內還有各種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設施，其中包括一道橫跨於加利福尼亞州到佐治亞州的電子“屏障”，它是用來偵察敵人“黑箱的”（無輻射的）衛星。我們認為，假如美國要從作戰用的衛星網取得充分利益的話，就必須大大擴充這些設施。

做到免除遭受攻击的危險，从而給战略平衡带来有限度的稳定。

但是，在設有其他可能性的时候，簡略地考查一下可能出现一个以卫星为基础的战略武器体系新时代的情况是有益的，虽然远程導彈本身仍然是占优势地位的武器。

这样的一种变化可能由以下两种途径而实现。第一，将卫星用作武器体系中的偵察和通訊工具必須大大提高这一体系的效力，从而使首先采用这一办法的一方会取得更大利益。第二，武器体系对卫星的依賴必須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在效用方面，卫星将取代導彈体系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卫星技术会得到优先的发展，而卫星本身很可能变为防御活动的主要目标。

武器体系日益依賴原屬該体系周圍的一些要素的現象已为我們所熟悉（例如，請試想，如果没有无綫电通訊，現代潛艇和坦克部隊的作用将会如何）。单就情报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人員就再三說，“小型的”或战术核武器要依靠“获得”攻击目标的情报才能发挥最适当的作用。卫星不但可能成为軍事武器体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还可能成为許多非軍事性活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世界電話通訊，世界电视，全球气象預报系統以及各种与許多国家有关的空間探索和利用計劃，都可能有賴于卫星体系来提高它們的效力。在此种情况下，卫星将会像今天的无綫电

通訊那樣為人所熟悉、所習慣。除這種總的假設外，我們現在僅作如下的推測：戰略武器體系將列入那種日趨依靠衛星的體系之內。

即使如此，除非已定的從一個武器時代過渡到另一武器時代的標準完全具備，採用衛星並不能產生新武器時代。要么是衛星的軍事重要性必須給各大國提供一個新的起點，而其中一國可能獲得顯著的軍事優勢，要么是衛星增加了與其有關的武器體系的能力，從而使戰略對比發生基本的變化。有人認為，如果核導彈體系中增加能偵察目標的衛星，就可能出現後一種情況。但是，如果在依靠衛星的情況出現之前，美蘇雙方的戰略進攻體系由於擴大和分散達到比較安全的地步，致使雙方情報力量的不對稱情況無關重要，那末，只有當衛星能使一方或雙方的上述安全大為降低時，才會通過衛星出現一個新的時代。

最可能（雖然不幸還不能肯定）的前途看來是：美蘇雙方的戰略進攻體系達到比較安全的地步都要推遲，其結果是戰略對比經過一個痛苦的、極危險的不穩定時期後，將終於得到較大的穩定。但是，如果不停止軍備競賽，危險就會存在，甚至總有一天這裡所預測的有限度穩定也會被軍事和近乎軍事性的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所推翻。為了介紹這方面的一種可能性，並為探討超越核導彈時代的武器發展的性質，我們提出了衛星武器時代的展望。

## (六)更遙遠的展望

有些專家認為，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使衛星上天，比起識別它和偽裝引誘物，然後從飛機或地面發射武器使它失去作用，仍然要容易些。如果他們的預言得以實現，當前正在發展的武器體系中的衛星偵察和通訊聯絡，就會比較不易遭受攻擊。

但是一旦有一方能製造出一種可操縱的空間武器或其他工具，使他能選擇地消滅敵人的衛星，而又能繼續從自己的衛星取得好處，那麼這種程度的安全就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如果敵對雙方大體在同時發展了這些工具<sup>①</sup>，他們的與衛星有聯系的地面攻擊體系就易于瓦解。在此種情況下，毀滅敵方衛星的 능력，就可能成為一國當務之急，這就幾乎和英、法在尼羅河口和比斯開灣海戰中以破壞敵人的封鎖能力為目標一樣。

這些以及其他更富於幻想的辦法：把人类的毀滅力自陸地導向空間，甚至導向月球和行星，則遠遠超出本報告的研究範圍。在空間利用方面，甚至一些更樂觀的預計，都一致認為完成可操縱的空間運載工具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事，而完成有人駕駛的攻防兩用的空間飛船還要晚兩三年。比較悲觀的預言家則認為要到

<sup>①</sup> 鑒於蘇聯在火箭動力及發射重型載重物到空間的能力顯著領先而作的樂觀假設。

七十年代才能完成这些东西①。

将来有可能更进一步取得像有效控制气候那样的成就（已故約翰·紐曼曾对此作过比較合理的預言）。这种成就可能会使我們今天的全部困难，看来很簡單。据权威方面說，这样一种技术可能使敌对的一方对另一方施加巨大的而有效的压力，无須用武器或人員侵入对方的領土②。

提出这些事例旨在提醒我們自己：技术发展的过程不适合于长期的軍事稳定，也不适合于作准确的預言。我們只要回顾最近几年的經驗，就可以发现一种对主要技术进展的預言及其实现的典型情况。为完成軍事研究及发展的特殊任务所需要的時間，通常为負有这方面責任的专家估計过低。而技术发展在更广的

---

① 見 1959 年 1 月第八十六届国会众議院第一次會議星际航行及空間探索常設委员会所准备的报告“今后十年的空間，1959—69”中的空間預言部分。

② 最近所发表的高空核武器爆炸的影响，其改变电离层特性的作用，足以广泛地扰乱无綫电通訊，这或可看作是控制气候方面的一种方式。

据預測对改变气候的技术加以国际控制，对世界安全來說，将和控制核子能同样必要。見 1957 年 12 月 31 日遞交总统的“气候控制顧問委员会的最后报告”第 2 卷第 286—288 頁亨利·霍頓所著“改变气候的其他方面”。——苏联企图改变西伯利亚气候的可能性对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降雨或将发生剧烈影响。霍华德·奧維尔曾向 J·A·摩里斯提出过这种可能性，見其 195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晚郵报”上“为控制气候而努力”一文。



範圍內所產生的全部影響，又往往超出他們的意料及他們的理解。

有一種理由可說明這點：當專家及其代言人在積極支持對軍事預算的責難時，他們往往誇大其辭，但同時他們又認為基本科學的主要發展是理所當然的。儘管一般人被那些推測不久即將出現類似奇迹的東西的預言弄得驚愕不止，但他們對當前技術成就的認識總是落後的，直到新技術的產品在他們四周大量出現之後才能認識。例如，有多少美國人能認識到我們當前的電話通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無線電中繼站（因而使美國電話通訊體系可能易受在空間爆炸的核武器的破壞）？<sup>①</sup>

我們常有這樣一種想法，電視機有一天會像裝框的畫片似的掛在牆上，而半導體的手提收音機現在已經是很普通的东西了。我們還敢保證說，總有一天，當我們發現電氣用品是如何依靠固態物理學研究的成果時，我們會大吃一驚，而上述二物就是例子。因此如果我們對我們預測未來的能力表示懷疑，那就不僅僅由於我們總想對專家的主張打個折扣，也還由於這樣的經驗教訓：技術進步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只有在

---

① 最近已證明美國的通訊體系易被更為簡單的工具所破壞。見“機械障礙引起成千件電視失靈事件”一文，載於1959年10月6日“紐約時報”第47頁。文章說，把一“小片金屬”放到遠距離超短波轉播台內，就能使密執安州廣大區域四天收不到電視。

成为事实之后，人們才能充分地認識到。

記住这点之后，現在我們要轉而簡單地談談地球、現在和影响局部使用軍事力量的战术武器的发展趋向。

### (七) 战术战争的技术展望

在一項主要是探討战略武器及战略的展望和問題的研究工作中，射程和毀灭潜力等屬於战术范畴的武器发展必須放在次要地位。由于战略武器对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具有凌駕一切的影响，这样处理是恰当的。确实，单纯发展战术武器也不可能有突然改变現有軍事力量对比的希望。

但是，必須認識到，在今后十年內战略武器发展的預期結果是侵略者为发动全面核战争所冒的危險愈来愈大<sup>①</sup>，而战争威懾者也愈来愈不认为威胁发动这种战争是可靠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局部軍事力量来达到国家目的的办法将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因而对敌我双方都很重要。下面有关战术武器发展趋势的討論必然將是簡單扼要，但我們仍想对它們可能发展的規模及其潜力加以說明。

看来，战术武器在技术上已有广泛的发展。其中

<sup>①</sup> 这一預測当然是根据这样一个重要的假定：战争威懾者在战略武器的发展、生产和适当部署方面充分发挥了預期的战略武器体系的潜力。

大部分都适合于在核战争或非核战争中使用。

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加以论述。权威方面将另行撰文详细说明<sup>①</sup>。但是这种新发展可概括为从步兵武器到具有最大威力的战术导弹的武器体系，其在体积与重量方面有不断缩减的可能，而在火力和机动性方面则有不断增强的可能。

例如，有着一种不断增强较低水平军事设备，甚至单个士兵所用的武器破坏力的明显趋势。能说明这一趋势并促进其发展的新式“常规”武器计有：美国最近制成的九十公厘口径、单发、适于一到二人使用的无后座力枪，轻型火焰喷射器，弹仓较大、火力很强的小型武器以及野战防空武器如“红眼睛”（用火箭炮发射的追踪目标的导弹，用以袭击低空飞行的飞机）之类。

核武器体积和重量的不断缩减大大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八年前的原子炮，炮的重量限定为八十六吨，口径为二百八十公厘，这反映了当时核弹的大小。

---

① 关于最近美苏陆军装备广泛的进步和发展趋向的说明，见小馬文·沃尔莱“陆军武器、战术、编制和装备的新发展”一书，1959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城斯泰克普公司出版。前引馬塔克西斯和戈德堡著作，讨论了在設想的核战场上，火力和机动性的利用及其重要性問題。关于将来的战术战争的想像中或幻想中的情况，见罗伯特·里格斯中校著“战争—1974年”（1958年斯泰克普公司出版）。里格斯的許多预测，例如利用导弹运输少量但是重要的供应，正在实现中。

不久以后出现了全重十五吨、可以空运、可发射原子炮弹的八英寸口径的榴弹炮。最近报刊上报道过装在吉普车上的核子投射器和具有一百吨爆炸力的火箭炮式的原子武器。

战术导弹的发展表现出在体积和重量方面有类似的缩减，这也是有利于隐蔽、发挥机动性、使较小型的武器具有更强的火力。美国陆军的战术导弹现在正进入第二个世代，例如，四十五英尺长、六吨重的“下士”式野战炮导弹正被三十英尺长、四吨半重、装有改良的导向器及自动推进发射器的“伍长”式所代替。在自由飞行(无导向的)火箭炮方面，我们可以作一个更鲜明的、虽然不是那么直接的对比。1950年代初期的三吨重、二十七英尺长的“诚实的约翰”式正被半吨重、十二英尺长的“小约翰”式火箭所补充，后者据说可以用直升飞机载运。所有这四种武器都能带核弹头或普通弹头。

铝制装甲的采用，说明在取得战争中地面上的更大机动性方面已有进展。这种装甲可使一个人的负重从二十吨减至十吨（这样就能使其活动范围从一百二十英里扩大到二百英里）；多种燃料坦克及卡车引擎的发展(在德国)，据说能够减少40%的燃料消耗量。

将来进一步对战术的机动性会有更大影响的，是发展飞行吉普车、飞行卡车及飞行坦克，以便把战术部队从受地形的障碍以及依靠于预先准备好的设施诸如

飞机場、鉄路綫、公路、港灣的情况中解放出来。現在美国正在发展各种各样这种类型的机器，但是报纸对其目前的发展情况是大大地夸大了。据軍事方面的估計，能够实际运用这些机器，是在1965—1970年这段時間內。如燃料的消耗及供应必要的操纵技巧，以及易于受追纵目标的“紅眼睛”地对空導彈的襲击等严重的問題尙待解决<sup>①</sup>。具有垂直起落性能的战术飞机也有同样的問題和可能。在过去十年內，三軍曾为制造这种性能的飞机，从发展基金中支出了約八千万美元。

上述各項发展，或者仅能視为是一种演变，但这种演变的速度，正如战略水平上的技术进展一样，是以加速度的步伐前进的。为了估計这种发展对局部战争（我国曾經经历过的，并且今后无疑还会碰到的）的重要性，让我们举两个简单的实例來說明，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战术武器的发展，它会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

第一个例子可用比較小而輕便的反坦克導彈，如法国的SS—10和SS—11的繼續改进來說明，它的改进是和苏联所信賴的二十三个装甲师有关的。和单个的步兵相比，坦克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但幸而不如单个步兵那样容易隱蔽。一个人使用的武器（利用借火箭炮发射的追纵目标的導彈）現已发展到可用来襲击飞机。

<sup>①</sup> 有关当前发展及軍事潜力的詳細情况，見1959年4月13、14、15日第八十六届国会众議院第一次會議“科学与星际航行委员会意見听取会，地面气垫現象”。

設計出用來襲擊坦克的類似武器也是十分可能的。如果這種武器在體積重量以及價格方面能低到足以廣泛使用，就能從根本上減少蘇聯裝甲師對西歐的威脅，就能制服坦克，一如英國長弓“武器體系”使十四世紀穿戴鎧甲的騎士變成過時一樣。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在一種敵人無能為力的環境中有效地行動和作戰的能力，這方面的例子可能有：在北極地區作戰<sup>①</sup>，在夜間通過廣泛利用雷達、紅外線、聚光裝置<sup>②</sup>來操縱武器和射擊；以及利用飛行的戰術運載工具迅速地越過敵人無法越過的障礙等優於敵人的能力。

這種機會有利於一個技術比較進步但人力有限的國家來利用，這是指同一個力量和弱點類似朝鮮戰爭中我們敵人的國家比較（或衝突時）而言，在這些情況下，我們願意利用這些機會是很明顯的，猶如同技術進步並且人力在數目上超過我們的敵人發生衝突時，有

---

① 有關在北極地區活動及生存的問題，三軍要求有大量的發明。見1959年5月美國商務部（全國發明家協會）出版的小冊子“武裝部隊所要求的發明”。

② 前引里格斯著作第244頁預測說：“首先能夠完全適應黑暗環境的部隊在作戰上將具有如此巨大的優越性，以致在任何情況下能摧毀人數超過它本身十二倍的部隊。”

美國工兵團正在用各種方法試驗將反射的星光加以集中、擴大並聚於一個焦點上，以便在夜間作戰。見前引沃爾萊一書第248頁。

必要这样作一样。

然而，还必须指出，在对战术武器进行评价时和对战略武器一样，一个常犯的錯誤是专门估计一种新武器理論上的軍事潜力，而忽略了对支持既定战略可能是必要的数量。关于这点，馬克斯威尔·泰勒將軍等人时常发表权威性的言論，认为美国甚至忽略了提供大量武器体系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为支持防御战略所必需的士兵，更談不到提供大量的、优良的支持士兵所必需的更为复杂的体系了。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時間內，这些非战略性的軍事力量不断削弱，这种力量不論是从国防任务的范圍和从我們敌人的力量來說都是需要的。

#### (八)新技术的意义

本章前几节中曾概述了武器的发展趋势和将来可能出現的武器体系，現将其更为重要的軍事和政治意义加以簡述和評論。为了簡要起見，先談談在今后十年內还不大可能出現的重要的武器发展情况。

例如，某种能使大片地区免受将来可能制成的各种投射武器襲击的积极防御体系，現在似乎还不可能发展成功。因此，在今后十年內，要依靠軍事手段来取得国家免受核武器攻击的高度安全，可能仍然是做不到的。用軍事手段所能取得的安全的程度，仍将取决于阻止敌人使用战略武器或在敌人使用之前即把它毀

掉的能力。

也不可能出現这样的目标,敌人虽知其位置,但不会为敌人数百万吨爆炸力武器的直接命中或近乎直接命中所摧毁。对报复力量的保护,必須繼續主要依靠战略武器体系的分散、增多和“机动性”。

最后,預期的战略武器体系单个或成批制造的費用不可能做到大量的节省。恰恰相反費用有上升的趨勢。每个新的一代的战略武器的費用至少要两倍于上一代<sup>①</sup>。例如,1950年代初期,一架B-47(同温层噴气机)轰炸机价值七百万美元,1958年制成的B-58(強盜式)轰炸机每架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目前尽管对第二代(固体燃料)的洲际彈道導彈存在着相当乐观的論調,认为用一、二百万美元即可买到一枚“复杂的導彈”(目前买一枚洲际彈道導彈估計要一千万美元),但这种乐观的說法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些武器的毁灭力是有限的,为了补偿这一缺陷以及抵銷敌方導彈的准确性,就須在各处大量儲备这种武器<sup>②</sup>。

暫且抛开这些极端乐观和极端悲观的推测,我們再来談談在今后十年内很可能出現的軍事技术的发

---

① 助理国防部长麦克奈尔认为这一比例是“大体上凭經驗”來估計武器成本而得出的。見1959年10月5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第67頁。

② 据空軍公布的估計,需要八百枚到二千六百枚民兵式固体燃料洲际導彈。



展。

第一种最明显的可能性是，军事技术将继续以高速度并且也许是加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样既能提高武器体系的性能，又可能增加有发展可能的体系的数量。后者的例子是，现已开始出现可能利用空间的各种计划，并且将核子武器投向敌方战略目标的工具也愈来愈多。武器的投射已不仅限于使用轰炸机，还必须考虑到有可能从地面、海上、海底、空间以及从预先设置的隐蔽的“发射台”上投射。而且，这些投射器的性能和复杂性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除了利用宇宙反导弹体系(但发展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之外，只能利用具有同等复杂性和特殊性能的体系来对付它们。

这些趋势固然显而易见，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例如，由于可能出现的武器体系的数量之多和成本之高，国家就必须选择哪些武器最合乎战略需要而加以优先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新武器的巨大摧毁力，并且需要制造特殊的武器来对付这些新武器，这又使得选择发展的办法具有危险性。这种困难，由于新武器体系对人的心理发生的影响。而更为严重。例如，一个载人的地球卫星，从其当前军事效用来考虑似可加以忽视，但它在宣传上的价值以及它对研究今后军事方面如何利用空间的贡献可能非常之大，那末对它的发展问题应如何对待呢？决定这种性质的问题只能以国家既定的明确的战略为指针。

本文所預期的技术发展前途，对于旨在防止本身及其盟国遭受核攻击的国家似乎是有利的。对付更新式的战略武器的积极防御看来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但是由于可能实现战略武器的种类很多，战争阻遏者能够把大量的各种报复武器加以分散，使得侵略者感到没有十分把握能在一次突袭中击中并摧毁敌人大部份的报复武器。这种情况类似一个训练野兽的人用一把椅子的四条腿来擋避獅子。虽然椅子是最不适宜于攻击獅子的工具，但椅子的机动性和各种显著的优点却使它适合于完成阻遏的任务<sup>①</sup>。

本文所研究的主题之一是，如果美国能充分利用所预期的战略武器的发展，侵略者将感到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进攻所冒的危险会越来越大，也就因此不会把它看作一种合乎理智的行动。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趋势，而且，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使得发动核进攻成为可能性的那些武器，无疑还将继续得到改进。正如昆西·赖特所指出的，武器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影响是变化不定的，而支配战争的历史的力量是，“战略家为迅速获胜去创造新武器、新策略和新组织所作

---

①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的战争。（参见美国退伍陆军中校雷克斯·阿普盖特所著“杀人或被杀”，第94页，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军事出版公司1956年出版）但在此例中应强调指出，训练野兽的人还拥有更适于攻击獅子的武器。

的努力”。<sup>①</sup>

无疑，最近在发展战略武器投射方面所取得的个别的和积累起来的成就，加上主要敌对的双方不断地制造核爆炸武器，已经使战略对比的水平提高到比过去具有更大破坏力的程度。因此，从前一度认为足以发动全面战争作根据的那些理由，现在不能认为是合理的了。

但如果认为由于这种高水平的战略对比就使得全面核战争变得不合理，从而也就不可能发生，这就忽略了那些使核子平衡局面趋向不稳定的反面因素。这些不稳定的倾向将在下章讨论。除非这些倾向能加以满意的处理，否则就必须认为全面核进攻的可能性是继续存在的。从此可得出一个结论，即可能在这种进攻下遭受牺牲的人必须保持以合理手段进行还击的能力。此外，民防措施是国民在遭受攻击时能得到保护和以后能得到恢复的必要手段，忽视民防就要冒重大的危险<sup>②</sup>。

① 见赖特所著“战争的研究”，第792页及以后几页，195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赖特说，战争费用的不断增加使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效用有降低的倾向，同时也增加了国民对战争的厌恶。但也恰是这种倾向提高了战争威胁和战争潜力在政治上的效用。见该书第320—321页。

② 各种研究报告都指出，一个国家如愿实行广泛的民防措施，由核攻击造成的伤亡就会大为减少。见兰德公司在赫尔曼·康恩领导下于1958年7月1日提出的“非军事防御的研究报告”。

現在談談預期的軍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第二点意义，即它和現代軍事力量分布的关系。显然，新战略武器体系的費用和复杂性使美苏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都不能变成主要的軍事强国，甚至不能参加超过最起碼限度的战略軍备竞赛。

确实，“几乎世界各国都有科学家，最后总会在設計或制造原子彈方面取得成功”<sup>③</sup>。并且少数具有先进技术国家可能在創造或維持一二种現代武器体系方面获有成就<sup>④</sup>。但是只有美国和苏联能够进行高度专门化和开支浩大的各种武器計劃，而这些計劃是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为維持战略軍事力量所必需的。甚至在这两大强国之間，也必須承认其中有一国会优先发展的技术的某些方面居于显著的領先地位。

这并不是說盟国現在或将来对武器发展做不出有价值的貢獻。它們对制造有限范围内的某些专门化武器的貢獻日益重要，例如，最近英、法試制反坦克導彈

---

报告說，如果敌人向美国一百五十个城市进行一次完全有效的導彈进攻，就会使无防禦的居民死亡一亿六千万人。但如果广泛地設有防备爆炸的隱蔽壕，并在敌人來襲前三十到六十分钟就发出警报，死亡就会減到二千五百万人。关于这种情况以及美国在各种攻击和防禦情况下死亡人数的估計，可参考上述报告第2章第5到第13頁。

③ 参考前引威尔科克斯的著作第81頁。

④ 例如英国的V式轰炸机和法国致力于发展核彈及投射器。

可能成功，比利时已制造出现代化的步兵用的步枪。但是有关生产和使用战略武器的广泛问题可能主要仍将是美苏两国的事情。美苏双方发展导弹的结果，使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遭受威胁，并使基地的必要性为之降低，因此，导弹的差距变成对西方国家具有共同重要性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只能由美国来设法解决。

新武器除去突出了美国和集体防御体系中其他国家之间力量的悬殊之外，还引起了这样一种论调，即美国因拥有新武器，就能够以部署在它自己领土上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地区的海上、空中及空间的部队来保卫自己。这种论调是十分错误的，因为美国继续需要海外的设施，至少是为了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对新出现的空间体系进行地面支援，保持海军基地，以及为了在局部战争中能够迅速部署的部队取得保养、修理和前进基地。如在前面讨论卫星体系时所指出的、对海外设施的需要，实际上是愈来愈大了。然而，为了其他理由赞成美国堡垒战略的人，或是盟国中害怕美国采用这种战略的人，也不会忽视像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子潜艇这类新武器的射程和持久力等性能的。

因此，由于新武器的影响，当前联盟体系内的分裂势力还很可能因而扩大，从而使外交政策制定者为保持和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的工作更为复杂。

同样很明显的是，可预见的技术发展会使美苏当前的紧张局势趋于尖锐，并会导致新的紧张。前面已

經提过，將空襲、空防和警報體系擴大到北極和海洋區域可能引起許多“政治問題”；無疑，利用空間的競賽又為進行冷戰、有限戰爭甚至熱戰开辟了新的戰場。過去因國際地球物理年而發生的關於衛星無線電通訊綫路的爭論是這種空間爭執的一個前兆；其他可能引起爭執的問題還有：國家主權和領土擴大到空間的問題，利用無線電頻率的沖突問題，辨識電子和“秘密”衛星的問題，甚至還有敵對的空間體系互相干擾的問題以及在月球和行星上進行活動的矛盾問題<sup>①</sup>。目前敵對雙方對於正在準備作處女飛行的“空中間諜”衛星所表示的反應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不能以空間的軍事使用與“和平”使用之間有顯著差別的假定來迴避這些問題。當此全球性戰爭還可能發生、氣象控制可能實現的時代，甚至從衛星上測繪地圖和氣象圖的事情也都明顯地和當前的武器體系的使用以及和新武器體系的发展是有关聯的。衛星和低空衛星的偵察體系顯然都是軍事工具。前已說過，航行衛星的作用是使船隻、作戰飛機和潛水艇能非常准

---

① 關於這些以及其他可能發生的空間糾紛的詳細討論見星際航行與空間探索常設委員會的報告“空間法則概覽”，載國會（八十六屆第一次會議）文件第89號，1958年12月。有關這些問題的美國政策，或者，更明確地說，缺乏政策的情況，在眾議院科學及星際航行委員會於1959年4月提出的“美國控制及使用外層空間的政策”的報告中有簡要說明。

确地确定位置<sup>①</sup>，而这是准确地放射彈道導彈所必需的条件。现在关于軍事上利用空間的各种設想还不是肯定确切的，因此，要把空間的研究分为軍事的与和平的两个方面就更加困难。

像洲际彈道導彈的发展一样，人們利用空間能力的不断加强，就使国际合作和控制更为需要，但也更难取得成就。建立有效的国际警报体系以防御導彈攻击就必须让出国家主权，这一問題就說明了困难所在<sup>②</sup>。

由于敌人用以发动摧毁性进攻的工具和速度的增加，其意图就更加难以捉摸，因此新武器的发展也会加剧現在的緊張局势。现在要将導彈潛艇和其他潜在海底的核子舰艇加以区别已不可能，不久之后装有中程導彈的商船，装有民兵式導彈的火車或駁船，可能还有卫星轰炸机也同样难以区分。这些武器潜在的摧毁力大，体积小，并可能有多种的伪装形式，这就需要国家让出更多的主权才能对这些武器进行控制。

① 見高級研究計劃局在1959年4月14日為1960年度國防預算在眾議院意見听取會上有關航行衛星計劃的說明，第6部分，第21頁。由於構造簡單並且造價較低，航行衛星網可能首先運用到軍事軌道體系中去。

② 西方專家去年在日內瓦召開的突然襲擊問題會議上草擬出一種制度：首先，從高空及低空繪制敵國地圖；由地面觀察員組成的流動組加以鑒定；由固定觀察組對導彈發射場連續進行觀察；還包括建立信號時誤在一分鐘以下的國際通訊體系，以及地面的輔助雷達以偵察飛行中的導彈。以上見前引該會議報告。

由武器发展过程所产生的第三点意义，牵涉到目前战术体系在技术上可能产生的成就。前面所說的那些发展，特别是能够加强地面及空中的机动性的发展，以及較低級軍隊单位的武器火力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加强的情况，使得甚至在地球上遙远的地区也能迅速使用軍事力量。这意味着，現在比以往能够更迅速地发动或結束一場有限的或局部的战争。

从上面的看法可以得出一个結論：今后十年軍事技术的进步将不断促进发动战争的速度及起决定性作用的軍事力量。这只是指發揮軍事力量的机械而言，并不一定是指发动战争的效果、合理性或可能性而言，这些因素很可能不断减弱。但是因为机械的能力是使得发动战争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至少在今后十年內，具有軍事潜力的侵略者仍有发动战争的可能。

因此，軍事和外交政策的問題在于如何最有效地消除或避免可能使苏联发动战争的刺激和誘惑。这个問題的解决，一部分而且仅仅是一部分有賴于利用軍事技术来扩大进行突襲的国家遭到报复性回击的危險程度。前已提出，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增多和分散現有的阻遏武器体系，并予以地下化和机动化。

即使能够完成这些工作（这的确是必須完成的），战略平衡不穩定的問題仍然严重存在，可能引起不合理的、具有毁灭性的核子战争。这种不穩定是由于現代战略武器的特性和利用这些武器所支持的国家战略



而产生的。因此我們現在要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 第五章 战略力量平衡中的穩定性和不穩定性

### (一) 穩定性和不穩定性

像这些日子所使用的許多詞匯一样，穩定这一概念是借用物理学中的数学名詞。它指各种各样的平衡。所謂一个物体的“穩定”，是該物体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因子的变化为其它因子的变化所抵消。如果一个因子的变化因其它因子的作用而增加或成倍地增加，我們說这种物体是“不穩定”的。

通常所举的例子是一只球在碗底呈靜止状态。如果用外力将球推向一边，这一外力受到地心吸力的对抗。球推得越高，地心吸力越大。外力取消后，地心吸力使球重新回到碗內。球在碗內是处于穩定的平衡状态。将碗翻过来，平衡就成为不穩定了。只要有任何外力将球輕輕地推动，在地心吸力的促进下，就会使球从翻过来的碗上一滚开了。球在翻过来的碗上是处于不穩定的平衡状态。

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子强国之間的关系，有着类似的特征。使它們关系“穩定”的因素和使它們关系“不穩定”的因素，可以有同一性。如果它們的关系是穩定的，任何要把它們推向战争的情况将受到反击力量的

反抗，这些国家越接近于摊牌，这种反击力量越增加。如果它们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任何把它们推向战争的情况，将为其它内在力量所增强，而使战争难以避免。

## (二) 趋向稳定的因素

使核子强国间关系趋于稳定的因素，就是提出核子僵局概念的人所常说的那些因素。主要的稳定力量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核子战争的发动者在战争的过程中所遭到的破坏，将大大超过他可能获得的东西。此项假设为下面这样一种完全合理的想法所支持，即热核武器能产生的破坏，对他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的受害幅度较之因破坏其它国家而取得的价值，将不可同日而语。

对俄国人来说，失去莫斯科不是摧毁纽约以及其它五个美国城市所能补偿的。同样，六个俄国城市的毁灭也难以补偿我们失去纽约、芝加哥或华盛顿。不论在核子战争赌注中是胜利还是失败，受到报复性打击的目标，可能遭受数以百计而不是单个武器的攻击。因此，促使核子强国关系趋于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为了获得胜利，需要拥有大量击中目标的武器。然而敌人使用极少量命中目标的武器就可能剥夺一个国家任何合理的胜利果实。

但是，促使核子强国关系趋向不稳定的极重要因素是存在的。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讨论其中某些因素。

所要考虑的这些因素将分为四类。第一类将包括各种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子强国所部署的武器体系的特点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穩定傾向，这类将被称为“结构性的不穩定”。第二类包括各种由于推动武器体系发展或部署的活力所形成的時間差異而产生的不穩定傾向。第三类将包括各种由于核子国家的战略或政策主張而引起的不穩定傾向。第四类是由于战略核武器分布于許許多多国家而产生的不穩定。

### (三) 结构性的不穩定

不論在当时軍事技术条件下可使用的武器性质如何，先发制人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这点在战争中一般說来是实在的。当然，在战争的某些时期，防御性武器和防御地位可以超过先发制人的优越性，这也是对的。这在堡垒战技术尚未被攻坚战技术赶上的时期可能是如此。这在战壕与机枪尚未遇到坦克和飞机的时期也或許是如此。但一般說来，先发制人是軍事战略上主要关键之一，是一直被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員所強調、或者是过分強調的①。

在1914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軍事形势中，其固有的结构性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各国爭

① 見伯納·布罗迪所著“原子时代的軍事战略”一书，該书第一篇談到这一問題。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城普林斯頓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取“以最高速度动员最多人力”的压力。当时所有欧洲军事计划家都认为战争中最初几个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是任何有意义的军事胜利的关键，而取得最初战役胜利的关键，又取决于他们受过训练的人力的动员速度、动员效率和对方动员的速度、效率之间的对比。最主要的是不要让对方取得比你更早动员的有利地位。

可以回忆一下，欧洲各国为达到最高动员速度以反对它们的主要敌人而经过数年的紧张努力后，在1914年发现自己不能慎重地处理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因为它们的动员计划造成了结构性不稳定的形势，从而剥夺了它们在较小危机中的行动自由。也许除了塞尔维亚人以外，没有一个有关国家是要大战的，德、奥、俄、法、英等大国几乎可以肯定说是如此。但是塞尔维亚人希望拆散奥匈帝国，而奥地利人则要惩罚塞尔维亚，站在这两方面的大国都有义务支持它们的盟国。结局是大家都熟悉的。沙皇只想动员反对奥地利来表明他对塞尔维亚人的支持，但他的参谋部通知他，仅作这种局部动员而不打乱总动员计划是不可能的，而这样作，一旦德国动员时，俄国将赤裸裸地处于德国攻击之下。沙皇为了不使他的盟国失望（奥地利向它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意了总动员。接着德国动员起来攻打法国，因为它们的动员计划要求它们在东线采取决定性行动前，先安定西部边界，但不能让俄国人在东线占优势。

今天由于武器体系的特点所能产生的结构性不稳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迅速动员的优越性,有更重大的影响。

在今天的武器体系中,倾向于不稳定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攻击力量体系易于受到反击力量的攻击。如果一种反击力量的武器击中目标,能够使防御者的许多或者即使是一些武器遭到毁灭或失去作用的话,那么首先发动攻击,显然处于很大的有利地位。

第二,一般说来,防御体系对付少量攻击武器,要比对付其数量足以使防御力量达到饱和点的武器有效得多<sup>①</sup>。

第三,能预见未来攻击的防御,比进行使人感到突然的防御或只是由于得到临时的不敢肯定的进攻警报而进行的防御,可能更有效得多。

如果这些仍然是战略武器体系中的特点,在核子战争的初次交锋中(一方首先发动攻击,对方作报复性的还击),完全可能造成双方残存武器和主要支持体系的巨大悬殊。首先攻击造成的破坏大,反击造成的破坏小。第二次交锋会使悬殊大大扩大。很难想像第三次交锋会有任何军事上的意义。一方在核子攻击力量

<sup>①</sup> 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在防御有人驾驶的轰炸机的情况下。对洲际弹道导弹弹头,现在没有任何积极防御办法,这一军事生活中的事实,使得在敌人运用导弹前首先发动攻击予以摧毁,具有显著价值。

中已处于支配地位，战争还能正常地继续下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并且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军事计划家（他们必须考虑在威慑失效后应采取什么行动）除了从事一切能使他们获得首先发动攻击的好处而对方却不能的事情外没有其它选择。他们被迫考虑先发制人的进攻<sup>①</sup>。他们也不得不致力于研究可能获得极迅速反应的警报体系和攻击体系，其反应之快，足以使他们在敌人首先发动的攻击命中其目标前，发出他们的先发制人的攻击。

但这种快速的警报与反应体系仍然会导致结构中的另一不稳定因素——由于偶然事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有一个为大家熟悉的例子。战略空军司令部依靠探测性雷达来获得突然袭击的警报，而它往往鉴别不出，譬如说美国OA-9型运输机和俄国轰炸机飞行之间的区别。由于存在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就制定了广为宣传的“防误”程序——一种保险办法，这种办法规定，轰炸机在得到可疑警报后起飞，但飞行地区有一定

---

① 先发制人的定义是“最后一分钟从正要进攻或在准备过程中的敌人手中夺取主动的不得已措施”（雷蒙·L·加索夫著“苏联想像中的未来战争”，1959年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版第14页）。它通常和预防性战争或根据自己的时间经过深思熟虑发动的战争不同。

限制，除非接到最高當局的特別命令（經檢查雷達螢光板上的目標顯影證明確屬轟炸機而非運輸機後）不得飛越規定界限。現在建立的雷達系統在警報洲際導彈襲擊時，或許不易為運輸機所混，但卻可能與流星或其它天體現象相混淆。至今還沒有人聲稱已制定了對我們洲際導彈的“防誤”程序。

於是由於“快速反應”而產生的不穩定的根源成了不可忽視的威脅。他們帶來了一個可怕的戰爭前景。因為按電鈕的實際決定可能是合理的，但它所根據的前提卻是錯誤的。況且這種不穩定的技術根源，原則上不被敵對雙方所喜歡，因為它們是武器體系特殊性能的一種作用。因此，它們說明對偶然事件採取合理的控制措施（其中或許包括限制與監督軍備的協議），是符合敵對雙方共同利益的。

#### （四）由時間性差異引起的不穩定性

第二次大戰後，在審問日本領導人時，我們曾設法了解襲擊珍珠港及發動攻擊時間的理由。在日本戰略家腦子裡佔據重要地位的因素中有這樣一點，就是他們估計在 1942 年 1 月 1 日以前，他們可以有足夠的石油貯藏滿足戰爭初期的需要、至少足以維持到他們能夠從婆羅洲和印度尼西亞等佔領區將此項物資運回日本本土為止。他們預測，如果不立即發動戰爭，美國對原油和廢鐵的禁運，將使他們上述物資的儲備迅速耗

尽，以致1942年1月1日后，他們将不再能完成甚至战争初期的任务。因此，他們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們必須在某一日期之前出击，或者根本就不打。他們之所以在那个日期之前出击，不是因为他們对战争将如何结束已有任何清楚的看法，而是因为他們认为如果不在那个日期前出击，他們肯定将成为第二等国家。

核武器体系的发展或部署的时间性差异可以产生同样的不稳定性。当一方认为它在核武器竞赛中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但又能預見到某一时期內这一优势将消失时，就有充分的理由在优势消失前试图加以利用。就是这种思想，在1949年到1954年期间激起了要求預防性战争、使用核武器以扩大朝鲜战争或进行以最后通牒为后盾的谈判等呼声。在那种情况下，我們认为其它方面的政策考虑更为重要。对于要求我們在仍拥有設想中的决定性优势时就利用它的呼声，并未加以注意。

但这种情况，在以我們近年来所見到的技术蓬勃发展为特点的军备竞赛中，还有可能再次出現。讓我們假設，我們在苏联发展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反击力量導彈能力以前，还不能发展和安装警报系統以及加强的机动或隱蔽的武器体系，其种类、数量之多和安全程度足以挫敗苏联这样一种反击力量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誰能够預言苏联将不会在他們失去这种力量以前加以利用呢？



还可以举出其它一些关于这种类型的不稳定的例子。重要的问题在于，国与国之间相对的战略形势的改变，可以引起不稳定。发展并部署为战略意义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现代武器体系需时多年。这一事实，使得难以立即采取弥补行动来避免这种不稳定。因此，由于武器发展或部署的时间差异而产生的这种不稳定的时期可能相当长，并且是危险的。

#### (五) 政策主张引起的不稳定

不稳定的倾向也可以由一个或一个以上核子强国的政策主张引起，他们采取这种政策主张的理由和双方对立的核武器系统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直接联系，也和这种关系因时间差异而产生的预期变化无关。这种不稳定的趋向，我们可称之为，“来自政策的不稳定”。

假如一个核子强国的总政策，就它的非核子力量来说（假如它未享有核子优势），具有过分侵略性或者扩张性的话，“来自政策的不稳定”的危险就容易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加强“对抗程度”的倾向。一个国家为了弥补在它的政策任务和它并非核子力量之间的不相称的状况，有可能企图利用对方害怕在所争论的问题上可能爆发核子战争的心理。这个国家可能希望以较实际情况所许可的更为激烈的威胁行动（无论这种威胁的手法看来多么不合理），来约束对方，使其

鉴于后果难料，不敢在某一問題上摊牌。

今天我們可以这样认为，苏联为夺取世界霸权的过分野心，誘使俄国人揮舞着他們的核武器，威胁全体要同归于尽，并且宣告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受地理或武器使用的限制。他們希望依靠这些办法充分地削弱他們可能的敌手的抵抗力，以便他們能够把一个不现实的政策变为一个现实的政策。

另一方面，今天我們也可以这样认为，西方为了弥补配备以非核子武器的有訓練和有組織的人員的严重不足，也就揮舞着它的核武器，以同归于尽相威胁，并且宣布对于共产党的任何有限侵略的回答，似乎不可能只限于它所侵犯的地区，或仅仅使用它原先使用的那类武器。

也許双方事实上都不会完全按照它們的威胁行事。但毫无疑問，双方这种政策主張的相互作用，可以使核子稳定局面呈現緊張。政策主張牽涉到一个国家的威信。双方有可能为斗志所驅使，都相信自己是能够吓倒对方的。如果像在柏林或中国沿海島屿等問題上，一个国家的基本威信和荣誉被推到了摊牌的地步，为了使以核子为后盾的政策更为可靠，而表明自己可能除了核战争外不作別的选择，那就更危險了。

如果核子形势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对一个侵略者來說，追求有限侵略可能是一个更加冒險和更加困难的政策。但是，我們的政策制訂者这时必須决定，他

們是要更加关心不稳定的核关系有趋于恶化并变为一場不得已大战的危險呢，还是要更加关心由于非我們用非核子手段所能阻止或击败的一系列有限侵略而导致苏联掌握有效的世界霸权的危險。

#### (六) 由于許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而产生的不稳定

对这个問題有渊博知識的学者认为，我們迄今所討論的如果是属于两个敌对国家或两个有良好紀律的集团之間的不稳定，那可能好办，但如果是許多国家，而每个国家都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建立战略核子能力，并用以支持自己的政策，那么就将出現一种完全不能控制的形勢。

可以这样說，没有一个非真正第一流的国家，能拥有广闊的領土用以部署一个分散的、多样的和安全的报复核子能力，并能拥有足够資源和科学知識来发展并維持这种能力。

还可以进一步說，一个沒有安全的报复力量的国家，威胁或恐吓它将在首先发动攻击中使用这种力量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这种威胁和恐吓是极端危險的，如果对方是一个强国，它将招致一場不是威胁国所能抵御或接受得了的反击力量的攻击。如果对方是一个弱国，則将引起第一流国家的干涉，因为它們是不願意看到这种威胁或恐吓生效的。

然而，战略核武器分布在分属于各个松懈联盟体

系的許多国家或者成为这些联盟体系爭取目标的中立国家，这种情况，无疑是可能增加不穩定傾向的。如果共产党中国拥有的一支战略武器力量，我們相信能在首先发动攻击中就予以消灭，如果中国共产党利用这支力量来支持一个擴張的侵略政策，这很可能强烈地誘使我們去消灭这支力量，而同时依靠我們的全部报复力量来阻止苏联支持它的盟国——如果我們估計苏联会因而受到約束，那我們就可能錯了。我們可以設想类似的情况，苏联對我們必須支持我們的盟国也那样估計的話，是可能作出同样錯誤判断的。

在許多国家持有战略核武器的这个世界里，不可能預見力量和政策一切可能的結合的情况，是有理由引起巨大的忧虑的。

## 第六章 军备监督和其他稳定性措施

讓我們現在假定，美国已經决定优先考虑减少全面战争的危險，为此，将在今后十年內有意識地爭取減緩核子不穩定局面。怎样能达到这个目的，付出什么代价，这一行动的必然結果又是什么呢？

在这方面可以想到的有好几种不同办法，其中几个是由前章所討論的不穩定根源联想出来的。例如，美国能够建立和部署报复性武器体系，其安全和机动程度足以削弱当前苏联要首先发动攻击的想法。能够

辨別雙方信號的，多種多樣的攻擊警報體系可以減少因偶然事件或失算而發動戰爭的危險。我們這個國家可以修改它的政策，以減少對全面戰爭威脅或持續的核子不穩定局面的依靠。我們應該能夠用我們自己的行動使核子穩定局面更趨鞏固，不管蘇聯同意或不同意這樣作。此外，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行動來启发蘇聯和其它國家對核穩定採取一致行動。我們可以把達成和維持這種穩定作為國際監督和限制軍備談判的首要目標。

一 所有這一切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和維持核穩定局面。然而，一個最重要的必然結果將是：使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將不得不尋求和發現戰略核報復威脅以外的辦法來支持我們的外交政策，並滿足我們安全方面的各種需要。這可能要進行巨大的努力並且需要付出相當大的犧牲。對尋求核子穩定局面作出決定，就意味着願意作出這種努力和忍受這種犧牲。

本章其餘部分將對減少全面戰爭的危險可能採取的方法作更詳盡的研究。

### (一) 美國單方面的行動

前面已經提到，不穩定的一個主要根源是首先發動攻擊的一方因擁有洲際導彈而占優勢，特別是當對方的戰略力量集中在有人駕駛的飛機時更是如此。然而，現在一般都同意，如果我們的資源用於發展和部署

这样一种特殊的武器体系，它能不暴露目标，或者用其它方法也能經得住突然攻击的話，那么在消除当前不稳定根源方面会有很多事可作。机动的或設在地下的、隱蔽的、多样形式的报复性体系，和大量分散的、多种多样的武器，可以使苏联很难有高度信心，认为它在全面战争的首要攻击中可以摧毁敌方大部分报复力量。从这一方面来看，减少爆发全面战争可能性的障碍，似乎主要不在技术方面，而是由于考虑到成本、发展复杂的现代化武器体系所需要的时间<sup>①</sup>以及有些人的相反要求，他們主張应拥有旨在使美国能够用以首先发动进攻的那类武器，如果为了履行我們外交政策的义务，认为有必要这样作的話。这些障碍中困难最大的恐怕就是时间問題。为达到核稳定局面，我們現在馬上就需要原来计划在 1963—65 年完成的武器体系。到 1965 年时，我們又很可能需要为 1970 年计划的武器体系了。同时可以用弥补缺陷或保护性的权宜办法来取得相当程度的稳定，尽管这种体系是不完善的，但确是存在着；或者在 1960 年代初即可完成。

我国的报复体系越是能够避免为首先发动的反击力量的打击所摧毁，它就越不需要依靠“一触即发”的能力来回答。如果我們有很多北极星潛艇隱蔽在海洋深处，很多設在地下的或机动的使用固体燃料的“民

<sup>①</sup> 指由着手研究到获得初步研究結果所需时间。——譯者

兵”式洲际彈道導彈安置在適當地地方和很多配有彈道導彈的續航力較久的飛機分散在上空，我們就能在按開火的電鈕前確定或估計敵人的襲擊信號，這些信號可能是錯誤的。如果早期警報發出後敵人的導彈並沒有來，我們在進行報復打擊前甚至還有時間和假想的敵人聯絡。如果導彈已經發出，我們就不至於要求在幾分鐘內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或者倉促地決定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的報復必須立即進行還是根本不進行。這樣，我們就可以減少採取倉促的、很可能是基於假的或錯誤情報的單方面行動的危險，這種行動將會引起本來可以避免的戰爭。

美國在減少和平時期的戰略和政策主張所引起的不穩定方面，也還有許多事可作。如果美國接受由於贊成核子穩定的決定而產生的必然結果，並且決心用核戰爭威脅以外的方法來達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那麼就和揮動我們的戰略武器，或宣布對共產黨局部侵略的回答將不受侵略地區或最初使用的武器限制等做法自相矛盾了。而且這和在地面上的、未隱藏的、非機動的和不分散的、在蘇聯中程導彈射程以內的歐洲各地繼續部署中程彈道導彈基地的做法，也是相矛盾的，並且事實上也是自取失敗的。如此部署的這些武器，只有在首先發動攻擊中 useful，在報復性打擊中，看來很難用得上。在沒有其它更適宜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它們在阻遏蘇聯非核子侵略中可能起有限的作用，但

它們將增加核子不穩定性。

總之，由單方面採取行動以促進戰略核子穩定局面，是大有可為的。但仍會有許多難題得不到解決。成本浩大而勝敗難定的技術改進的競賽不會減緩。將戰略核武器部署到其它國家去的工作會繼續進行，這包含着產生至今尚難預見的不穩定性的一切可能。我們需要刻不容緩地尋求和發展以非戰略性核武器來支持我們外交和軍事政策所有論點的辦法。現在這些論點是以核報復威脅來支持的。特別是我們和我們的盟國有必要大大增加我們常規軍力的數量、火力、機動性、訓練和協作。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了解在推向穩定方面能否得到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得到其它國家的合作。

### (三) 相互的行動

對戰略核武器力量對比中的不穩定表示關心的顯然不止美國。這是各國人民主要關心的事。沒有理由認為，蘇聯領導人對核子不穩定根源表示十分關懷時是口是心非。他們對於由強大的首先發動攻擊的能力所產生的不穩定是不會小看的，這種能力本身就非常容易遭受敵人首先發動的攻擊。他們也不會無視偶然事件引起戰爭的危險。他們當然可能相信，在軍備競賽的某些方面，他們更先進，同時把某些不穩定因素看作有利於他們保持或擴大統治權。但是他們過去的態



度完全不同。今天他們可能揮動他們的火箭，但是“戰爭邊緣”並不是他們的創造，而且也不是蘇聯的專利。還有理由相信，他們也害怕戰略核武器推廣到較小的或不太負責的國家去。

如果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在減少核子不穩定根源方面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如果我們自己朝這一方向前進的話，那就不應該不可能誘導其他國家採取相應的措施。

當前核武器試驗的情況同時說明了相互行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現在並沒有正式國際協定限制或禁止這種試驗，但是美國要單方面恢復核武器試驗是有困難的。這種作法，在政治上和宣傳上的代價很高，蘇聯可以因此恢復他們的試驗計劃，並宣稱是用我們的行動迫使他們這樣作的。蘇聯當然也同樣受到預先可以偵察的試驗的限制。

另一方面，現在還沒有一種視察程序可以保證蘇聯或其衛星國家沒有在地下進行秘密試驗。法國很可能將不顧國際壓力和輿論在撒哈拉至少進行一次正式核爆炸。

因此，儘管可以通過示范、政治壓力和外交行動做很多工作來使其他國家走向核穩定，而為國際監督和視察機構所支持的正式協定，仍有多餘地可對穩定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 (三) 国际军备监督

赫魯曉夫先生曾建議把軍隊總數裁減至國內安全所需要的國內警察力量的水平。這還要看是否能就對國際爭端作出決議並付諸實施所需要的視察程序、措施和力量，以及分階段達到這一目標等問題達成圓滿協議。但即使在這些障礙是可以克服的這一不大可能的假定之下，也還有甚至是更基本的問題需要考慮。它們關係到這樣一個問題，即一個完全解除武裝的、多國家的世界，究竟如何能得到真正的“穩定”。

要使武器方面已有的先進科學技術倒退或認為“沒有發現”這些東西，顯然是不可能的。在一個完全解除武裝的世界裡，如果國與國之間在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上發生了衝突，或者甚至在有發生衝突危險的時候，由於技術的發展，馬上就會來一個狂熱的製造或部署最有效、毀滅性最大的武器的競賽。敵對的某一方也許處於相對的有利地位以贏得這場競賽。歸根到底，還是現代技術及其武器來解決問題。使這些武器在這場衝突結束時發生影響恐怕比在開始時發生影響要好些，但在一個分裂的世界裡，要永遠禁止它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發生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要想使科學發展的時鐘停止不前，幾乎要和把它撥回來一樣困難。科學家將繼續進行思考。實驗室和計算機將繼續增加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的焦點可

能从武器轉到別的方面，但要使它在軍事技術上不發生任何影響是超出可能的範圍的。

能否設計出一種具有高度準確性的視察制度也是值得懷疑的，這種制度可以查明所有過去生產的核物質是否已被估計清楚。如果把鈾隱藏在一個鉛盒內或地下<sup>①</sup>，蓋格輻射綫探測器即使在很近的距離內也不能發覺它的存在。據說，國際視察人員需要用以探出隱藏着的鈾的主要工具是鐵鍬和螺旋鑽。即使借助于現在所能想出的最完善的視察制度，似乎也不可能完全保證，譬如說，足夠製造一百個核武器的物質不會被人密藏起來。

問題在於絕對的穩定不可能通過軍備監督、裁軍和視察取得。更重要的是，不一定能通過最大限度的裁軍獲得最大程度的穩定。

電子學家談到他們電子系統中的“雜音強度”。所有作用於該系統或在該系統內部起作用的雜亂的不受控制的力量叫做“雜音”。如果雜音的强度高，它將掩蓋住微弱的信號，在這種情況下，電子系統就要設法加以調整，使其恢復正常。如果信號強，它們就會克服甚至相當強烈的雜音。因此，如果讓電子系統在控制之下起作用，那麼，在必須保持的信號力量和雜音強度之

① 據權威人士談，藏于炸彈內部加以嚴密隔絕的核物質，用現有的最靈敏的儀器在幾碼的距離內也偵查不出來。見西方專家們所提出的聯合國突然襲擊會議報告，附錄 13 第 4 頁。

間存在着一种关系。

在为国际协定所許可的軍备水平和性质同能破坏这种体系的隱匿的或秘密生产的武器之間好像有着类似的关系。美国与苏联之間的限制軍备协定允許每一方保持一定数量的能够經得起对方的首先攻击而不致被毀灭的报复力量体系，但这些体系本身在数量、破坏力和准确性方面不足以发动首先攻击；这种协定可以使受监督的力量和不受监督的力量之間保持一种有利于核子稳定的比率。

讓我們假定，这样一种监督軍备制度允許双方各保有二百或三百个战略核武器，这些武器隱蔽得这样好，这样机动和分散，以致要破坏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大量具有巨大破坏力和高度准确性的攻击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方或另一方的攻击力量秘密地增加了几百个武器，也不足以破坏該制度的稳定。要想破坏这一制度固有的稳定性，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实际上要冒被发觉的极大危險。因此，想要破坏該制度的任何尝试，都会鉴于上述情况知难而退。

要設計出任何一种十分安全的軍备监督和視察制度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对这个問題还有其他重要的考虑。第一，如果不进行坚决的努力以达到某种形式的核稳定，今后十年的前景将极不稳定，且有导致至全面核战争的危險。正是为了使目前我們所处的非常危險的地位不致于更趋恶化，我們势必投入激烈的軍备竞赛。

第二，除美国外，其他国家也有兴趣要减少核子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这方面需要加以克服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或许是由于军事技术的加速度发展而引起的。可以想像，任何军备监督和限制协定在其序文中应该表明締约国保持使长期核子稳定成为可能的条件的意願。为此目的，相互承担的义务之一可能是公开科学和技术研究。这样的义务在具体实施时可能有困难，然而，明显背棄义务的行动应该能够被察觉出来。

另一个困难问题也许是制裁问题。如果一方或他方认为协定正在遭到破坏，除战争外，还能采取什么办法呢？被告可以利用视察和调查程序来表明这种指责是不真实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然而，如果一方故意破坏协定，并坚持破坏下去，那又怎么办呢？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是宣布协定作废，并进行全面动员。根据协定所保持的可靠报复力量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能防止这样的威胁，即防止首先破坏协定者在防御者借动员大大增加其力量之前获得决定性的反击力量。

除美国和苏联外，还有一个有关其他国家的难题。在如何保障它们的安全，特别是在防止第一流强国的威胁和侵略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組織一支具有相当規模和力量的国际警察部队。这种办法涉及到许多问题，諸如該部队将如何控

制、如何配备人員、如何装备、駐守何处、以及如何对进行干涉的时间和对对象作出决議，等等。很难看出苏联或美国如何会同意建立一支規模和力量足以威胁自己的部队，如果这支部队有可能落入它的敌人的有效控制之下的話。另一种可能性是允許較弱的国家拥有少量战术原子武器，这些武器只能用于防御外来的优势部队并限于在它們本国的領土使用<sup>①</sup>。

关于軍备監督协定中的視察問題还要說几句话。如果不同时建立一种要求被視察的国家提供适当事实的制度，視察可能是无效的。这种視察制度就可用来鉴别所提供的事实准确性。这两者相結合的办法連同在对出事地点进行更詳細的調查，就比那种旨在使每件事都自动显现的視察制度能提供更可靠的証据，以說明那里沒有发生違犯协定的事。还需要作許多其它的技术工作来确定各种視察技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諸如空中摄影、工厂生产的监听以及电力消耗量的纪录等。

应该提到通过監督軍备取得更大程度的核子稳定方面的其它两个困难。第一，我們和苏联現在互相掌握对方的情报是不对称的。苏联的制度适合于保密，而我們的則不是这样。因此，苏联的領袖們似乎不会

---

<sup>①</sup> 这个建議是保羅·尼茨在“作为談判基础的另一核子政策”一文中提出并詳加說明的。（“东西方会談”第28—37頁，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所1958年出版）

认为，一项等量交换情报的计划包含着双方对稳定的同等牺牲。第二，一项有效而广泛的计划必须包括所有重要国家。一项不包括，例如说，中国在内的协定将为我们这一方带来最严重的危险。

因此，通过军备监督协定来寻求核子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可能是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在合理的、可能为他们接受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这样可能需要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其中包括我们反对它进入联合国)作某些基本的、也许是不愉快的改变。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本章的意思，即在增进战略核子力量对比的稳定性方面可能有许多工作可作。然而，并没有到达成功的简易道路。美国可以单独地通过行动作许多工作。如果其他国家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我们还可以作更多的工作。通过建立一致同意的国际监督和视察机构，可以作的可能还要多。但是在认真寻求稳定的决定中包含着严重的政策问题及其后果。如果我们决定坚决地走这条道路的话，看不到这些问题和以全力(如果可能的话，在事先)来处理这些问题，那就会犯错误。

#### 第四篇 威慑和反威慑战略的发展

军事战略的目的就是决定一个国家用什么方法用其武装力量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标。用最普通的话来

說，需要借助于軍事力量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第一，挫敗共产党企图夺取世界霸权的努力，第二，避免一場将使美国及其盟国遭受空前破坏威胁的核子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內，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明显和始終一貫地发展和采取一种軍事战略。在此时期內，这种战略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核威懾战略<sup>①</sup>，这表明美国广泛地依靠战略核子力量以支持其外交政策<sup>②</sup>。这里我們根据挑战和反应以及上述战后主要軍事技术发展情况来檢查这种战略的演变。

1949年8月苏联第一次爆炸了核武器，这暗含着有对美国进行核攻击的危險，核威懾战略就是为回答

① 这里須划清核威懾战略（即广泛地依賴核力量以支持外交政策）与战略威懾本身（即用来阻遏直接对美国进行核攻击的力量）之間的区别。所以要区别这一点的理由是，威懾本身不是一种战略，而是由于軍事力量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因此，一种战略威懾力量的产生出自一項战略决定，不过它仅代表一种战略的骨架而已。

② 对核威懾的理論基础、必要条件和所涉及的問題加以专门討論的著作包括：伯納德·布罗迪，“导弹时代的战略”（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特别是第8章；W. W. 考夫曼，“軍事政策与国家安全”中的“威懾的必要条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格倫·斯奈德，“靠否定和懲罰的威懾”，研究专論第1期（国际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1959年1月2日）；及艾伯特·沃耳斯提特，“微妙的恐怖平衡”，“外交季刊”第37卷第2期第211—234頁（1959年1月）。



这种威胁而发展的。在此以前，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处于一种变化不定的状态，为了调和美国人民要求减缓军事努力的愿望与由于共产党一贯欲染指欧洲和中东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其作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般都同意我们这个曾在两次大战中为阻止一个强国统治欧洲而战的國家，不能让紅軍达到为德国国防軍所沒有达到的目的。但是美国人民已厌倦战争，而且有资格减少军事紧张和牺牲。这些愿望由战后最初几年美国几乎是疯狂地进行军事力量的复員工作这一事实反映出来。

由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压力继续不断地增长，美国的战略反应自然是恢复在二次大战中被证明为有效的概念。这表现在：强调储存战略物资，成立国家安全资源局以筹划战争动员，尽力保持后备人力，其中包括普遍军训的建议。相应的战略概念为大大地依赖空軍、一支优势的海軍以及在任何含有战争威胁的危机中动员人力和物力的能力。

1948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就是这样的一次危机，这可以无疑地认为是战后初期共产党对美国力量的一次最严重的直接挑战。美国的回答是重新强调集体防御，从而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海外部署美国的核子空軍力量。

关于这个时期的战略优先权的定义，奧馬尔·布萊德雷已在他的1949年7月29日众院外交委员会的証

詞中作了明确規定。第一优先权給予“我們投擲炸彈的能力”，其后挨次为：使西方舰队能保持战争物資的运输暢通无阻，在欧洲大陆建立一支防御性的盟国地面部队的坚强核心，最后，由英国和法国提供空防和战术空軍。这是一种集体防御战略，其目的显然在于制止来自欧洲和欧洲內部的潜在侵略者。

1949年秋苏联宣布原子爆炸，这預示着要对这些概念作重大的修改。苏联的成就不但意味着对我們的盟国和海外基地的威胁将会很快地大大增加，而且，在几年內就会危害到美国本土的安全，这是过去一个多世紀所不存在的。由于后一种威胁，以及当时对积极防空体系的輕視，就使得建立一支强大的战略空軍力量在防御上具有最大的优先权。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反威胁的核报复力量，以便制止苏联作出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决定。

“威懾”今天已有了新的意义。过去，它的意思是指給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地面防御以这样一种支持，即一个沒有輕易获胜机会的侵略者，由于害怕美国战略空軍和盟国后备部队的干涉而不敢发动进攻。今天威懾的任务扩大到了劝阻敌人不要对美国本身发动一次全面的核攻击。人們假定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一种在数量上超过苏联的战略报复力量。因此，在核子攻击力量方面取得优势地位就成了国家的一个义务，正是由于这项义务而产生的巨大战略力量最后形

成了美国的战略，它在許多方面与最初防止直接攻击美国的任务有所不同。

然而，上述这一变化是強調的重点不同，而不是方向的变化。美国的政策仍然是如同 1951 年国务卿所說的一样，“在欧洲建立均衡的集体力量，它在我們的原子优势消失以后，仍能繼續防止侵略”。我們仍然坚信，我們的力量能成为有效的威胁力量，只要西方能以均衡的軍事力量来对抗共产党集团的話。这种力量是由一支高級的战略报复力量和一些較低級的力量所組成，后者在沒有得到含有自我毁灭危險的战略核报复力量的支持下，能够制止或击败欧洲和亚洲的侵略。1950年夏的南朝鮮事件有力地說明了非核子地面部队和战术空軍力量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同时还說明美国的軍事力量在这方面是严重不足的。

鉴于这种战略情景，美国在 1953 年和 1954 年采取了“新面貌”政策。那时，以日益增多的 B—36 和 B—47 型轰炸机和新式裂变武器为基础的战略空軍司令部的攻击力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国会和人民愈来愈对朝鮮战争的人力和物力損耗表示不滿，并对致力于似乎沒有成功或胜利把握的常規軍备一事，不能容忍。

提出一項新的战略并首先承担各种批評的責任落到了国务卿身上。1954年1月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在外交委員會会上所作的著名演說中宣布了一項基

本政策决定：“主要依靠用我們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在我們自己选择的地点立即进行报复的能力”。这暗示着已授权軍事当局在下述假定下制訂計劃：如果威懾失敗的話，美国就可以使用战略力量中的核武器，而不必只作为一种最后手段而尽量避免使用。

新的战略，虽然也像它的前身一样，是以“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为基础的，但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战略。国务卿本人曾指出“威懾力量”和“地区性防御力量”之間的显著差别。对地区性防御力量的依靠須让位于依賴威胁和在必要时使用战略核子反击力量（即大家所知道的“大規模报复”）。因此，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管他是否有意使用核武器，势将面临这样一种力量和意志，这种力量和意志对他的报复之大，将使他不可能希望所得会多于所失。

这种“新面貌”政策的宣布还标志着我国对集体防御态度的变化。我們对于盟国安全保証的性质已由一种用适合于地区性防御的力量增援受威胁盟国的諾言，变为一种在我們自己选择的地方用核武器懲罰侵略者的誓約了。新战略并没有排除地方性防御的必要性，后者的目的，如以后在談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时所解釋的，目前是要迫使敌人采取足够明显的侵略行动，以便扳动核报复的枪机(trigger the nuclear response)，防止敌人（希望如此）在美国核攻击奏效以前占領盟国。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新战略的演說中完全没有

提到苏联現有的和潜在的核子力量。他所以略掉这一点，也許是由于当时国务卿直接关心远东的緣故，在那里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增加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困难。还必须提到，像新战略的倡导者所明白指出的，新面貌政策在經濟上具有与軍事上同等重大的意义。

新战略的影响不久就明显地表現出来了。1953年4月，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上提出了一个“长期”准备的概念，接着降低了該成員国可望达到的軍力水平。1954年12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受权在一开头就使用原子武器的假定下制訂作战計劃；只有当核武器补偿了人数的不足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力才有可能与假想的敌人的軍力取得均衡。那时，这种武器是战略性的，它們的使用与否不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控制范围之内。我們的假定是，足以阻止苏联在欧洲进行軍事侵略的是美国的战略力量，而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地区性的防御。

因此，美国的軍事战略已由一种（至少在原則上）依靠地区性防御力量、不給予敌人輕易获胜的机会以阻止侵略者的战略，变为主要建立在装备核武器的战略力量基础上的威懾战略。就阻止苏联对美国进行直接攻击來說，一旦苏联取得了那种傳統意义上的防御无法抵抗的武器，美国除了保持核子报复威胁外，就没有其它的选择了。当时，在那种能阻止共产党进行这

一种侵略就能阻止它进行另一种侵略的錯誤假定下，新战略被扩大到包括旧式常規軍备的軍事侵略的威胁。但它也反映了一种要求建立和支持必要的战略力量的願望，把用于建立赋予地区性防禦战略以內容的战术力量的資金轉用到这一方面来。

可是不幸(至少可以这样說)，像核武器本身一样，作为战略威懾力量的副产物，我們所拥有的在自己选择的地点立即进行报复的能力，将被証明不再是西方的专利品。国务卿杜勒斯告訴我們說，东南亚集体防禦条約組織成員国将“主要依靠必要时能在任何地点打击侵略者的机动联合力量”。可是当他說这些話以后不过两个月，苏联就有十五架野牛式远距离噴气式轰炸机飞过莫斯科紅場，这表明苏联攻击美国国内目标的能力有了很大的进展。十五个月以后，美国人民从薛明頓委员会关于空軍力量的意見听取会中得知，苏联不久将以两倍于美国的速度生产噴气式轰炸机。

据信当时曾对战略空軍司令部所拥有的阻止对美国进行直接攻击的实际能力問題发生了爭論；战略空軍司令部司令李梅將軍說，由于不允許他首先发动进攻，他必須拥有数倍于苏联的战略力量，以便在苏联首先发动攻击后他仍有足够的报复力量。这个不久将为全國所接受的目标，要求我們拥有足够的轰炸机以便在回击中完成苏联在首先发动的攻击中可能完成的任务。

建立这样规模的一支力量，战略空军司令部就要大大增加发动首先攻击或回击的力量，从而增强运用核威慑战略来对付共产党在欧亚的侵略威胁的吸引力和明显的可能性。但是苏联核子力量的增长必然会限制战略空军司令部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从而降低了以使用战略空军司令部反击任何侵略（次于战略核战争的侵略）来进行威胁的威慑价值。从苏联的观点看来，这种起限制作用的影响可以称作“反威慑”。这种影响反映在1957年10月27日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说中，在这里，国务卿谈到共产党进行局部性侵略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应该有（请保守秘密）应付这种侵略而又不致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引起一场核子大战的能力”。

应该记住，核威慑战略所产生的阻止共产党一切形式侵略的可能性，在许多方面是我们阻止对美国进行直接攻击的努力的副产品，实质上，这是一种军事姿态所产生的额外效果。苏联也从他们自己所建立的战略力量中获得了“红利”，对这一点我们毫不感到惊奇。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当苏联总理挥舞他的火箭反对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时，就利用了这种红利。

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计划可以解释为该国要防御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海外基地所引起的“威胁”，可解释为反威慑计划中的中等射程武器。但一枚导弹所能指向的方向不止一个；它在和平时期所投下的阴影也不

止使一个国家的生活变得暗淡无色<sup>①</sup>。

“威懾”和“反威懾”力量或战略之間的区别在于敌对双方之間那一方具有軍事主动权。就美国的信念來說，它认为是苏联要进行侵略，因此美国軍事力量的目的是威懾，美国軍队的任务是使苏联相信进行侵略是得不到好处的。苏联的目的是要阻止美国使用其軍事力量，而且可能不顾美国提出的核报复威懾而保持其侵略行动的自由。

至少能解决他們軍事問題中的一个問題的办法将是建立这样一支战略力量，其軍力和性质足以使得当它进行非战略侵略时，美国战略空軍司令部所提出的报复威懾已不复可靠。如果他們获得了这样一支力量，并认为美国不会毫无理性地或自取灭亡地使用其战略核力量，那么，他們就会对抗美国广泛的威懾战略，重新在欧亚取得相当大的軍事行动自由。

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苏联战略力量的任务可能就是这种反威懾。最近发表的关于苏联战略的研究資料沒有透露与此相反的明显証据<sup>②</sup>。据說，即使在今

① 乔治·凯南的一句話：“軍备不但在战时的作用很重要，而且它在和平时期散布的心理影响也很重要。”見“俄国、原子和西方”（紐約哈潑兄弟书店 1957 年出版）第 93 頁。

② 見H·Z·迪納斯坦因，“战争与苏联”（紐約弗雷德里克·普雷格公司，1959年出版）；雷蒙德·L·加索夫，“苏联想像中的未来战争”（華盛頓公共事务出版社，1959年出版）；及艾謝尔·李，“苏联空軍与火箭部队”（紐約弗雷德里克·普雷格公司，1959年出版）。



天，苏联的观念仍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最后在地面上决定的痛苦的消耗战。他们的军事战略家似乎愈来愈强调突然袭击的重要性，但他们还没有像美国战略家一样，认为首先发动攻击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然而我们必须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的想法是会有变化的。此外，如果认为所发表的关于苏联战略的情报是最新的，或者甚至认为可以获得关于他们的意图的充分知识，那将会是最不智的。只可以这样说，战后苏联战略的演变，似乎较晚地走着和我们相同的道路。

当斯大林在世时，苏联的战略显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他的目的是在欧洲赢得一场地面战争的胜利，而且他一直确信，达到这个方法的方法是动员和依赖大规模现代化的但本质上是“常规的”陆军部队。苏联战略空军力量的发展由仿造我们的(公牛式)中程轰炸机开始，其后就大规模地生产(獾式)中程喷气轰炸机，它们显然对攻击西欧和北非的目标有用。在这个过渡时期，苏联没有出现与美国 B—36 型相当的洲际轰炸机，虽然很难说这是由于他们缺乏生产这类武器的能力，还是没有这种意图。在这个时期，对他们武装部队的教育充满了关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宣传和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疯狂敌意。简言之，在冷战初期西方的“防务”准备也同样强调防御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西方说来(对苏联更是如此)，这样的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军力不足以阻止敌对的核子力量，在一次首先

发动的攻击中破坏力也不大。

到 1954 年，苏联军事方面愈来愈认真地考虑核武器的效果，并开始重新估计突然袭击的重要性。可以这样假定，苏联对形势的估计（像我们一样）是由估价敌对力量所产生的威胁开始。不论他们考虑美国的力量（初具规模的战略轰炸机力量，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目标）还是考虑美国的意图（清楚地表现在对美国广泛的威慑战略的支持），对苏联进一步扩张其领土，甚至对它的安全来说，其前途似乎并不乐观。

苏联的反应是建立一个以前被忽略的空防体系、逐步加强民防训练计划、设法分散或隐蔽重要的工业和军事设施以及日益强调发展能到达美国境内目标战略武器。结果，苏联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战略空军力量，虽然它的规模和力量仍明显地不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因而，就它在大规模对等力量攻击中的实际破坏力来说，它更适合于借报复威胁以抵消我们的战略空军力量，而不宜用于反击力量的攻击。

差不多在苏联觉察到他们的力量能阻止美国使用其战略力量反对边缘的侵略，或确信美国会使用它的战略力量的同时，苏联的反威懾也开始影响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活动。英法在苏伊士问题上似乎认真考虑了赫鲁晓夫“搬运炸弹的声音”。如果苏联的核子力量还停留在 1953 年的水平，美国恐怕不会像它所作的那样矢口否认有干涉匈牙利事变的任何意图。美国在“愈

罰”一个自身具有大规模报复能力的敌手时所可能遭受的损害面前，它的核子威懾战略开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现在核子保证至少已从某些边缘地区暗暗地取消了，因为不值得再为这些地区的安全而冒核战争的危險。仍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阻止或抵御具有更大挑衅性的、将会影响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略。这里，特别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來說，除了愈来愈沒有把握地依靠尚待发展的战略核子威懾外，沒有其他滿意的办法。这一部分是因为过去过份依賴核报复威胁，以致妨碍了其他軍事力量的发展，一部分也是因为在战略核力量增长的同时（至少美国是如此），适合于阻遏和反击小于全面侵略的力量相对地削弱了。

由于沒有其他有效的办法来代替广泛的核威懾战略，美国軍事力量和迄今为止指导这种軍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的严重局限性与弱点显得更加突出了。我們現在就要轉到核威懾危机这个问题去。

## 第五篇 战略核威懾的危机

### 一、引言

美国在冷战中的軍事政策主要不是进行战争与赢得战争，而是阻止中苏集团对美国或它的盟国进行侵

略；因此重点理应放在威懾战略上。虽然今天对威懾的目标本身沒有怀疑，可是在目前与可以預見的情况下，如何能达到这种目标已成为严重問題。說得具体些，我們所大大依賴的战略部队的威懾价值，由于苏联战略力量的增强而日益縮小。前一章評論过的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中苏可能采取的小規模侵略行动，威胁着我們海外盟国的安全，而且，至少在一短时期內，大大增加了苏联向美国大陆进攻的危險。

如果美国对核子的壟断以及核彈头与发射工具的大量供应还繼續存在的话，美国核子威懾的可靠性今天就不会受到怀疑。美国与它的盟国就会仍然相信，为回答苏联任何严重侵略而向苏联城市进行大規模报复的威胁是既可靠而又有效的。而作为一個核子壟断者，美国也就不会害怕由于打击了能进行同样报复的对手而招致的自我毀灭的后果。

苏联拥有核子打击力量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現在，除非能十分有把握地預料到对敌方战略力量的打击差不多全部有效，首先使用战略力量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肯定自身将避免遭受核武器的打击。如果一方取得这样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反击力量，它就能使用它的战略力量打击它的敌人而取得或重新取得壟断者的地位。

鉴于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不可推測的，不能排斥美国或苏联将来拥有这种毀灭性打击能力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看来，美国或苏联的力量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由于一种反击能力所需力量与维持报复能力所需力量之间的差别，要获得这种反击能力是会有困难的<sup>①</sup>。

然而，美国或苏联却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即敌对一方也许会有一天采取非彻底性打击的办法解决问题，理性地或失去理性地甘愿向敌人的报复力量发动攻击，以减轻在敌人回击中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可以想像，例如，一方或另一方也许认为，一旦敌人发动的首先打击迫在眉前，宁愿忍受非常严重的损失，也不愿遭受这种打击的危险。

## 二、对付苏联进攻美国战略力量 或其盟国的威慑力量

为了澄清有关美国军事战略的一些问题，对付苏联全面进攻——包括对美国及其战略力量的进攻——的威慑，必须与对付局限于地区或手段受限制的较小规模的进攻的威慑分别对待，因为二者都是意外事件，都会使美国报复力量在苏联对美国战略力量首先进行攻击中即或不被摧毁也会受到严重破坏。

鉴于假定的美苏导弹能力的悬殊，必须在未来的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三章(四)、(六)两节。

數年中嚴重地注意苏联向战略空軍司令部进行突然攻击的危險。至少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有人駕駛的轰炸机組成的和設置在地面上的和未加隱蔽的基地上的美国报复力量仍将非常容易受到这种攻击；而且这种弱点将因日益强大而准确的远程導彈成为苏联战略力量主要組成部分而更趨突出，因此，显然，防禦苏联首先进攻确保美国安全的办法，不是依靠仍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战略空軍司令部未投入战斗前的实力，而在于美国防禦核子进攻的安全程度如何。

只有确实可靠的、足以使苏联感到不能經受其毁灭潜力的回击或报复能力，才能对苏联向美国大陆及其海外盟国的攻击提供一种相对有效的威懾力量。

美国战略力量对苏联核进攻的威懾价值可能不会突然减少。即使是数量較少的殘存的轰炸机，配备以重型核武器并有侵入其目标区的能力，也会成为严重的报复性的毁灭力量而威胁敌人。此外，美国拥有各种不同的发射体系，包括飞机与導彈。我們不应夸大導彈差距时期的危險。

但是，我們虽不应夸大導彈差距时期的危險，也不能輕易低估这种危險。威懾力量不是永远完全可靠的。不能确定在苏联的估計中相当数量的战略空軍司令部的轰炸机会逃避毁灭，或到达它們的目标，或造成在某种情况下被苏联认为是不能承受的損害。

另一种考虑也影响对威懾效力的看法。應該回想

一下，回击或报复能力必须执行两种任务：第一，遏止全面战略进攻；第二，如果发生战争，就把对敌人力量的破坏增加到最大限度，并尽可能把受害者在随之而来的战略交锋中所遭受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任务为回击力量提出了互相抵触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矛盾的目标战略(target strategies)。

因为侵略者的力量必须力求在一次反击力量的打击中摧毁对方的战略力量，受害的一方在进行报复性的回击时可以有三种选择：(1)反击那些还未参加作战的敌人战略力量及具有特别重大军事意义的其他目标(即交通中心、空防中心、战略空军基地、炼油厂与仓库以及易受损害的工业目标<sup>①</sup>)；(2)进行纯粹恐怖性的或轰炸城市的攻击<sup>②</sup>；(3)把两种目标战略结合起来的战略。

在攻击后的情况下(当威慑已宣告失败的时候)，战略(1)具有很大的军事意义，因为它力求把在首先攻击中受害的一方在侵略以后的攻击中所可能遭受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用执行这种战略来威胁

---

① 参看空军部长詹姆斯·道格拉斯 1959年2月19日在众议院关于196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意见听取会上的证词，第1部分，第928—929页。

② 战略(1)和战略(2)当然是理论上的极端，提出来用作讨论参考。实际上，反击力量的攻击用爆炸、热能和放射性微尘破坏非军事性目标，而破坏城市的攻击将消灭那些在目标城市中或靠近目标城市的军事设施。

敌人的威懾效用可能是极小的，特别是在敌人的战略力量与其主要非军事設施和工业設施被隔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在战争中対这种战略的实际执行，可能由于敌对一方的积极和消极的防御，由于假的或不充分的关于目标的情报，由于缺乏有价值的目标（敌人最危险的武器会已经被使用过），以及最后，由于回击的力量本身規模縮小，而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破坏城市的威胁有时被称为有限的或最低限度威懾的威胁，战略（2）似乎是更为有效的威懾，因为它可以使进攻的国家遭受一种高度的不加区别的全面破坏。虽然如此，它还不能成为一种可靠的威懾力量，因为，在首先进攻中受害的一方可能极不愿意招致对它自己城市的不断襲击，而这种襲击必然会随之而来，如果它只是襲击侵略者的非军事目标而对留下的战略力量絲毫未动。这种战略的可能結果会是一场敌人占上風的破坏城市的襲击<sup>①</sup>。

某些权威人士曾以这种理由怀疑最低限度威懾的战略所具有的威懾价值。他們指出，如果苏联人确信他們能在首先发动的攻击中有效地击中美国军事目标，而尽可能不伤害美国人民的话，他們也很可能怀疑美国轰炸城市的报复性威胁的可靠性<sup>②</sup>。对苏联居民

① 見布罗迪所著“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中討論回击战略部分，特别是第289—294頁。

② 參看理查德·萊格浩思所作“无需轰炸城市以贏得战争”一文，載于1955年1月28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



中心进行报复性威胁会招致苏联反报复，因而这将是一种没有效用的战略；而且鉴于美国和苏联民防准备程度的差别日益加大，这种战略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尽管如此，看来苏联还不会轻易地对美国意图作冒险的错误估计。不论轰炸城市的报复战略如何的不当，美国在受到首先攻击时，由于来不及修改它的战略计划，也很可能立即用剩下的全部战略力量袭击所能击中的苏联城市。如果美国必须使用威慑力量，回击的准备与决定应当保持到最后一分钟。

最后，用于回击的战略(3)，是把反击力量与城市轰炸的战略二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战略。由于在这样的回击中很难准确地区别非军事与军事目标，实际上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种战略。如怀特将军所说的：

“回击的任务将是……集中力量破坏苏联残存的军事攻击力量，使苏联全国遭受最大可能的损害。”<sup>①</sup>虽然如此，为了充分体现这种攻击的军事价值与尽可能地减少对居民的危险，我们能够而且也应当作出重大努力在条件许可下尽可能把我们的报复攻击的矛头指向敌人的战略力量与目标。

如前所述<sup>②</sup>，“恐怖平衡”在这种意义上的确是存

① 美国空军参谋长汤姆斯·怀特 1959年2月19日在众议院关于196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意见听取会上的证词第1部分。

② 参看本书第三篇第一章(二)节。

在的，即双方都不会理性地由于故意轰炸城市或进行恐怖攻击而发动战争，而对敌方的战略力量则丝毫不予触动。虽然如此，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核战争的过程中，对城市的攻击或者作为一种报复行动，或者作为反击力量作战的副产物，或者由于战略错误而发生。这就为下面这种看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即用于完成民防措施所需要的费用和付出的努力会被证明是值得的。

在我们所说的核导弹武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中，尤其是在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战略空军司令部将继续着重地依靠易受导弹攻击的有人驾驶轰炸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忽视苏联对美国大陆发动首先攻击的可能性。在这个时期中，除非在有效监督军备问题上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战略均势就将出现高度的不稳定。当然，不可能预料，苏联人在他们认为由于其导弹领先而已具有突然攻击能力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否会利用这种优势。如果他们预见到这种优势结束得早，他们也许会冒着不利于这种进攻的危险而发动攻击。或者由于他们害怕美国会为了遏止其军事地位进一步严重削弱而首先攻击，他们可能想要在还没有具备确实有效的发动首先攻击能力以前就利用他们的领先地位发动攻击<sup>①</sup>。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篇第五章(四)节，在那里曾把这些趋向于发动战争的压力作为不稳定的时间根源加以讨论。

目前战略平衡中高度的不稳定基于下述信念而被怀有希望地称做“暂时性的”不稳定，即在美国获得数量上占优势的和类型繁多的极不容易攻破的导弹报复力量时，导弹差距的危险即将消失。一旦美国获得这样的报复力量，有计划地对美国战略力量及其盟国发动首先攻击的危险将大大减少，而美国战略威慑力量也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赖。然而，必须着重指出，有利于攻击的新技术的发展或美国为保持加以适当防护的有效的回击能力所作的努力松了劲，都能使美国的报复力量失去反击的能力。因为技术将不断发展，并且还可能是加速度进行，为了保持这种有效的威慑力量，就必须不断地进行代价巨大的努力。需要努力的程度以及它所采取的方式，将大部取决于我们对苏联在未来十年内反击能力的规模与质量的估计。

### 三、对付苏联进攻美国海外 盟国的威慑力量

现在我们转过来研究由于苏联战略能力日益增长而造成的第二种危险，这就是美国战略核威力日益减小，这种威力是遏止对海外自由世界进行侵略或抑制对美国海外重大利益进行其他侵犯的威慑力量。

在过去美国核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战略空军司令部可以用它的战略干预的威胁，在欧亚边缘国家地

区展开一个“核保护伞”，但是現在，由于苏联战略反威懾力量的出現，美国威胁力量的可靠性正在受到怀疑，而且就作为一种有助于保护我們海外盟国的适当工具來說，美国威懾力量的作用已被証明是有限的，如在用于对付几乎是更为严重和更为明显的中苏侵略时所表現的。

为了具有对付海外侵略的可靠威懾力量，美国將必須拥有一种对苏联进行首先攻击的能力，这种能力可望把苏联向美国所作的反报复减少到可以忍受的程度。这种先决条件提出两个严重問題。第一，就所需要的導彈数目來說，在導彈时代要想取得这样一种反击能力是不实际的；第二，为取得这种能力所需要的努力將大大增加战略力量对比中的不稳定性，从而也增加了全面核子战争爆发的危險。

如上面一章所指出的，保持有效的反击能力不但需要有与苏联匹敌的導彈力量，而且还需要积累的導彈数目大大超过苏联的发射地点。至少是从第一代導彈的情况来看，准确性、可靠性与彈头威力都还差，在不同的情况下須用六枚到六十枚導彈才能毀掉敌人一个发射場。虽然这种不相称的比例将会因核彈头与導彈准确性的改进而减少，然而在軍事目标設在地下的或机动的情况下，導彈对目标的比例不可能达到一比一。

如果苏联繼續照它現在的方式只建立一种反威懾

力量，我們努力获取适当的战略反击能力将仍是切实可行的。苏联轰炸机队的有限規模以及赫魯曉夫先生最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說苏联已拥有为实行其战略所需要的導彈<sup>①</sup>，都說明这个是苏联今天的目标。虽然如此，美国可不能信賴这种对苏联的意图所作的令人安心的估計，同时美国也不能假定苏联力量发展的目标在以后不会增多。如果苏联利用他們被假定的生产远程導彈的能力，他們就可以在几年內拥有一支龐大的报复力量。因此，从美国導彈数目以及所获得的关于目标的情报的数量与质量來說，企图建立一种能“毁灭”苏联报复力量或使之陷于瘫痪的力量不仅在費用上办不到，而且也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目的仅仅是建立一种适度的反击力量，那将无助于加强我們战略力量对付中苏向我們盟国进行侵略的威懾效力，虽然这样一种水平的反击能力对于我們将在后面討論的一些目的來說是有用的<sup>②</sup>。用这种反击力量向苏联进行无效的首先攻击的威胁，将会招致苏联报复力量的严重打击，因而这种威胁并不比襲击苏联城市的威胁更为可靠。在到达首先攻击能力的道路上是

① 見他在1959年5月11日在基輔的演說。他說：“我們有好的火箭，而且有必要的数量。我們正在生产更多的火箭，但是我們认为我們不需要那样多。也許不久我們开始减少火箭的生产，这不是讓我們談像黄瓜那样东西，你摘下来后所要做的是把它吃掉。火箭是微妙的东西。”

② 參看本篇最后一节。

沒有中途站的，而技術發展的趨勢與加強報復力量的競賽阻礙達到這一目的。此外，克服這些困難的任何企圖幾乎必然會引起盤旋上升的和開支特別浩大的軍備競賽。

取得戰略威懾力量的第二種困難是繼續發展反擊能力與尽可能減少全面核子戰爭危險這兩個目標之間的矛盾。美國已經按照目前所採取的威懾戰略，用顯然是、而且在有些情況下完全適合於進行首先攻擊的反擊力量把它的部隊裝備起來，其中包括中程轟炸機，並配備以設置在前進基地的中程導彈，這二者都很容易受到攻擊，因而更適合於首先攻擊而不適合於回擊。目前美國戰略力量由於具有這些特點，事實上可能會被蘇聯人認為是美國“侵略”意圖的證據。因此一旦他們具有適當的反擊能力，僅僅是這樣一種性質的戰略力量，就會誘使他們用這種力量進行預防性的攻擊。同樣，旨在用於首先攻擊的蘇聯力量的建立，會被美國認為是挑釁，因而也同樣會導致戰略力量對比的高度不穩定。

蘇聯的反威懾力量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美國戰略干預的威脅已經失去、或者可能失去它對付中蘇在歐亞邊緣地區（尤其是在對美國有重大利益的地區）發動任何侵略的全部威懾價值。恰恰相反，實際上，阻止蘇聯對盟國進行核襲擊的首先發動報復性攻擊的威脅，與對付蘇聯攻擊美國本身的戰略報復的威脅是同樣可

以信賴的。苏联在这样一种襲击中所作的冒險，將超出一切理性限制，因为如果不伤害美国，苏联將使战略空軍司令部完整无损，从而使它能够使用它的战斗前的全部力量进行报复。即使战略空軍司令部的报复仍使苏联保有反过来对美国造成严重損害的能力，然而战略空軍司令部完成其报复性威胁以抑制苏联对美国盟国进行核子攻击的可能性應該还是很大的。

因此这些盟国，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国沒有理由害怕核子僵局会使美国与苏联成为未来战争中的圣地，而听任自由世界其他国家遭受苏联核子攻击。相反地，这些国家也同样会在这样一种僵局中受到保护而不致遭受战略核子侵略。

在对付其他較小規模的侵略时，美国核威懾力量的可靠性由于苏联反威懾力量的增强而日趋减少，因而將成为执行退止政策的不大可靠和不大适当的工具，这种退止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护海外国家避免遭受战略核攻击水平以下的一切可能形式的侵略。中苏对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胁形式包括从封鎖柏林或捷克类型的顛复活动等非軍事行动到使用大量常規部队的侵略。

現在已普遍承认：“大規模报复”的威胁不适用于对边缘地区的侵略或間接侵略。鉴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威胁行动得不偿失，人們不一定能指望战略空軍司令部进行干預以威胁对方。

然而，在对自由世界边缘地区的威胁与苏联向美国和他的盟国所进行的核攻击之间，还存在着中苏可能进行挑衅的广大“中间地区”，而就是在这—地区，美国的战略干预是否可靠而明智成为大家严重关心的問題。这些怀疑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产生的：除了美国战略力量外，目前还没有保护我们海外盟国的其他现实的办法。

要說美国战略干预对这一中间地区已失去所有威懾价值，那是过于悲观的說法。美国干预的决心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这种决心曾由我国官方与非官方人士着重申述过。不論美国的干预是否适当，苏联政府永不能肯定这种干预将不会发生。因为苏联永不能确定什么程度的侵略会引起美国的战略报复，所以苏联只要犯“中间地区”侵略行为中的一种，就要冒使大量战略力量与許多城市遭受毁灭的危险。苏联是否会认为在这种攻击中所希望取得的东西超过所招致的危险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意义上，美国意图与反应的不明确，对中苏扩张主义的野心继续起着有价值的威懾作用。

虽然如此，美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仍然是危险的，只要它们必须主要地依靠这种形式的威懾效用。的确，如果这种威懾不能起抑制作用的话，其后果将是严重的。如果苏联人认为这种威胁只是一种恫吓，如果苏联人对他们在边缘地区可以安全进行的侵略形式的限



度作出錯誤判断，或者如果他們不顾威胁而进行攻击——失去理性地或疯狂地，出于强烈挑衅动机地或絕望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被迫选择：让它的盟国遭受共产主义集团军队蹂躪，或者采取行动从而很可能使美国大部分地区受到核子破坏。

这些情况的不安定与危險，将必然随着日益增强的苏联战略力量减少美国威懾力量的可靠程度，而日趋增加。因此，建立一支更为可靠的对付中苏有限攻击的威懾力量，与建立現在美国战略力量不能提供的自我毁灭性較小的防御，这对于美国与它的盟国双方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事实上，如果找不到其他軍事办法，美国外交政策所依靠的美国集体防御体系的支柱将严重地削弱，而美国只有最后絕望地退縮和孤立于美国堡垒之中。

#### 四、代替美国战略威懾力量的办法

##### (一) 独立的盟国战略力

这里应该提到作为权宜之計的加强盟国当地部队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已在英法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在較小程度上受到欧洲其它国家的重視。有人說，独立的盟国战略核子力量比战略空軍司令部有更大的威懾价值，因为在边缘地区国家受到攻击时，它們无疑将进

行干預<sup>①</sup>。然而，这种主張是否妥当是大可怀疑的。很难理解，这些独立的但又必然是非常弱小的战略力量，如何能够提供现在美国战略力量还不能提供的任何值得重視的威懾效力。相当少的核彈与运載工具（如英国所拥有的，并为法国和其他国家所希望取得的）最多只能支持“最低限度的威懾战略”，它的威胁作用只是向苏联城市进行恐怖攻击，而不能向苏联战略力量进行反击。但是，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如果連对美国或苏联所进行的城市轰炸的威胁（除了对付核攻击的情况外）还缺乏信賴的話，那么就更难相信，受到常規部队攻击的国家将会进行那种只能破坏少数苏联城市而却必然引起使自己大部份都市中心遭受毁灭的輪番轰炸。如果一个欧洲国家受到核武器的攻击，那就不但令人怀疑它的微小的战略力量究竟能否繼續存在与能否进行报复，而且除非同时向战略空軍司令部进攻，这种攻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而对战略空軍司令部的攻击則将引起美国的报复行动，其破坏能力远非欧洲国家所能提供<sup>②</sup>。

## （二）非战略部队

如果认为保持美国首先攻击的反击能力是不可能

① 見第21卷第6期“报导者”杂志(1959年10月15日)第28—30頁阿拉斯大·布賽所写“所需要的：一种欧洲威懾力量”一文中关于欧洲支持这一办法的討論。

的或者不合理的目标，那么美国战略核子力量作为一种对付中苏向我们海外盟国进行有限侵略的威懾力量，将大大失去它的有效作用。同时，如果美国的回击能继续成为对付苏联首先攻击的有效威懾力量，那么就将在战略上出现一种核子僵局，或一种比较稳定的相互威懾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双方将都不会认为首先发动战略核战争是合理的军事政策，不论是为了对付非核攻击或是为了侵略目的，也不论是在美苏之间进行战争或是为了保卫它们的盟国。

必须强调指出，这种僵局不能保证防止偶发性战争或一般战争。这种战略僵局非但不能阻止或制止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反而会鼓励侵略国家使用其占优势的非战略军事力量，追求它们不用武力就不能达到的目标。因此，除非核子僵局或相互威懾状态扩大到非战略方面，苏联在这方面的优势将成为对我们海外盟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此外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也是爆发战争并使战争“全面化”（尽管在开始时是有限度的）

- ② 罗杰尔·希尔斯曼在他的“责任的转移”（载于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 1958 年出版的“东西方会谈”第 19—27 页）一文中指出，虽然把核武器扩大到更多的国家显然是危险的，可是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他说，美国不应该反对它的盟国发展核武器，而应该设法引导这些计划向有用的目的发展。文章指出，如果美国供给它的盟国以核武器，由此而引起的核子力量与责任的转移将会带来较目前依赖关系更加稳定和更令人满意的联盟内部的分工。

的可能根源。

不應該低估目前美国及其盟国的非战略能力。在一些小規模战争中——甚至像朝鮮战争那样大規模的战争中，部署在本地或冲突地区附近的西方軍事力量，在其它地区的武力或以后动員起来的后备力量支援之下，可以对抗共产党的非核攻击。又如在金門，看来那里的防御力量是足够的，而且也不需要美国战略干預的威胁，無論这种威胁对于一个无力进行核报复的国家是多么可靠。

但是，如果許多較小規模的攻击沿鉄幕与竹幕边缘地区的广大分散地点同时发动，美国与盟国的力量能否对抗共产党同样的威胁，可能就成問題了。这样的情况将会很容易对为数不大的美国現有后备力量以及用以补充盟国与海外美国部队的微小的美国空軍能力提出过多的要求。

今天美国和它的盟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問題是，如何保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地区，使其避免苏联攻击，这些攻击可能是有限的或意图不明的从而不致引起美国的战略干預，也可能会——如果真地引起美国战略干預的話——引起不幸的后果。如我們所已看到的，美国战略打击力量的存在，給苏联对西欧进行的攻击規模（如果它不是同时对美国战略力量发动攻击的話）規定了一个最高限度。

直到目前，苏联常規軍力具有絕對优势的潜力的

情况，一直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鼓不起勇气建立一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盾”来弥补这种不平衡<sup>①</sup>。只要欧洲对美国的“全面的威懾力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劍”）保持不动搖的信心，就难有推动这种努力的刺激力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設計者也认为用当地力量建立可以阻止苏联軍隊蹂躪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盾，并不是不能实行的，但这种看法是在美国将进行战略干預并将使苏联增授作战部队繼續战争的能力陷于瘫痪这一假定上得出的。早期建立这个盾的力量目标据 1952 年里斯本會議的规划是九十六个师，但由于西欧政治、心理、經濟方面的障碍，不久就放棄了这个目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 1954 年就轉到用可望花錢較少的战术核武器来代替无法得到的地面常規师团<sup>②</sup>。当时认为这些武器会构成足够的火力以抵禦数量上占优势的苏联地面部队的进攻力量<sup>③</sup>。

- 
- ① 見阿諾德·渥弗斯：“欧洲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盾”（載“国际組織”第 7 卷第 4 期第 425—439 頁，1958 年秋出版）。
- ② 目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中欧的兵力（不包括希腊和土耳其）据估計約二十一又三分之一作好战斗准备的师，虽然由于对构成作好战斗准备的师的解釋不同，这一估計可能偏高。
- ③ 通常估計苏联軍事力量保持一百七十五个师，其中有一百四十个师是作好战斗准备的。在这一百四十个师中，有八十个师駐在俄国西部；有二十个机械化师、两个炮兵师和八个高射炮师据說駐在东德。其余的师分駐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此外还必须加上卫星国家的四十四个师，但它們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決定着重地依靠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一举是否明智，已引起严重怀疑。正如美国与苏联军事当局所已指出的，由于在战术核战争中会很快地造成极大伤亡，这种战争所需要的人力不是较少而是较多。从这一角度来看，一支小规模的配备有战术核武器的防御部队能否抵御一支较大的有同样装备的军队，是令人怀疑的。无论如何，欧洲人民正在意识到，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战术核子战争，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所要保卫的许多地区消灭掉。

如前面所提到的，可以想见，根据默契或作为国际军备监督计划的一部分，下面这一建议可能会得到普遍支持：在侵略中受害的一方在自己本土与空间单方面地使用核武器进行防御是允许的，而侵略者则不得用核武器还击<sup>①</sup>。

在目前情况下，看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盾对付苏联非核攻击所需要的战术核武器，要比阻止苏联使用战术核武器进攻所需要者为少。双方都持有这种武器，将大大增加把相互威懾状态扩大到欧洲的战术核力量方面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地面常规部队在数量上的巨大优越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在欧洲以及在美国，普遍地认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无论财政上、政治上或心理上都无法维持不了具有双重目的的军事力量（既能进行核子战争又能进行常规战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篇第六章(三)节。

爭)，其力量足以抑制或在必要时制止苏联“压倒优势的力量”席卷欧洲。有人辩称，欧洲要么就受到美国或欧洲战略威懾力量的保护，要么就听命于苏联的力量与意图，任其摆布。然而，尽管战略核子力量的威懾价值日益减小，上面这种提法是否是失败主义者过份悲观的論調，是值得怀疑的。

如在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苏联真的蓄意向西欧进行常规的军事攻击，那么这种攻击的规模越大，它冒美国战略干預的危险也将越大。因此，看来苏联可能不敢出动駐守在铁幕与烏拉尔山之間的大量军队进攻西欧，这种形式的进攻将几乎肯定会引起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干預。这种全面的威懾力量仍然在起着阻止向西欧进行几乎更为有限的或意图更不明确的军事进攻的作用。

真正的危险不是由于苏联用大量军队进行侵略而产生的威胁，而是来自苏联用现在部署在铁幕附近的军队、尤其是用駐在东德的作好战斗准备和配备良好的二十二个师进行突然襲击的威胁。尽管有一些不利条件，預料苏联有可能作孤注一擲，认为在这样的攻击中，它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以致使美国在事后对发动可能使自己遭受严重破坏后果的报复性打击有所躊躇。另一种危险是由苏联的非军事的行动引起的，像对柏林的封鎖，看来似乎不会用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来对付这种行动。在上述两种情况以及

在其他类似的偶然事件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不会面对或者必須对抗苏联的“压倒优势的力量”。

根据这些考虑来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在欧洲的最高統帥諾斯塔德將軍所提出的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盾至少需要三十个师的要求是合理的。假定能把这些师訓練与装备成为可以执行双重目的的軍事力量，他們就應該能够抵抗目前駐东德的二十二个师以及部署在邻近国家的其他苏联部队的进攻。但是，在这种作战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还應該能够依靠远較現在为多的随时可以使用的后备力量的补充供应。

建立由充分的随时可用的后备力量支持的三十个师的盾的力量，不能认为是超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目前的經濟力量。实现諾斯塔德將軍目标的主要障碍是心理上的障碍。这一部分是由于欧洲一直希望由美国战略力量負責保卫，一部分是由于他們认为欧洲战略威懾力量发展了，就不需要再有較大的盾的力量了。最后，是由于在欧洲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怀疑除了核武器以外是否有可能对抗苏联数量上的优势。

这种怀疑論的理由正确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美国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因为美国非常关心在欧洲以及在苏联集团周圍其他地区建立足够的地区性防御力量。如果欧洲的怀疑論在这一方面站不住脚，就應該予以清除。为此，我們就必須进一步考察研究适宜



于地区性和区域性战争的技术上改进了的东西，如“地面有效”部队与武器运载工具以及前面讨论过的轻型反坦克导弹。如果集中力量发展这一类武器的能力，就会大大有助于抵消苏联数量上的优势与机械化的强大力量。

最近，在美国与国外，军事思想上与形势分析上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对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和由于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越来越注意<sup>①</sup>。虽然这些问题是严重的，直接的，并应予以认真考虑的，但我们还是应该用更大的努力去研究被忽视了的有关非核军备与战争的问题以及加强常规防御部队与战术效果的方法。在发生非核子战争时，如果发现自由世界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准备所依据的主要是过去战争的武器、战术与经验，而没有充分利用非核战争方面一切新的技术条件，这将是一种不幸。

我们不应该根据战术核武器能弥补其他方面的军事弱点这一假定而忽视这些可能性。如前面所谈到的，认为战术核武器可以补偿数量上的劣势，或甚至认为使用这种武器将有利于陆上战争中的防御等说法，都是很难成立的。

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之间，或战术目标与战

---

<sup>①</sup> 参看詹姆斯·金氏所写“大量核武器与有限战争”一文中关于在核子时代进行常规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的讨论。该文载于“外交季刊”第35卷第2期(1957年1月)，第233—256页。

略目标之間，沒有明确的區別，因而战术核子战争有可能很快地轉化为我們所要避免的全面核子战争的真正危險<sup>①</sup>。此外，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区，在那里首先发动任何形式的核子战争，将給美国带来政治上与心理上的严重后果。

即使战术核战争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显然对我們有利，这种战争——如現在所看到的——将需要在軍事运输、交通、目标偵察方面具有高度能力以及其他“常規”作战能力。

### 五、保持适当的反击能力

据指出，战略力量日益增强的不可摧毁性以及把战略平衡的不稳定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願望，也能导致美国——可能还有苏联——放棄首先攻击的反击能力。但是，保持某种程度的反击能力对其他目的还是有用的，而且放棄首先攻击竞赛的决定并不会消灭所有美国的反击能力，因为作为报复性的回击所需能力的一些武器与投擲体系将足够准确而有效地完成反击与恐怖攻击的任务<sup>②</sup>。

---

<sup>①</sup> 見汉森·鮑德溫所作“有限战争”一文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討論。該文載于1959年5月“大西洋”月刊，第35—43頁。鮑德溫指出，假象的核子战争的发展趋向是：开始时使用少数核武器，但很快地就轉到使用更多的更有威力的核武器以保証毁灭重要目标。

現在有下面几种理由，认为即使放棄建立一支有效的首先攻击的力量，目前所作的維持反击能力的努力还是要繼續下去。

第一，一旦爆发战争，即使是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如果美国沒有打击敌人战略力量的手段而敌人却拥有相当的反击能力，这将严重妨碍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作出选择。例如在局限于中东或亚洲的战争中，即使最高战略方面的相互威慑力量防止了反击力量的全面攻击，一种在局部地区內摧毁战略目标的能力还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在发生了全面的战略核战争而美国是首先攻击的受害者一方的情况下，美国回击力量的反击能力将能使美国进行有益的军事行动，而尽可能減輕继首先攻击而来的苏联战略打击可能对美国居民与工业城市所造成的損害。

第三，有充份的理由认为，只有在反击力量的武器領域內繼續努力研究才能使美国得到一定保証，防止

- 
- ② 要求現代战略武器体系起更大的作用就会使它們在这方面的灵活性受到限制。虽然这些体系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武器如有人駕駛的轰炸机，能很准确地向軍事目标点投擲热核武器，而目前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導彈却不能如此。机动的或加强地下隱蔽的1960年代的固体燃料導彈如“北极星式”与“民兵式”，其准确性或破坏能力現在还不能指望达到反击任务所要求的程度。此外，洲际導彈只能用于攻击那些在发射前已将其所在地点相当准确地計算好了的目标。

无法預料的苏联武器的发展推翻战略上的平衡局面。

最后，有人认为美国保持即使是不多的反击力量的武器，将迫使苏联把用于建立有效的首先攻击力量的基金，轉用于大力保卫它現有的战略力量。据說，沒有这种压力，苏联将能集中力量发展反击力量，而可以比較容易地突破核僵局。但是，反对这种論証的，可以这样认为，由于追求反击能力的一方，一定要花数倍于敌人在使战略报复力量不易攻破的防御上面所用的錢，开支的比例有利于防御而不利于进攻。因此，如果美国利用这种比例的有利条件，集中力量保护其回击力量而不专门追求用于首先攻击的反击能力，这就会迫使苏联要么放棄战胜美国报复能力的希望，要么就冒使财力陷于枯竭并在这场竞赛中可能失敗的危險。

总之，由于美国战略力量的威懾价值减小而造成的危急局势——这也是技术发展与相应的战略平衡发生变化的結果——要求美国与它的盟国在軍事上作新的努力。如果作了新的努力，而且作得及时，就可不必考虑修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或放棄目前作为达到这些基本目标的先决条件的結盟政策。相反地，这样一种期待并不是过分的乐观：只要美国用可靠的报复性导彈力量把自己武装起来，并和它的盟国一起建立一支由随时可以調用的后备力量所支持的能执行双重任务的防御力量，那么就可以确保一个相当稳定的战略核僵局和足以对付非战略侵略的防御力量。

## 附 录

研究题目：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负责研究机构：华盛顿首府佛罗里达大街〔西北〕一九〇六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

提交报告日期：1959年9月15日。

目的——本报告将主要研究军事能力、战略原则和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它将探讨在今后十年的军事技术发展方面能彻底改变世界军事力量平衡的各种因素，以及这种改变同军事战略原则和外交政策的关系。

### 研究大纲

一、主要研究结果摘要

二、结论和建议

三、报告正文

(一)总论：技术发展、军事力量、战略原则和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特别着重阐明技术因素的作用。

(二)美国国防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和国外义

务。

1. 从整个美国外交政策来看冷战。

(1) 防御的首要性。

(2) 防御的军事成份。

(3) 本国基地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防御(“与人协作”的政策)。

2. 美国国外军事义务的范围。

(1) 集体防御和单方面的保证。

(2) 联合国宪章下的集体安全。

3. 重大的战略因素。

(1) 美国战略的全球性。

(2) 把美国力量投向欧亚地区的问题。

(3) 军备竞赛和技术竞赛的挑战。

(三) 技术发展和世界军事力量的平衡。

1. 军事技术的几个时代。

(1) 常规武器时代。

(2) 核武器时代。

(3) 核导弹时代。

(4) 新时代展望。

2. 军事力量平衡中的技术和非技术因素。

3. 世界军事力量平衡的情况。

(1) 美国的核垄断。

(2) 美国的核优势。

(3) “恐怖平衡”和防御的不平衡。

(4) 将来在平衡方面的可能变化。

4. 近年和将来的重大技术变化。

(1) 技术和核攻击力量。

(2) 技术和战术力量。

(3) 技术和外空作战。

(4) 技术和防空。

(四) 视技术发展情况而定的美国战略原则。

1. 威懾和防御的觀念。

2. 当前的原則和对立意見。

(1) 威懾与防御。

(2) 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和报复战略。

(3) 反击战略和回报战略。

(4) 全面战争和非全面战争。

(5) “大规模威懾”和其他威懾。

(6) 战术核战争和常规战争。

(7) 海外部署和中央儲备。

(8) 外国基地、发射場和內区基地、发射場。

(9) 地区防御和战略报复。

3. 未来战略原則的演变 (新的代替办法和各种办法的优点)。

(五) 技术发展(近年和将来的)同美国国防政策的关系。

1. 有关将来美国国防政策的一些重大問題；結盟政策。

